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陈 昱	陈伏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伏金
	陈 昱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84期2023年第1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版单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陈 昱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单 南 何财铭
装帧设计	乔 麦
封面摄影	李艺爽
本期责任编辑	王春燕
地 址	福州鼓楼区天皇岭弄11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第0093号
印刷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Contents

P4



榕树的沉默

P9



鼓岭遇雨

P14

鼓岭邮戳的“洋乡愁”



在线读城

4 万小英

榕树的沉默

走笔鼓岭

9 陈应松

鼓岭遇雨

14 林 山

鼓岭邮戳的“洋乡愁”

21 管柏华

白立志别墅与禅臣别墅

朱子文化

27 马照南

朱子在福州

32 唐 颐

八闽岳祖白岩山

船政之光

35 陈 悦

屠呦呦先祖的船政缘

38 沈 园 沈 蕾 李 纾

沈葆楨世家与江南造船厂

44 胡映泉

跨越生死爱情之约

古厝春秋

49 吴安钦

半山古厝记忆

Contents

# P21



白立志别墅与禅臣别墅

# P27



朱子在福州

# P72

铁蹄下的负笈少年



- 53 邱泰斌
- 57 瑜伽
- 62 黄锦萍
- 66 叶洞

- 邂逅石厝教堂
- 华林寺石狮
- 探访仁和庄
- 一纸抒怀念流年  
——桂枝里的人和事

## 闽都记忆

- 72 蔡林

- 铁蹄下的负笈少年

## 福地山水

- 79 唐冈

- 一条溪流的等待

## 双塔视野

- 82 陈震
- 87 青色
- 93 江梦笔

- 隐元和尚与京都宇治万福寺
- 隐没在历史深处的福州花朝节
- 渔夫与鱼鹰

- 封面 李艺爽
- 封二 刘兴淼
- 封三 林彬
- 封底

- 西禅寺鸟瞰（摄影）
- 严复先生（国画）
- 书录《菜根谭》（书法）
- （明）十八手准提观音坐像（古瓷）

# 榕树的沉默

万小英

到这座城市二十多年了，每天几乎都会看见他，依然还会着迷。年轻时喜欢他的容颜，带着好奇去了解；今天的我，爱的更是他的沉默——沉默地站立，沉默地看着，沉默地陪伴一代一代的人。

每一个路口，每一扇窗外，每一处乡村，每一朵白云下都有他。唯其沉默，我才听到了他，才听见城市岁月的声音，才听见了我们自己。

我说的是榕树，榕城的榕树。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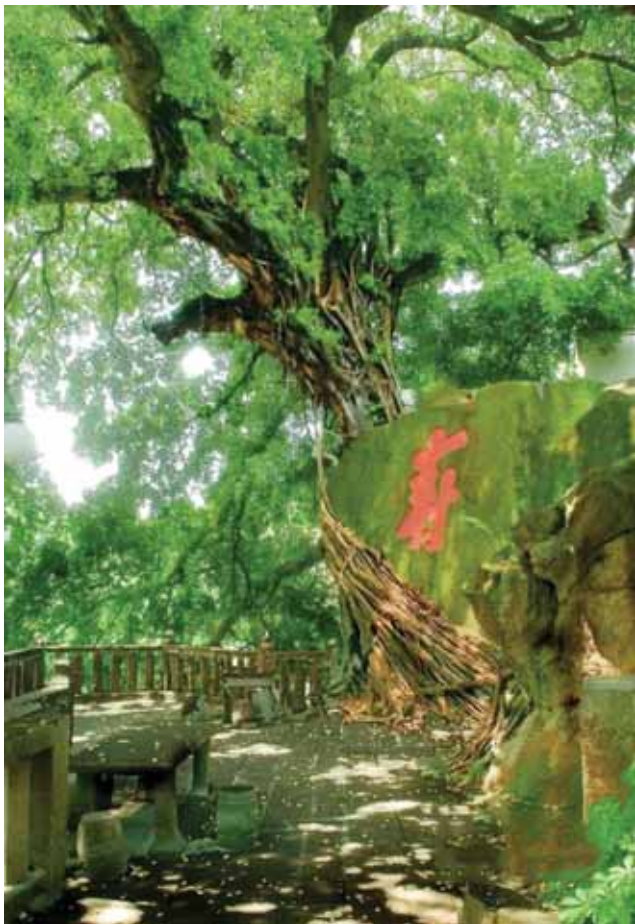
人们说他无用，还起了不好听的外号。榕树沉默。

南唐《海物异名记》说他：“材拥肿，不中绳墨，故谓之橐。”又言：“榕，不材木也。其体臃肿，不可为栋梁。其质薄脆，不可为杯棬。焚之无焰，不可以爨。斫之无沈，不可以髹。有花不可悦目，有实不可供口。是则木之不材也，莫榕若矣。”宋代诗人杨万里作《榕树》：“直不为



楹圆不轮，斧斤亦复赦渠薪。数株连碧真成菌，一胫空肥总是筋。”

一句话，这树做啥啥不行，不会结食用果，不能当柴烧，不能做酒杯，不能打家具，空长一身肥，完全是无用之木。取名“橐”，带有贬义，



真可谓“人无用是庸，木无用是橐”。

对这些讥讽，千年来，榕树所做的只是默默地努力生长。种子落地，吐须垂地，都能生根发芽。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最硬的岩石上，最陡的崖壁里，只要有一线生机，就能扎进去，抓住大地，既可以一树成林，又可以委曲攀缘。无论是寂寥的旷野，还是热闹的街头，叶子一年四季保持着葱茏，拼命地吸取阳光雨露，用一种拥抱、容纳的姿态处世，呈现生命所能到达的力量与韧性，终于成就“其大十围，凌冬不凋，郡中

独盛”。

《逍遥游》里也有棵无用之树。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家叫它臭椿；树干上许多赘瘤，不合绳墨；枝条卷曲，不合规矩。长在路边，木匠都不看它一眼。”庄子说，干吗为它无用而忧虑呢？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也没有东西来伤害它，虽没有用处，但哪里会有什么困苦呢？

榕树的命运印证了道家的“无用之用”之论。南宋李纲在福州任职时说，榕树不宜造船，做窗容易被虫蛀，烧火没火焰，故无人砍伐它；正因为这样，榕树才能长成巨树，可以荫庇土地，“垂一方之美荫，来万里之清风”，数百年绿荫依旧，成无用中之大用。

“庸木”渐有“容木”之誉。《三山志》说：“以其臃肿不中绳墨，名以‘橐’。或曰其荫覆宽广，宜以‘榕’名。”《闽书》说“榕荫极广，以其能容，故名曰榕”。宋代邹浩也作诗《榕树》：“榕树能容故得名，枝条环布若高城。何当种满弥天去，永使青青茁万生。”

从“橐”到“榕”的变化，意味着这棵树开始被赋予“容”的精神内涵，让人悟到“有容乃大”的力量。

宋太守张伯玉认为榕可以防涝抗旱，全城编户植榕，因为“其子少着物即萦系，或本干自相依附，或虬结他树，或扶石而高，水旱不伤，屡斫屡荣”。数年后，福州被几万株榕树笼出满城浓荫，“暑不张盖”，夏天不必打遮阳伞，怎不让人欢喜？也由此有了榕城之名。

政事与人心的关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又简单，在福州，一棵树就能回答。清朝李拔到福州做知府，直接将这层关系说得明明白白。他在衙门内建“福荫堂”，跋曰榕树“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以榕类比，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南方有嘉树，厥名曰榕”，这是明末闽学者黄道周传世名篇《榕颂》首句，让人想起描述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那句诗：“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佳人与嘉树，在北方与南方倒也相得益彰。《榕颂》说，榕树有体、荫、块状、文理等方面的“四妙”，是天下大树所没有的，尤其是“榕公之容尔”的德行，更是远远超出其他所谓实用之材。值得一说的是，黄道周是民族英雄，抗清失败被俘，最后壮烈殉国。

从橐树到嘉树，从贬辱到褒扬，榕树慢慢地，默默地，又稳稳地种进了人的心里。

## 2

人们赞他经历丰富，将一棵树长成了一座城。榕树沉默。

城市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建筑，不是风景，而是人。他在榕城站立了千年，看过很多人。

有悲伤的。在杨桥路双抛桥，见过殉情男女幻化“合抱榕”；在林浦泰山宫，11岁的南宋端宗赵昷两次仓皇避难“宋帝榕”下；在马尾罗星塔下，林纾站在一棵摇曳多姿的榕树跟前落泪，

想起去世的妻子。

有悲壮的。在马尾，左宗棠创办造船厂，来不及在罗星塔旁种下一棵榕，就匆匆离开。接手的沈葆楨也植下一棵榕，如今“沈公榕”浓荫覆地。曾经的洋务事业蔚然成林，转眼间，马江海战的炮火，将马尾船政的壮志化为灰烬，几棵榕树无言凭吊。

有悲悯的。唐末五代，闽地政权叛乱，出家人照天柱得到福州城即将被攻伐的消息，为救百姓免遭战火，连夜赶到南门，将红灯笼高挂在榕树上作为信号，提醒迅速逃离。攻城部队见榕树挂红灯，以为树下有伏兵，不敢贸然进攻，掉头而去，城中免遭一场灾难。事后，照天柱坐化大榕树下。民间传说他羽化升天镇守南天门，称其为“南门照天君”，至今受人崇祀。

他自然也见过欢欣，激越的，平静的，回味的。

北宋，家家户户植榕忙，太守种下的榕树，迄今在森林公园称“王”；诗人李弥逊登乌山，看闽江内河遍布榕树，吟道：“十里人家，路绕南台去，榕叶满川白鹭飞。”

清代，少年林则徐在人字榕附近读书；陈宝琛、林纾、陈衍在大庙山的榕下建“志社”、诗楼，留下“双树容听法，白云悠为怀”的写照；一位叫奎联的人，则在于山“寿岩榕”下大摆筵席，为榕树祝寿。

法国作家、外交官保罗·克洛岱尔踏上清末的福州，震惊巨人般的榕树，“这庞然大物用力牵



引，缓缓地伸开手脚，舒展，延长，竭尽全力，艰辛啊，他那粗糙的厚皮都迸裂开来，暴出了一根根青筋”，“这伟丈夫站立了多少个世纪，在这一瞬间仿佛还正以难以觉察的力量坚持着呢”，“仿佛正扛着天宇的重担”。

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大自然中，唯有树跟人一样，出于一种独特的理由，是垂直挺立的。”当他离开福州回法国休假，恋恋不舍地写下《离开这片土地》，说道：“我们曾经居住的这一片土地上，现在只剩下一团颜色，绿色的灵魂随时要被融化在海水里。”他看到福州这块土地上，有一团绿色的灵魂，那一定是榕树的灵魂。

树，人，灵魂，在这片土地上是一体的。在其他地方，人们可能会祈愿成为天上的星星、小鸟，地上的狮虎、花朵，但是在榕城，成为一棵榕树，长长久久站在那儿，是很多人至高的理想与礼赞。

清代有一对有名的兄弟俩。哥哥李彦彬自号“榕亭”，弟弟李彦章自号“榕园”，并以此号命名各自的藏书楼。他们虽是文学家、藏书家，但有一颗振兴民族的爱国心。李彦章英年早逝，弥留之际说：“无他语，惟慨天不假年，未能尽展其为国为民之志而已。”

我是相信他们的灵魂进入了榕树的。我也相信殉情男女、端宗赵昞、张伯玉、程师孟、林则徐、陈宝琛、林纾、陈衍、左宗棠、沈葆楨、照天柱、李弥逊、奎联、保罗·克洛岱尔等的灵魂进入了榕树。除了提到的这些人，还有更多没有提到的有名或无名的人，榕树见证过他们与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灵魂都有可能进入榕树。

所以，榕树看起来是那样特别，可以变化出不同的样子。有的老态龙钟，有的铮铮铁骨，有的摇曳多姿，有的霸道张扬，有的内敛沉稳……

他们是老人，是壮士，是少女；是仁者，是智者，是勇者，是伟大的平凡者。

无数人的魂魄融进榕树的身体，也堵在他的胸口，让他说不出话来。

### 3

今天，我站在榕城的榕树下，听他的沉默。

据说，榕树的英文直译过来是中国的菩提树。“菩提”一词是梵文 Bodhi 的音译，意思是觉悟、智慧。释迦牟尼树下证悟，那棵树就被称作菩提树。植物学里，菩提树是榕树的一种，其拉丁学名直译过来就是“神圣之榕”。

榕树的沉默，仿佛在做智慧的开示。

枝上垂下细如须发的丝绦，宛若城市的一帘幽梦，它们是气根，可以帮助大树呼吸。风儿吹过，细丝飘荡，越长越长。一旦柔软的须尖垂到地面，即见土生根，再难撼动。而根又成树，树又吐须，须又生根……就这样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榕须入土成根的特异功能，改写了根与须、生与死的定义。一般来说，根与须分别是树的起始与末梢，是生命的两端，但是，榕树做到了根须一体，生死如一。每一条榕须都是一条生命。即便被雷电劈倒，被虫子蛀空，被连根挖起，只要一丝尚存，就是一息尚存，榕树就可以有生命，甚至有成千上万条生命，独木成林。

榕须追土生根，让我想起人对故土家园的



眷恋。一个人也好，一丝须也罢，随风飘荡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投入坚实的土地，生命才能有所着落，才能顶天立地。在每一个静悄悄的夜里，每一次的雨打风鞭中，榕须就好像是他的信念，他的光芒，生长着，突破着，只为了紧紧抱住大地，保护根所在的土地。

冰心在《故乡的风采》中说：“其实最伟大的还是榕树。它是油绿油绿的，在巨大的树干之外，它的繁枝，一垂到地上，就入土生根。”

我总以为，榕须的意象或许会被烙刻进每一位福州在外游子的心头。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一条条榕须，在异地他乡入土生根，而后又默默地撑起了一片自己的天空。

在这座城市，榕树沉默地陪我们漫步。



# 鼓岭遇雨

陈应松

那些冬天也被植物纠缠的山野，笼罩在靛铅色的天空下。寒意是从雨雾中升起的，通过古老的街道和房屋、石板路，这些越来越黯淡的景物，又通过冷雨聚集在一起。深埋在时间厚壤下的记忆，那些人，那些古人和洋人——番仔，在雨中，他们会时常出现在闪着冷冽光芒的街道上，彳亍游荡。他们，古老的人，仿佛有最后一个坚守者，一个番仔，执着地打着洋伞，皮鞋发

出被雨水浸过的沉闷橐橐声。他刚从大清五个夏季邮局之一的鼓岭邮局出来，给遥远的亲人发过一封信。贴上大龙邮票，沉重的邮戳在信封上奋力一踩，他在鼓岭生活的信息便传送到大洋的另一端。他弯了个弯到邮局背后的古街，用地道的福州话点了一碗放有岭上薤菜的海鲜锅边，与店里的山民食客们聊天。然后，他买了挑担卖菜的几把水灵灵的青菜，还有牛肉，以及香草——那



鼓岭古街

是炖牛肉必放的。这种鼓岭生长的草，会把沉醉的香味留在味蕾上、梦境里。那些低于街面房顶的黑瓦和蓄水的石槽，都在雨中顽强呈现。他孤独地走过田陌、水井、坟、荒地，走近石砌的屋子，百叶窗在风中啪嗒作响。檐廊上，一杯咖啡已经冷凝。溪水正在流动，溪上的大石圆墩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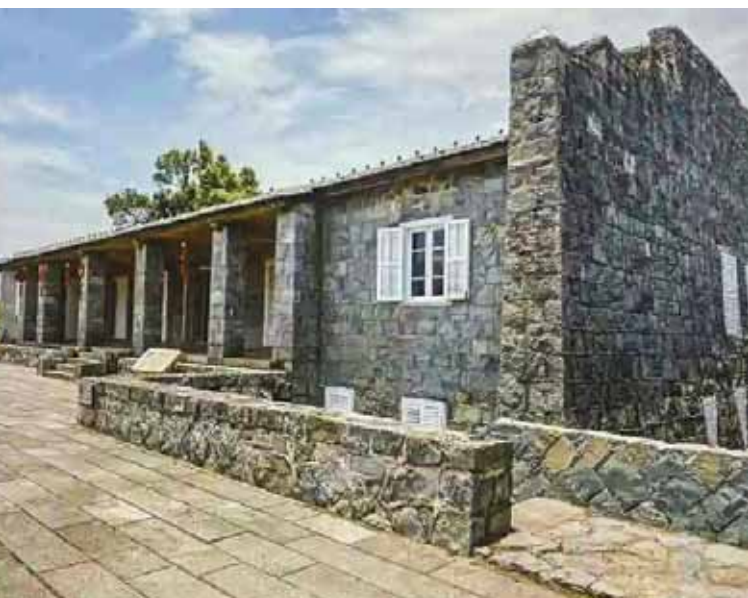
那些干净的石墙，经过了一百年，依然百毒不侵，它们的自净能力太强大太神奇。也许到了半夜，它们会悄悄掸掉身上的尘土和苔藓，挺着贞洁干净的胸，拗着脖子，站在这风雨如磐的时间里。

开始蒸腾起来的市声在一个山岭上，在曾经虎踞狼行、古木参天也鸡鸣狗吠的村落。千年紫杉横卧的虬枝像巨大的钢栅显示着它们的躯干。井壁长满蕨类的水井台上，光滑的井圈刚被那个番仔汲水的绳子摩擦过。番仔在这儿有几百人，

像候鸟一样，等5月天气转热后就会准时出现在这里。他们大兴土木，兴办教育，传播宗教，免费治病。他们打网球、游泳、跳舞、赛马，也同时端着猎枪，射杀山兽，在他们打死的斑斓大虎面前吹着滚烫的枪口摆 pose。

杀老虎的美国牧师柯志仁，还射杀过豹子和豺狼。他的枪和那只搁放死虎的凳子连同他自己，都不知所终。他们欣赏自然，扼杀自然，行为古怪。但他们优雅的生活透过幽冷空寂的石屋，使我们能看到精制瓷器的碎片、门的铜手柄、木地板的纹路、沐风且私密的百叶窗、宽大舒适的石阶和设计精巧的地下室、通风口……

通过石阶凹陷磨损的部分，我想象着夏日清凉中那些在雨雾里撕扯的身影，他们走在宋代铺就的南洋官路上。在石磴道上走来抬着“竹篲”的褐衣乱头的篲工，吱呀的竹竿刺出雾霭，



万国公益社



舞厅

沉重的喘息与白雾汇在一起，在迂回曲折的街巷里移动……前面是什么？是卖油条、油饼、老鸭汤粉的小吃店，还有民宿和杂货店。杂货店门口摆有一溜小摊，篮子里有鼓岭生长的香草、人参菜和天门冬。香草炖鸡鸭鱼肉，一些风干的藤叶有着植物特有的香味，一元一捆，自己投币。钱投在一个空的剪口的油壶内，全凭良心。这是老街一百年的规矩，菜放门前，投币自取，绝无贪小便宜者。当年郁达夫和庐隐都来过这里，喝着村民的酒，睡着村民的床，沉醉于此地的乡风人情，享受着仙境般的桃源生活。庐隐说：“若能终老于此，可算是人间第一幸福人。”那个发现鼓岭的美国牧师伍丁应该是首先发现了这儿浓郁的乡情，才流连于此……

此刻的雨雾依然带着一点黛蓝，好像暮色早临。行人全无，门口的对联亮着唯一的红。但角



鼓岭百年游泳池

落里的野茅、竹丛和梅花都在顽强生长，梅已打苞。往四下望去，松林和浓厚的山体阴影将视线隐去，那些造型各异的石头屋，古堡一样蹲在蜃景中。在迷蒙深处飘浮的屋脊与院墙，全像是用巨石凿的，像搁在旷野的怪兽，在绵延的青烟中忍受风雨和寒冷的刮削，它们残存的身影是冬天黑色的慰藉。

那个在石头上凿出的游泳池，是浪漫主义的杰作。这个巨大的空间，像是一场舞会过后的枯寂空寞，盛满了特别伤感和别离的残液，落叶成为信物。我们坐在池畔的椅子上抽烟。隔着桌子，关仁山给我们敬烟点火，火光带来的丝丝温暖慢慢渗入身体，仿佛在劝说我们忍耐和勿言。烟在烧，风很硬，我们在寒冷中吸着烟。当年更衣的屋子成为茶室，有电暖器和热气腾腾的茶水。电暖器照着桌上喝茶的器皿和套绒的椅背，



鼓岭百年网球场

泛着归家的红光。可是我们还是不愿进屋，我们这些人，依然坐在洋人们夏天泳装坐过的地方，望着空阔枯竭的泳池，像坐在落叶荒寺前。山坡密匝匝的松林里，似还有别墅的废墟，在那儿半露着它们的哀伤。风动山冈，一阵阵的浓雾从山上翻滚过来，像是天瀑。在这萧索的季节，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逾越某种悲伤的意绪，各自想着那些与我们无关却深深触动我们的事情，内心空落茫然，莫名惆怅。

挖掘的石池，堆砌的石壁，在建造之初就似乎想到了它们的结局。隔绝了时光的温馨抚摩。芦花飘飘，冻雨霖霖，那些已经离弃的身影，像孤魂野鬼，飘浮在异国的荒野，或散落在破碎的回忆中。

奇异的失去主人的石屋，它们的内部是我

会合，看他手擎油灯，在百叶窗透出的幽幽光线里，那被石头潮湿的反光勾勒的脸，在一瞬间，又嵌进石壁，一阵淡墨洒开，变成了旧时的镜框和水渍。

在万国公益社高大的风火墙外，当地人指给我看纪念郁达夫的鹤归亭，在那儿，是农历清明，他曾在村民自酿的酒中醉过，并酒后吐真言说：“魂若有灵，我总必再择一个清明的节日，化鹤重来一次。”更远处是东海，有一条通往连江县的路，但我们看到的依然是无边地起伏在细雨中的山岭。

大梦书屋的出现是一个小小意外。也许它就是志书上记载的商务印书馆或者开明书局的前身——我愿意这样想。就像在无人荒郊遇到一个妖冶女子，有前世的气息。这座灵异的书楼，在冷雨清寂中独自优雅，也可以是一座书的教堂。



鼓岭大梦书屋

是谁将那么有水准的书搬运至此？在门外的野云与寒风灌进来时，那些书，文史哲，都是精心挑选上山的。阔大，幽深，还有着书楼的美妙幽暗，仿佛偷偷存储着随时可能失去的整个人类的智慧，让一个探秘者发现这儿满地宝藏。这是石屋，是一个石头垒砌的库室。

那些深刻的、在历史星空中闪亮的文字，静静地摆放在这里，因为潮湿，翻动书页的声音细微。云雾一团团涌进，萦绕在书架和走廊里，你产生想要挺身而出保护这些古老而脆弱的书籍的念头，怕它们在如此的严寒中衰老和死去。再新的书在这里，都像是一件古物，蒙上了羊皮封面，里面画着通往奇境的地图。它们如此幽寂，简直像在暗夜里摇曳的火光。我们在迂回的书架中穿梭、寻觅，脚步轻轻地迈上楼梯，进入二楼，继续寻找，看书，静坐，在窗口向外张望。绍武、跃文、马原、我，我们搭着肩，一张被夏无双小朋友拍摄的照片成为那个冬日书屋中精灵般的亮点。我们在书楼听雨。我们在窗口看山。那渐渐爬升的石磴道上，隐隐传来当年番仔们的赛马声，马蹄敲打着石头。蹄声远逝，云雾缭绕，寒风凛冽。在白鹭与云雾沆瀣一气的野岭，这清简浩大的凉意适合我们在此楼远眺。

鼓岭最值得敬仰的景物是那棵有着1300年历史的柳杉树。占据庞大时空的树，枝桠泛滥，挣扎在微亮的雨中。“谷暗山尤静，林昏地愈明。”在那“如擘絮飘扬，如突烟滃涌”的鼓岭浓雾中，狼嗥虎啸的阵势敲击得群山嗡嗡直响，

那种被群山掷下的空旷和时间，变得如此辽阔苍茫。柳杉的厚重与神秘，几乎覆盖了一座山岭的历史。只有柳杉才有资格与时间对峙，充当证人。想到与东海澎湃一样的字眼，那曾经连绵起伏、莽莽苍苍的紫杉丛林里，奔跑过多少珍禽异兽，它们美丽的羽毛和花纹，它们强健的蹄爪和骨骼，它们的吼声，赋予了多少生命的壮美。可这棵树，它太老，太孤独，简直像神一样，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寒冬来临，它吞咽着扰人的雨雾，鼓岭的山川在它眼里缓缓移动。生命太久之后的寂静是一场苦刑，那些曾经一起磅礴流淌的吼声，消失在了大地深处。激越的倾诉、凶猛的摇撼和锥心的疼痛，漫漶成无边无际的悲剧。好在，在宜夏别墅门口，我又看到了两棵千年紫杉，无奈它们离得很远。孤独是永久存在的理由。孤独有着圣像般的庄严。

这一棵树，和这几棵树，有如鼓岭的沉重鼓槌，它们引而不发，永远只为汹涌欲狂的激情做一个姿势。

那天的雨，我又想起在吃饭过后，被马原索去的一菂薤菜，青翠可人，它将被马原带去栽种在西双版纳的南糯山。无论是乔木还是柔软的草叶，在这里经历过万年，如果它们与我们相遇，一定有某种道理。现在我的口里还留有薤菜香软腻滑的气息，那些植物生长的神秘气息和浓密阴影，有如穿过大地的深邃甬道，抵达生命的秘境。在生命尽情狂欢过后，一株草，连同一棵树庞大的影子，将带往各处，继续呼吸。

## 鼓岭邮戳的“洋乡愁”

林 山

一条邮路，就是一条心路；  
一枚邮票，就是一份牵挂；  
一个邮戳，就是一个见证。

1911年6月26日，福州城东的山岭上，一间小屋内，一个邮戳，上上下下，“啪、啪、啪”盖在一封封寄往千里万里之外信件上的一枚枚邮票上。这是宣统三年六月初一日，鼓岭夏季邮局，邮差在处理邮件。他认真地在每一封邮件上，盖下当天的邮戳，到时间就送往山下的邮局，以便发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每年最热的季节，也是他最忙的时候。

春去秋来八十度，其中一枚邮票重新现身，而邮票上的那个邮戳，则解开了一个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洋乡愁”的秘密。让我们循着这枚邮票漂流的行迹，穿越时空，解读它的前世今生。

### 1

1990年初春的一天，美国加州的伊丽莎白女士在家里整理东西。忽然，她在储藏室的角落，看到一个带锁的咖啡色皮包。这是她丈夫密尔

顿·加德纳的遗物。四年前，也就是1986年2月3日，86岁的密尔顿·加德纳教授去世了。弥留之际，他不停地说一个词：“Guliang, Guliang……”伊丽莎白知道，这是他晚年时常念叨的一个地方，他的人生最初记忆，金色童年的乐园，他一直想回到的第二故乡——一解他的乡愁。但这个“guliang”在哪里？伊丽莎白并不清楚。总想慢慢再了解，谁知天不假时，直到丈夫去世，她也没有弄明白。为了完成丈夫回第二故乡的遗愿，1988年，伊丽莎白踏上中华大地，到处打听、寻找这个可以避暑的“guliang”，没有找到。

此刻，伊丽莎白打开箱子，内有一张泛黄的学生练习本的纸张，上面贴着一些“花纸头”。中间是一张题为“CHINESE LIFE IN THE OPEN”（中国人的户外生活）的图片。围绕着图片，贴着11张邮票，是盖销票，从实寄信封上洗下来的邮票。这很像是集邮初学者做的简易集邮本。估计是加德纳先生早年回到美国加州，收到小伙伴的来信，或者是小伙伴父母给自己父母的信件，甚至只要是来自第二故乡，来自中国的信件，为了留念，就模仿大人的集邮，把信封上的邮票洗



加德纳先生制作的简易集邮本

下来，一次次贴上去，成为承载童年乡愁的收藏品。

伊丽莎白拿着这“邮集”，想到一个人，就是在1988年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刘中汉。刘中汉在伊丽莎白家里待过，对加德纳先生梦萦神绕的童年乐园和渴望回去“探亲”的感受，非常理解和同情，也曾协助四处寻找这个“guliang”。她马上打电话给刘中汉。刘中汉一听有新线索，立马赶过来。果然，刘中汉从这些邮票的邮戳上，辨认出“福州”“鼓岭”和“三年六月初一日”等汉字。邮戳上的拼音字母“KULIANG”，读音跟加德纳先生念念不忘的“guliang”是一样的。这“第二故乡”由此锁定了“鼓岭”。

一个邮戳，如神奇的钥匙，解开了加德纳先生的遗言之谜。

兴奋不已的刘中汉，将此事写成文章，用笔



1992年4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啊，鼓岭！》一文

名“钟翰”应征《人民日报》“海外记事”征文。1992年4月8日，《啊，鼓岭！》见报，这个见证了中外交流历史，见证了“洋乡愁”的邮戳，为书写中美友好的“鼓岭故事”做出了贡献。跟鼓岭有奇缘的穆言灵女士说：“邮局是探索鼓岭历史的关键。”我想，那邮票和邮票上的邮戳，则是解密“鼓岭故事”的关键。

邮票飘回它的出发地——福州鼓岭。鼓岭，是福州东边的一道大致南北走向的长

岭，南与鼓山相连，北接北峰的山脉。原来叫古岭，或许因与鼓山并肩，得名鼓岭。汉语拼音为“guling”；福州方言音为“guliang”；邮政式拼音为“KULIANG”，不是按照汉语拼音来拼，也不是按当地的方言音拼写，而是按照拉丁字母的习惯拼法来，比较拗口。如福州是“FOOCHOW”，鼓岭是“KULIANG”，马尾是“MAM01”，罗星塔是“PAGODAANCHORAGE”，等等。

加德纳父母是美教会人员，1889年就来到福州。1900年短暂回到美国。1901年2月10日，加德纳在美国加州出生。9个月后，他就随父母来到福州。夏天，他跟父母上鼓岭避暑，此后连续九年都是这样。打小喝着鼓岭的水，吃着鼓岭的萝卜干，这里有他成长的快乐和烦恼，有他和各国及当地小伙伴的游戏和情感，自然就把鼓岭当作了故乡。后来成为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有加德纳对童年鼓岭的记忆刻骨铭心。晚年，经常念叨“guliang”。特别是回忆起当地的玩伴和趣事，还会情不自禁用福州方言说起“guliang”，倍觉亲切。后来，伊丽莎白到处打听这个让丈夫梦萦魂牵的“guliang”是在中国的哪里。她曾找到相似度很高的庐山的“牯岭”。确实，鼓岭和牯岭，加上河南鸡公山、浙江莫干山，当时就合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而福州文儒坊郑拔驾编写、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福州旅游指南》，就直接用“牯岭”来表述鼓岭。当然，从邮戳可以看出，鼓岭“KULIANG”和牯岭“KULING”还是不一样的。鼓岭是福州鼓山

延北之岭，牯岭是庐山牯牛岭的简称。另外，从当年的《鼓岭记事报》和万国公益社的文宣资料上，也可以见到用“KULIANG”来称呼“鼓岭”。

### 3

邮票飘回始发邮局。

在福州，这是海拔最高的邮局——鼓岭邮局。

邮局，古称邮驿馆，是办理邮政业务的机构。它与邮路共同组成邮政网络，实施邮件的传递。邮局的分布与数量既考虑公众的方便，也考虑经济合理。设置在鼓岭的邮局是很特别的，特别在于它是季节性营业，是为到鼓岭避暑的人们，特别是美、英、法、俄、意、日、比等世界各国的外交官、商人、银行家、牧师、神父、医生、教师等和地方官宦、商贾服务的。随着气温的升高，每年在五月端午节后开张，又随气温的降低，到八月中秋节后关闭，所以又称夏季邮局。

我国夏季邮局有多少？没有查到数据。按集邮界的说法，过去我国有四大夏季邮局，分别为江西牯岭（庐山）、浙江莫干山、河南鸡公山、福州鼓岭。也有的说，加上河北北戴河，是五大夏季邮局。有人算了算，清末至民国初期，我国的夏季邮局有浙江莫干山（1898年）、河北北戴河南山（1899年）、江西牯岭（1899年）、福建福州鼓岭（1900年）、河南鸡公山（1905年）、四川峨眉山新开寺（1925年）、山东青岛湛山（1935



年)、安徽黄山(1936年)等处。它们都是避暑胜地,夏季都有大批外国人逗留。还有吉林长白山邮电所,因冬季大雪封山,也只在夏季才开展邮政业务。有关资料显示,鼓岭邮局的“夏季”特质在所有夏季邮局中是坚持最久的。

鼓岭邮局设在鼓岭宜夏村内古街崎头顶,可能是租用一家商店的部分门面,称鼓岭夏季局,隶属于福州邮务总局。首任局长林振文1900年7月1日到任。在这之前,在鼓岭避暑的人们要寄信咋办?估计早先在鼓岭要寄信,会托下山的熟人带去城里邮局投递。1887年成立了鼓岭联盟,就是鼓岭公共管理委员会。当然,它的别称“万国公益社”更知名。有了公益社,就承担代收代寄邮件的事。后来,鼓岭的夏季越发热闹,需求越来越多,邮局应运而生。

邮局主要是寄送信件、包裹、汇款还有机要邮件。开初,每日邮件从山下邮局取出,封发一

次,由邮差背邮包上山。1911年6月起,因为要寄的邮件多了,一天就分发两次。同样,山上要寄出的邮件也盖上邮戳、封发,由邮差背下山。有一阵子,为规避茶叶出口的税收,福州城里有的茶商甚至通过鼓岭邮局寄大宗包裹,把茶叶寄出国。

鼓岭邮局虽小,功能还齐全,但房屋产权是别人的,“寄人篱下”终不是办法。1908年6月,闽海关拨银圆1500两,在古街附近福州路边上,也就是现在邮局所在,向“修路公所”借地25年,建造邮局楼房,用了十多年。加德纳先生珍藏的邮票和那“kuliang”的邮戳就是从这里开始其神奇之旅的。

1926年,福州邮政局出资500元对邮局旧屋进行了改造。因为借地期限已过,1935年8月,鼓岭邮局用地由万国公益社无偿赠送。据福州市档案馆所藏卖契合约记载,卖主为“鼓岭万国公



鼓岭邮局

益社”，买家为“福建邮政管理局”，标的为邮局所在的土地所有权，买卖金额为零。这样，邮局的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就齐全了。

鼓岭邮局为单层石木结构建筑。据福州市档案馆藏的鼓岭邮局赠送契约和平面图记载，当时鼓岭邮局的用地面积达300平方米，建筑设施也已相当完善，入门即为公众寄信处，另设有信差房、办公厅、两间局长室和厨房、天井、两间公厕。图纸还标明了邮局边上有一口井，井栏刻有“外国本地公众水井”阴文。

鼓岭，平均海拔800米，冬天时有落雪，夏

季气温最高才30℃，宜夏村又处在鼓岭的中心之处，常年的大氧吧和清爽的山风，让这里成为许多旅客避暑的胜地。宜夏村村域的面积为12平方公里，相当于11个鼓浪屿。百年前的鼓岭，草木繁盛，清凉宜人，夏天吸引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到福州及周边地区的商人、学者、传教士等来此生活、行医、兴教，并在山上建了300多栋风格各异的避暑别墅，还有医院、万国公益社、教堂等设施，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相融的避暑度假区。各国人士云集于此，将外国的生活方式一并带到福州，鼓岭的“朋友圈”名噪一时。

1926年夏天，庐隐利用学校放暑假，在鼓岭住了50天。“离开充满了浊气的城市，而到绝高的山岭上……这种清幽的绝境，如果我能终老于此，可以算是人间第一幸福人了。”（《寄梅窠旧主人》）

两年后的8月中旬，林徽因婚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福州，住在仓山。仓山是福州城外的洋人聚居区，类似鼓浪屿。此时正是盛夏酷暑，仓山外国人多在鼓岭避暑。林徽因也在这个时候上鼓岭小住。

1936年2月，郁达夫应邀来福州游览，不久被任命为省政府参议，并兼任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在福州期间，他多次游览鼓岭，还留下美文。

1948年7月21日，《中央日报（福建版）》发消息“鼓岭今起设立邮局”，说：“近日天气炎热，中外人士前往鼓岭避暑者日多，本市邮局为



鼓岭崎头顶水井

便利该地游客通讯起见，特在鼓岭开设邮局，已定自今日起开始营业云。”到1949年7月7日，夏天来了，本该是鼓岭的旺季，该报消息标题却是“鼓岭治安不靖，将劝外侨迁离”。8月17日，福州解放。这个夏天，鼓岭邮局就没有开门了。此前，1912年，曾经因为怕老虎伤人，邮局晚上不投递。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1944年，也因福州沦陷而停业。鼓岭邮局忙了43个夏天。2012年9月27日，在原址重建的全年营业的鼓岭邮局开门营业。2017年公布为福州市首批历史建筑。

## 4

杜甫有诗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其实有没有烽火战乱，远方来的家书都是无价的。古时候“鱼雁传书”的典故是“家书抵万金”的化石版；鼓岭邮戳的故事，是“家书抵万

金”的现代版。加德纳那个年代没有电子邮件，电报和长途电话又是大人的事，他与鼓岭铁哥们的联系全靠信件传递。如果父母收到鼓岭信件，问候到他，那就跟过节一样高兴的。为了这份“洋乡愁”，他会把信封上的邮票收集珍藏起来。那时候，乡愁就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他在这头，鼓岭在那头。

刘中汉让这枚带着鼓岭印记的邮票化为文字，飘上《人民日报》版面。许多读者深受感动，其中就有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他看完这篇文章，马上通过有关部门与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特意邀请她来访问鼓岭。1992年8月21日，加德纳夫人启程来福州。终于踏上鼓岭的土地，亲身体会她丈夫念念不忘的鼓岭山水、家人般的村民。几天的“圆梦之行”，她也有了刻骨铭心的“乡愁”。临行前她感慨万千：“这次我为我的丈夫来圆梦。我感谢福州朋友的盛情款待，我感谢所有让这个梦变为现实的人。我将把福州人



宜夏别墅



梅森古堡



鼓岭加德纳展示馆

民这诚挚的友谊带回美国。”

2012年2月15日，在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午宴上，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习近平对700多名来自中美政商各界的人士深情地说道：

“我相信，像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厚植中美互利合作最坚实的民意基础。”

鼓岭故事，感动了世界。加德纳珍藏的鼓岭邮戳邮票只有11张，还有许多原来鼓岭的外国居民，他们也珍藏着鼓岭的旧信封和老照片，那就有多少鼓岭的故事和乡愁？！鼓岭邮局只是一个窗口，可以看到历史人文的精彩万千。鼓岭还有万国公益社、柯达照相馆、加德纳展示馆、宜夏别墅……一座座古建筑背后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脉，记录下了那段特殊时空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它们从不同角度和各自层面，述说着更多的“鼓岭故事”。

如今的鼓岭，再添新事。在鼓岭，游客不仅可以聆听300多幢别墅背后的光阴故事，还可以

继续亲近“清风、薄雾、柳杉、古厝”，畅快地呼吸山间的清新空气。

邮票的下一站，要飘去哪？

鼓岭的邮局，过去是季节性邮局，随着季节气温的高低而开关。如今是互联网时代，有了电话、微信和网络，人们对纸质信件的需求断崖式减少。全年营业的邮局都惨淡经营，何况季节性邮局。与此相关联的邮票和集邮行当，也都成为活化石。如果在鼓岭举办一次世界性邮界论坛，专题探讨互联网背景下邮局的出路，应该是很热闹的。

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前进，更重要的是思路在拓展。鼓岭是著名避暑胜地，夏季是它的活跃期。其他季节，特别冬季，是休眠期。应该有个“四季鼓岭”的概念。

现在的鼓岭邮局是非季节性的了，但主要还是怀旧和展示鼓岭故事的历史。鼓岭邮局也可以走“跨界”“混搭”的“邮局+”路子。如“鼓岭故事”主题邮局、夏季邮局博物馆，还有体验式、互动式、剧场式、茶摊式、咖啡店式、带货式邮局等。

在我国神话里，女娲炼五色石补天，五色石发出的彩光就是我们看到的天上的彩虹。在希腊神话中，彩虹是沟通天上与人间的使者。我想，彩虹就是邮路的象征，邮票和邮戳就似一枚枚五色石，在古今中外人们的情感生活中发出绚丽的彩光。愿我们的鼓岭邮局成为精彩纷呈的“彩虹邮局”。

# 白立志别墅与禅臣别墅

管柏华

白立志 (Dr. Pakenham) 别墅在鼓岭宜夏村后浦楼，门牌号先后为 68 号、395 号。后浦楼紧邻柱里景区，沿线约 1 公里区域散布数座洋人别墅，除禅臣别墅外，均已圯废。白立志 1867 年出生于英国，1886 年进入都柏林大学，1890 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893 年又获得医学学位。他随后在爱尔兰开始人生实践。1895 年，他被第八皇家爱尔兰轻骑兵团的一名军官说服，并打算前往南美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一个职位，但当他遇到中华圣公会的鹿峥嵘时，被他的描述所吸引。恰在这时，布市的通知也同时到达。最后他似乎得到上帝的旨意，前往中国，去从事医学传教这项事业。1896 年整整一年，他与桑普森博士一起在艾灵顿的新肯特路运营迈尔德梅教会药房。他于 1897 年 10 月 22 日乘轮舟跨洲越洋启程前往中国。先在福州中华圣公会任传教士。1900 年，

英国教会在建瓯设医馆。白立志在仓长路、青云路购买土地建济世医院和妇幼医院。白立志任院长，医院设男病床 50 张，女病床 30 张。不久，古顿医士从英国带来了显微镜，开始做血液等检验，当时医院已能实施一些腹部小手术，白立志作为全科医生往往亲自操刀。1905 年，教区委派魏仰基为华人院长，协助白立志开展工作。1910 年，医院开始招收学生培养医学人才。1914 年欧战爆发，不久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参战，于是指令医院第一届毕业生赴欧洲战场担任战地救护。战后协约国军队发给战争剩余物资消毒器一台，医院从此有了现代消毒工具。当时的闽北山区，打摆子是常见病，白立志常以西医配合闽山草药予以治疗，往往药到病除，当地人称他为“西来华佗”。史料称：“独鹿峥嵘、白立志能操建郡土音，俱中国衣冠。”也就是说，白医生能说建瓯

话，身穿中式长衫马褂。白立志还参与创立了培汉中学，成为今建瓯一中的一部分。早年的传教士威廉·米怜曾感叹道：“学好中国话，要身如黄铜，肺如钢铁，头像橡树，手似弹簧钢，眼似鹰鸟，心情像使徒，记忆像天使，年龄像马苏安拉（《圣经》里的长寿人，享寿 969 岁）。”由此说来，这些早期传教士都是教会挑选出来的精英。

白立志别墅原为香港富豪吉妥玛所有。吉妥玛是兴隆洋行的经理，他 1844 年出生在香港，是欧亚混血儿家族——洪千家族的成员，与香港旧四大家族首席何东家族有姻亲关系。这里需要介绍的是洪千父亲是威尔士人，曾在福州经营茶叶生意，母亲是福建人。据黄光域《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词典》载：“兴隆洋行系福州英商贸易行，由吉廷斯等合伙开办，经营茶叶出口及杂货进口贸易，代理‘保宁’‘公裕’等几家英商保险公司，经理吉妥玛。”经考证，别墅大约在 1919 年之前

开始属于白立志医生所有。

吉妥玛留着帅气十足的俾斯麦式翘胡子，他比白立志年长 20 多岁，周身洋溢着英国上流社会素有的绅士风度。好几年暑期，白立志都是在后浦楼吉宅度假，这不免使他对柱杠顶这个鼓岭最高峰产生浓厚兴趣。这里可以东望到闽江口的大海，向南可眺望三江口，五虎山也隐约可见，令人心生豪壮之气。朱德后来有诗赞道：“纵有台风声猖獗，从此不敢过闽侯。”说明此处抵御天风海涛是福州的天然屏障。

白立志长着一张俊朗面孔，气质斯文。吉妥玛送了许多武夷山下梅村生产的发酵茶给他。他其实更喜欢喝绿茶，尤其是鼓岭的柏岩茶，肥厚的叶片茶汤涩而后甘，似乎是鼓岭的清风奶雾的绝配。离白立志别墅不远的华善别墅的主人华善也是英国人，该别墅经常有义兴洋行、宝德洋行、怡和洋行的商人来此避暑。至于说到闽海关



白立志别墅遗址俯瞰



白立志别墅遗址

税务司华善，他的“吃西口”日食九顿虽然闻名遐迩，却是少而精，所以他长得高大威猛。白立志最初来此避暑时，还在吉宅的客厅里与义兴洋行的大洋洲茶商拉姆齐一齐喝下午茶，聊长天。拉姆齐具有浓浓的乡愁，他把柱杠顶命名为“马其顿山”，并好几次眼望家乡墨尔本方向洒泪。

别墅高两层，安装有一长溜的百叶窗。因要防潮，房子的石础砌得很高。一层客厅防潮斗底砖上铺有琅岐岛湿地生长的细草编织的席子，墙上嵌有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壁炉，冬日里炉火熊熊。这里经常会有本地孩童来玩耍，他们以香草野花馈赠，白立志则以铁盒包装的四角形甜饼干、糖果、洋笔回馈。孩子们一边吃，一边会告诉他，他们原来只偶尔吃过光饼和戚参将发明的征东饼。他们显然受到父亲的嘱托，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然后回去告诉家长洋邻居家里的充实的酒窖、图文并茂的洋书、各式各样的西式金银餐具，以及安放在壁炉上的自鸣钟等。

白立志于1924年回国，该别墅初有本地人来打扫，后逐渐荒废。公社化时代，生产队曾在此种佛手瓜，利用花岗岩石墙、石础搭起瓜架，故相对保留较好。有人以无人机航拍，称酷似英格兰南部的“巨石阵”和黄土高原上列队的秦俑战阵。晚唐吴融曾有《废宅》诗曰：“风飘碧瓦雨摧垣，却有邻人与锁门。几树好花闲白昼，满庭荒草易黄昏。放鱼池涸蛙争聚，栖燕梁空雀自喧……”仿佛指的就是今日的白宅。

禅臣洋行的总部设在德国汉堡，1856年在

上海设分行。福州分行是稍后的事。其创办者乔治·特奥多尔·禅臣（1816-1886）之侄谢弥沈（G·禅臣），德国人，1882年移居福州，接手禅臣洋行在福州的业务，主要经销茶叶。据史料记载：禅臣洋行对福州的电话发展以及船政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当年在禅臣看来，鼓岭的地貌和气候，有些像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这当然是意外之喜。别墅位于白立志别墅的下方，占地20多亩，系由1895年后收购黄姓村民的草庐改造而来。早期建筑为一层结构，房间只有七八间。后改建成两层洋楼，德意志人的严谨大气在建筑上有所反映，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用杂色花岗岩拼花的外墙，远看有点像现代建筑里的马赛克，所以说是当时鼓岭最高档的洋房。也许是当初收了禅臣较可观的购房款，据黄姓村民说，祖先曾有交代，不可将坟墓建在别墅周边，故别墅周围竹林蓊郁。在布里斯托大学馆藏高士威相册中，我们看到别墅的早期和重建后的照片，其重建后的照片显示，该别墅二层中央有骑楼廊道，房子每层则至少10间。其周边种有棕榈树、绣球等奇花异卉，并建有凉亭。周边有高大的桧树（柳杉），与德意志人笔直的身材相映衬。我们从高士威相册中找到一帧摄于1919年的照片，照片中有24人，全为男性，穿着西装，内有衬衫，说明当时鼓岭夏季早晚气温要比今天低很多。（又一说称：照片拍摄于冬季）参之宜夏村柯达照相馆一老妪说法：“鼓岭在10月，番薯米头晚晾于竹篾上，第二天即凝结，掰都掰不下来，非要太

阳出来，水分化开，才能扯下。”所以，不论冬夏，禅臣别墅都是人满为患，因为即便在冬天，鼓岭的雪景也是很美的。和白立志别墅一样，禅臣别墅一二层都有壁炉，他们认为既实用又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为防火，壁炉门是装有金属合页的包铁门，专门由过桥的白铁匠前来打造。壁炉顶上安放着荣汉斯壁炉钟，比白宅的壁炉钟时尚很多。

禅臣洋行在过桥仓山有几处建筑遗产，一为禅臣洋行旧址，曾位于泛船浦前街禅臣埕，可能始建于19世纪70年代。二为禅臣花园，位于桃花山东南麓，占地15亩，内有西式园林、喷泉、水池、凉亭等，并广植花树，据说其玻璃暖房在当年曾惊动了京城园艺师。该园始建于1891年，是福建近代第一个西洋园林。保留至今的一帧老照片，站在C位的德国海军上将与清朝官员合影就是在园中六角亭前，摄于1902年。三为德国驻福州领事馆，建于清末，早期为洋行办公楼，因创办者G·禅臣（谢弥沈）任领事而兼做德国领事馆。1917年，中国参加欧战后，被北洋政府当成敌产没收。禅臣花园和其中的“城堡”都遭到破坏，雪松倒下，剩余的建筑也在1945年被焚毁。值得庆幸的是，当年栽种的奇花名木历经沧桑，有相当一部分幸存下来，有多株还成为“中国树王”，仅一二级保护的古树名木就有27株。这里留下了异叶南洋杉王、落羽杉王、大叶南洋杉王、安波那王、金刚纂王等9棵在全国称王的“国内一号”外来树种。其中的落羽杉王比南京

的落羽杉引种早了半个多世纪。金刚纂树还可治疟疾、霍乱等病。

禅臣别墅往南竹林茶园深处有一眼水井，长年雇农人挑水；该水井是天然的小冰箱，可用于保鲜牛奶，当然也为了口感好。洋人雇人挑水、看房子，有的是给银洋，有的则是给“美孚洋油”两箱（一箱50斤），后期也给“救济”大米。100年前，1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5-40美元，1946年100美元等于240枚大洋。后山与拉姆齐别墅相邻的则是占地20亩的跑马场，处于缓坡地带，角落处筑有马厩。别墅往西有个私人网球场，洋行的高管经常在那里打球。在别墅旁建有冰窖，里面藏有牛肉和由优质的鼓岭牛奶自制的奶酪以及法国红酒。据说德国人也将啤酒花带上山尝试制作啤酒，那帧照片就是在一次午餐派对后留下的，照片里的人也许喝了自制啤酒，似乎都有些微醺。别墅里的蔬菜罐头时果，多由福州大岭顶同昌行包办运来，牛羊猪肉及福州人都津津乐道的“岭鸡”则取自本地。德国人并不爱吃鼓岭出



谢弥沈、高士威等人在鼓岭禅臣洋行避暑别墅石阶前合影



产的芥菜、亥菜，认为太粗粝，不适合做水果沙拉。

有关禅臣别墅的实物照片主要来自谢弥沈的后代。谢弥沈可谓政商双跨，富贵兼得。作为禅臣洋行的创始人，他除了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署理德国驻福州领事，翌年转正，还在民国元年至民国五年（1912-1916）担任德国驻福州领事，并兼任瑞典、挪威驻福州的副领事，称得上“福州通”，与清政府在福州的官商各界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1891年，美国驻福州领事葛尔锡50岁生日时，在鼓岭“福州贸易有限公司”办酒席，谢弥沈作为好友也在邀请之列。有趣的是，葛尔锡与谢弥沈一样，也做过两任美国驻福州领事，并经谢弥沈介绍，于1897年一度署理过德国驻福州的领事。从档案馆保留的相片来看，谢弥沈方脸略长，高额广颧，深目炯炯，发际线后移，发细如丝，大招风耳朵，嘴角紧抿，明显露出坚毅的唇线。

德国人皈依的是路德教宗，虽然崇尚简约，但既然是度假，就有些飘然若仙、略尚奢华。那些在晨昏时出现在三宝埕万国公益社的男女，纷纷展示着各自的帽子，有戴圆柱形药盒帽的，也有戴窄檐爵士帽的，更有一些德商及各国领事女眷戴着夸张的鸡尾酒帽，搭配长可掩膝的暗色裙子。帽子的小底座上饰有蝴蝶结和各种羽毛并配以面纱。有趣的是，在老鸦石、牛头崖，这些女眷尽管长裙曳地，仍然手握长筒千里镜观山看水，乐此不疲。

禅臣在鼓岭逝世之时，也是德国国运昌隆的时候。其时德国以“铁血”完成了统一，又挟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科技创新，开始问鼎英吉利在欧洲的霸权。崎头顶先后建筑有七个修葺平坦呈阶梯状的公共网球场，周边筑有三四层的简易看台，经常有各种赛事，而一年一度的大型比赛则绝对称得上热闹。那天，来自马尾兵舰上的英美官兵会提前几天沿着磨溪至鼓岭的登山道，赶来参加比赛。这时，英德之间的团体大战则尤其引人关注。他们的国家之间虽然剑拔弩张，但在此“仙界”却颇祥和。比赛后的露天大聚餐因为有淳朴的乡民加入，更像万国大家庭其乐融融。锦上添花的是，那天还专门请了天安堂的管弦乐队前来助兴。

《鼓岭史话》称：1885年夏，美国伍丁牧师发现鼓岭，并在嘉湖租房子；次年，英国驻马尾领事馆医生任尼在梁厝村建起第一座别墅。陆领慈《鼓岭见闻记》录：“谣传外人建筑别墅于山巅，居高临下，省城堪危。一时民气沸腾，事闻于福建提督，提督惧，派闽侯知事吴某亲临审核，令乡民不得以土地卖与外人，几经商议，姑准外人租地建屋，注明期限，至今岭上外人只有房屋而无土地。”由于之后的《东南互保协议》以及清末的立宪效仿的是德国的缘故，上行下效，所以总体上华洋尤其是清德之间还是和谐相处。

近代动荡的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这也使得生活在禅臣别墅的德国人颇为惬意。闲暇时，他们会成群结队沿着



修复后的禅臣别墅

官道下到上鼓，一路经分路亭、福厝亭、奶奶亭到山下。从分路亭岔道可去过仑，那里的萝卜甜脆，地瓜也很粉糯。沿途可见络绎不绝的上山避暑的过桥仓山的洋人，男人坐在藤竹编制的篾子上神态怡然，女眷则美丽端庄。有年轻妇女挑着特制的宽扁篮子，里面有酣睡的洋婴儿，队伍里还有人掬着宽大狼狽的藤床。下岭之后可绕过行春门坐上琼河里的木船前往汤门外密如繁星的私人澡堂，他们会在顶戴云集的福龙泉泡澡啖荔，喃喃诵读着“不见莲花见荔枝”的宋郡守程师孟的名句。回程是在傍晚时分到达上鼓，而那时早有鼓岭的篾夫守候在那里，德意志人的大高个往往要四个篾夫扛。那些大脚嫫妇神色自信，其中有的还是出嫁到鼓岭的福州城内开金店的女儿，鼓岭已俨然成为富庶的“经济特区”，据说对城里

人也有诱惑。她们帮助挑运采购的食品，因为币制汇率的缘故，她们的酬金也颇丰裕。随着海拔升高，江海里饱胀的冷风吹来，洋人会穿上开司米毛线衫挡寒。

宜夏村在旧时也有少量被称为“洋”的大块梯田种植单季稻。早期的禅臣人会下到稻田里捕捉黄鳝和泥鳅，一边盛以木制秧桶。时当盛夏，田塍上有许多的农人卷着裤腿在看热闹。德意志人显然其意是玩耍的成分居多，之后他们会到长田溪的深潭或游泳池里游泳，这时偶尔会有一些艳遇，那些英美女子也是落落大方；有的则在溪岸上坐成一排，东倒西歪地谈笑风生。中国古代有许多“花为媒”“酒为媒”的故事，这一点，美国人要比德国人浪漫，来自邵武的福益华医生，为了取悦川石岛的贝敏智老师，特地在她的鼓岭房子周围修建了网球场，以制造球友接触的机会。1902年他们终于修成正果，步入了婚姻殿堂。结婚那天，禅臣的小伙子虽然态度有些矜持，但还是结伴前往道贺，表示了德美之间的亲善。

美好的日子总是容易转瞬即逝，英俊潇洒的白立志已经功德圆满，向圣公会的主教大人复命。而两次冲顶世界霸主的德国终于还是铩羽而归。尽管中德友好源远流长，但这些禅臣容克的子孙们还是站在了龙潭角陡峭的崖岸上，耳听凄厉的汽轮汽笛声，茫然地东望鼓岭，让无数刻骨铭心的记忆随着这条汹涌的东方莱茵河水流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 朱子在福州

马照南

朱子一生与福州结下不解之缘，他自幼随父亲朱松来福州避难，少年随父来福州会见文士诗友，24岁任同安主簿时专程来福州筹集近千卷书，供办学之用。后来他更多的是专程来问学讲学，有时撰写修订文稿，有时应主政官员邀请商讨治闽政策，有时来访亲探友。据说有人统计，朱子来福州达15次以上，多数时间住在三坊七巷道山路一带，有时一住一两个月。

朱子对福州文化贡献良多。我们通常称福州为“海滨邹鲁”，据说就是朱子大笔书写后，悬挂在福州西关谯楼上。朱子在鼓山、于山手书的“福”“寿”成为福建历史上最大的石刻。朱子培养了大批闽都学生，他撰写的《福州州学经史阁记》等诗文，极大地推动福州教育文化的发展。

## 故人契阔情何厚

宋时福州，包括侯官、闽县、怀安三县。在鼓山、在福州城区依稀可见朱子留下的许多文化遗址和传说。



灵源洞蹴鳌桥下的朱熹手书“寿”字石刻

朱子与赵汝愚既是师生又是好友。赵汝愚为官清廉，“所得廩食常分与人，而自奉甚薄”，“布衣蔬食，乡人盛赞其清正贤能”。朱子与赵汝愚两人都力主抗金、弘扬理学，勤政为民。赵汝愚任宰相之后，举荐朱子为待皇帝老师。两人在朝廷上声气相通、精诚合作，在“庆元党禁”之中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1182年5月，赵汝愚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

他在福州做了不少造福当地百姓的事，受到百姓称颂。当年的西湖，“溉民田数万亩，后为豪猾淹塞为田，遇旱则西北一带高田无从得水，遇涝则东南一带低田沦为巨浸。”这年冬天，赵汝愚开浚西湖，使闽县、侯官县、怀安县 14000 多亩土地受益。第二年，福州连续下雨两个多月，三县民田幸赖西湖而不受涝。赵汝愚在湖上建“登瀛阁”，并品题“西湖八景”，至今成为福州的名胜。朱子受赵汝愚之邀来福州商讨治闽方略，二人一起登乌山唱和。朱子见西湖治理成效显著，风景更加秀美，对赵汝愚的举措满心欢喜并极为赞赏，便吟了《游西湖》：“越王城下水溶溶，此乐从今与众同。满眼芰荷方永日，转头禾黍便西风。湖光尽处天容阔，潮信来时海气通。酬唱不夸风物好，一心忧国愿年丰。”如今，“湖光尽处天容阔，潮信来时海气通”作为尽显福州的地理气势的绝佳对联，镌刻在镇海楼正楼之上。

朱子告别赵汝愚后在福州一直无缘相会，仅靠晋安鼓山题刻来交流友情，这也是古代文坛书坛史上一桩韵事。

1187 年，因受谤而隐晦多年的朱子，辞掉江西提刑的任命，匆匆来到福州拜访知州赵汝愚。不料，早此一年赵汝愚已调往四川任制置使去了。于是，朱子率领学生王子合、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四人，登鼓山拜谒赵汝愚礼请来山主持的元嗣方丈。朱子在水云亭墙上看到赵汝愚离任前的题刻：“灵源有幽趣，临沧擅佳名。我来坐久之，犹怀不尽情。褰裳步翠麓，危绝不可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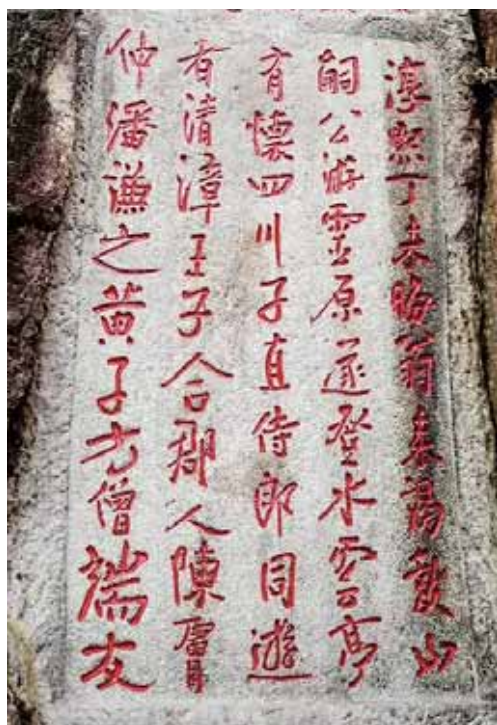
豁然天地宽，顿觉心目明。洋洋三江汇，迢迢众山横。清寒草木瘦，翠盖亦前陈。山僧好心事，为我开此亭。重游见翼然，险道悉以平。会方有行役，邛蜀万里程。徘徊更瞻眺，斜日下云屏。”

他睹物思人，十分感慨，于是留下了一方一气呵成、潇洒飘逸、表达强烈思友之情的行书题刻：

“淳熙丁未，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原，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僧端友。”

“晦翁”是朱子的字号，“嗣公”是涌泉寺住持元嗣，“子直侍郎”便是赵汝愚。

三年后，赵汝愚再次入闽任职。次年他又登上鼓山，看见朱子留下的题刻，极为感动，想到远方的朱子和已逝世的元嗣禅师，思绪万千。于



鼓山灵源洞朱熹题刻

是，他在朱子题刻侧留下自己的题刻：“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故人契阔情何厚，禅客飘零事已灰。堪叹人生只如此，危栏独倚更徘徊。”赵汝愚题刻抒发了壮志未酬的惆怅心情和对师友朱子、鼓山住持元嗣等人的思念情怀。诗中的“故人”指的是朱子，“禅客”则是已圆寂的元嗣禅师。然而不到一个月，赵汝愚又调离福州。

后来，朱子携黄榦再次登临鼓山。看到自己题刻旁边赵汝愚的诗作，心潮如海，就从“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的诗句中，节选“天风海涛”四字，镌刻在鼓山绝顶峰的山崖上，题款特别注明“晦翁为子直书”。朱子“天风海涛”题词，被认为是描绘石鼓名山最有气势的佳句，赵汝愚的诗也为历代文人墨客赞赏。

朱子和赵汝愚这有趣的诗文酬答的场景，跨越时空的题刻，传达出堪比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的真挚友情，让人感动。

## “闽学干城”出闽都

朱子快婿黄榦是晋安浦上村人，这使他与晋安的关系更深了一层。黄榦作为朱子的学生和主要学术助手，为传播朱子学做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后人誉之与蔡元定、蔡沈、陈淳同为“朱熹四大弟子之一”，更评价他为“闽学干城”。

黄榦自幼聪颖好学。早先拜朱子弟子刘清之为师求学。刘清之认为黄榦天资颖慧、才华出

众，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让他往崇安从朱子授业。黄榦冒着大雪到达五夫，正好遇朱子外出，他一等数月，通宵达旦，读书不止。朱子十分感动，收之为徒。之后黄榦就在崇安五夫里随朱子苦读。黄榦与朱子高徒蔡元定、朱熹学友吕祖谦论学，常常提出自己的独特观点。朱子认为他“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后以仲女朱兑许配黄榦。

黄榦长期陪伴在朱子左右，接受教诲，帮助整理文稿。朱子编《礼书》，其中丧、祭二篇由黄榦编成，朱子十分满意。朱子晚年定居建阳考亭，黄榦也在附近结庐居住。朱子对他的学术水平十分肯定、极为赏识。有些课程交代“他时便可请直卿（黄榦字），代即讲席”。1196年，朱子被朝廷斥为“伪学”，黄榦坚守师道，坚持讲道著书。朱子病重，将所著书和手稿托付给黄榦。

黄榦入仕任职，很有作为。他担任江西临川县令、安丰军通判、汉阳知军、大理丞等职，勤政廉政，致力于社会改革，整顿吏治，赈荒济民，筑城备战，“壮国势而消外侮”。各地民众深感其德。

在继承和传播朱子学方面，黄榦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对确立朱子学说做出重要贡献。他撰写《朱子行状》，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评价了一代理学大师朱子的德行。他论定朱子的道统地位，认为“道出于天”，表现为天地万物和人事的变化，故有道统。他把“传承道统”看成是朱子的最大成就，实际上论证孔子与

朱子的继承关系，厘清了中华文脉传承。经过黄榦的提倡和阐发，朱子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黄榦在浙江、江西、武汉为官时，都通过讲学授徒广泛传播朱子学，促使朱子学在各地迅速传播。

作为一代大儒，黄榦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他的专著有《五经讲义》《四书纪闻》《周易系辞传解》《读仪礼经传通解》《论语论语问答通释》《晦庵先生语续录》《勉斋先生讲义》《勉斋诗钞》《黄勉斋先生文集》《勉斋集》等。

福州民间还有这么一个传说。一天，朱子来到浦上村女婿黄榦家中，适逢黄榦外出。女儿朱兑看到父亲来，又高兴又内疚。因家贫，她只能煮一碗葱汤麦饭来招待父亲，十分过意不去。朱子看到女儿心里难过，就当场写了至今广为流传的《诗慰女儿贫》来安慰她：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

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天下总是苦人多，前村还有未炊时。朱子和黄榦一生清正廉洁、心忧天下。确实，我们听过朱子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办了很多书院，但没听说过他为自己置办了多少资产。朱子的子女、女婿也没有因为有个为官的父亲、岳父而沾什么光。听这故事，读这诗作，我们深深体会到朱子和黄榦的安贫乐道、清廉自守，体会到他们翁婿二人毕生致力学术、心忧黎民的博大胸怀。

### 紫阳讲学育新风

朱子曾称：“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朱子的挚友、南宋大文豪吕祖谦是这样写福州读书盛况的：“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吕祖谦与朱



紫阳社区讲堂胜境

子、张栻合称“东南三贤”，朱子曾把儿子朱塾送到吕祖谦门下做学生。

朱子讲学是引起轰动的大事。当年朱子到湖南岳麓书院讲学，数百名两湖学子不远千里赶来聆听，以至把岳麓书院的水都喝光了，还留下“朱张渡”“赫曦台”等传说和遗迹。800多年过去了，湖南学子至今还把当年他与张栻对讲时的讲堂保留下来。当然，朱子在福州讲学，十里八乡的学子们都来听课，盛况空前。

走进紫阳社区，可见张贴满满的都是对朱子的介绍和朱子诗歌。当问及关于朱子当年在这里讲学的情况时，当地人说，“朱紫阳”是朱子别号。紫阳这个地名很早就有，是纪念朱子讲学定下的。福州人崇敬热爱朱子，直接把他讲课的地方命名为“紫阳”。

紫阳社区保留着讲堂古建筑，称“讲堂胜境”，就是老福州相传的地名“讲堂前”。紫阳讲堂朱漆黑瓦，形制古朴，一副金字对联“紫气东来胜境，阳光普照讲堂”悬挂在堂前。大堂的柱子上挂满赞颂朱熹的对联。许多名人过去都会来此祭拜朱子，如萨镇冰等。

这里有三个地方都称为是朱子讲学的旧址，即讲堂正境、东境。

朱子来福州，每每开堂讲学，广纳门生。他在福州讲学带动了福州书院建设和学习风气的形成。福州这一带宋代有书院11所。除了紫阳讲堂，还有竹林书院、贤场书院、高峰书院、濂江书院、龙津书院、龙峰书院、文公书院、吟翠

书院、丹阳书院、梅溪书院，多与朱子及其弟子有关。比如贤场书院在晋安区北峰岭头乡的前洋村。据说“前洋”便是“贤场”的谐音而来的。朱子在北峰有诗《题莲花峰》两首：“群峰相接连，断处秋云起。云起山更深，咫尺愁千里。”“流云绕空山，绝壁上苍翠。应有采芝人，相期烟雨外。”

确实，世代喜好读书的基因造就了福州人的灵秀气质。史书记载，福州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宋代福州人由进士及第而入仕途者比比皆是。产生状元14名，进士2247名，还出现“一科三鼎甲”的千古绝唱。古代福州还出了一个4岁能诗的进士。年仅4岁的蔡伯晞参加“童子试”，被赐予进士出身，为太子伴读。史书记载：“蔡伯晞，神童应荐，官拜秘书。”蔡伯晞经历五朝皇帝，享年85岁。朝廷还在福州温泉路附近建“尊儒坊”表彰他。福州因讲学读书“风气进而益上，彬彬郁郁，衣冠文物之选，遂为东南大都会”。

紫阳社区现有2200户，6800位居民。紫阳社区计划建立朱子文化长廊，更好地宣传朱子思想。紫阳社区之外，公交地铁紫阳站、紫阳立交桥赫然屹立。我想，以朱子名号作为地名的地方并不多，古代福州人民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朱子这位文化伟人的敬意。紫阳地名的延续，旨在朱子思想的延续。朱子思想的精华已经融汇到地名之中，融汇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血脉之中，代代延续。

## 八闽岳祖白岩山

唐 颐

闽清的白岩山，一代大儒朱子为之题词“八闽岳祖”。八闽的山脉主要有武夷山脉、戴云山脉、鹫峰山脉等，白岩山属于戴云山脉的北端，最高处海拔 1237 米。阅尽名山无数又久居闽北的朱子，为何将此桂冠赠予闽中的白岩山？令人不免诧异。

相传朱子三上白岩山，是在南宋庆元年间，即历史上极其黑暗的“庆元党禁”时期。奸雄韩侂胄大权独揽，朱子遭落职罢祠。接着，朝廷“攻伪”不断升级，先是斥朱子等人为伪党，继而定逆党直至死党，规定“四书”为天下禁书。在此高压下，朱子不少门生学子“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年逾花甲的朱子只能选择循避了。此时，他的同乡后辈，也是门生的闽清县令郑君瑞，不畏权势，顶住压力，悄悄向老师发出邀请函，朱子便乘一叶扁舟，顺闽江而下，避难于闽清。朱子过闽清留胜迹，有了与白岩山的一段缘分。



白岩山莲花峰崖壁上的“八闽岳祖”题刻

“八闽岳祖”四个大字题写于白岩山莲花峰的崖壁上。相传朱子题好那气拔山河的字后，将毛笔抛向云端，那笔落入“一线天”岩涧，长成了四方竹，并沿路成片繁殖开来。那竹茎粗如笔杆，叶片似笔毫，寓意白岩山方正挺拔，也寓意四方游客前来朝拜八闽岳祖。如今，四方竹成了白岩山一道独特的风景，沿途绿荫成林。那日，我们从山下的三溪乡三墩村驱车至白岩山山门，尚需 20 多分钟的车程，从海拔 680 米的山门登临莲花峰上的白岩寺，爬了 1000 多级石阶。如登极顶玳瑁山，还需再爬 1000 级左右的石阶。试想当



年朱老夫子在交通十分不便、路径简陋崎岖的状况下，是如何一步一步艰辛攀登的？究竟是什么风景吸引了他老人家？

白岩山是一个石头的世界。莲花峰是一座天然、巨大的石莲花，片片花瓣相托相扶，自下而上，错落有致，垒嵌成一个九五之尊的莲花宝座。宝座之上便是建于唐朝大中元年（847）的白岩寺。古寺虽小却古朴庄重，面临万丈深渊而屹立千年，透出一种大唐气韵。白岩寺背倚五老峰，这五座山峰是五块浑圆如山的巨石，它们相依相靠，摩肩接踵，亲密无间。有如高僧，围而论经，和合不同；又似隐士，桃花源中，心有灵犀。

白岩山的主峰曰玳瑁峰，其实也是由几块巨石相互支撑擎起的最高峰。有趣的是峰顶也是大石林立，互相轩邀，簇拥着一块厚重之石，其上镌刻“威震南疆”四个大字。我以为找到了第一个答案：莫非是白岩山石头的精诚团结、相互支撑、甘当垫底、侠肝义胆，感动了贫病交加、穷途末路的朱老夫子，使他感觉温暖，增添力量？

当一轮红日跃出东海，冉冉升起，当温暖的阳光洒满山川海岛时，东望福州，蜿蜒于群山平原、城市乡村之间的闽江，如一条银鳞闪闪的巨龙，昂首而入东海，浮在海面的岛屿，便是龙珠。南眺戴云山脉，万千山峰，奔腾起伏，近处的永泰姬岩诸峰，参差错列，翠如碧玉。鸟瞰西北两面，山野田畴，溪流鱼塘，桃红柳绿，屋舍俨然，炊烟袅袅……若逢人间四月天，峰顶遍地

杜鹃盛开，白岩山方圆数十里，唯此纯粹，唯此唯盛。那杜鹃，枝丫遒劲，抱团聚丛，抗风沥雨，生机盎然。花色品种众多，绛红色、粉红色、黄色、白色，五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故玳瑁峰又名“杜鹃山”。

我以为找到了第二个答案：莫非朱老夫子登临玳瑁峰，胸中涌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之慨叹？那一定是斯峰斯景激荡着他，使之拨云见日，高瞻远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

白岩山的得名源自山中石白如霜、如玉。明嘉靖年间的闽清人士陈良鼎，科举入仕，刚正不阿，曾上书直言，奉劝皇帝不应兴师动众巡幸而劳民伤财，引发龙颜大怒，遭贬返乡。陈良鼎一直是闽清人的骄傲，他咏白岩山的一首五古诗颇具特色：

白岩真奇绝，望之何皎洁。

清夜吐光芒，好似满山月。

满山的石头因为都富含石英矿成分，所以有着玉骨冰清的容颜，在骄阳之下愈显洁白皎皎。而在月明星稀之夜，月光洒在富含星星点点的石英的岩壁上，正如陈良鼎诗中所描述的，星月与白岩争辉了。所以，这里又是耐得住寂寞的人读书修身的好场所。山中有一古迹，名曰“静室”，四壁皆石，只有一处天然的“门”与“窗”。相传是明代翰林学士黄文焕的读书处。书室临窗不远，有一块岩石如倒挂的钟，当黄文焕读书久了想打瞌睡时，钟就“当”地响一声，提醒他读书



不可懈怠，原来是岩上一株枳树落下的坚果，不时敲钟督促学子，后来功成名就的黄翰林为之题词“倒挂钟”与“静室”。

那日我们登白岩山，游兴甚浓，乐而忘返，下山至“仙人镜”景点时，天色渐黑，抬头只见一座巍巍石崖直插云天，如斧劈刀削一般平整的岩壁上，十分工整地浮现出一块长约三丈、宽丈许的镜子，如人工镶嵌一样精致。“镜面”在夜幕下闪着寒光，照得山谷愈发冷清、寂寥。当地相传，天宫七仙女经常下凡游览白岩山，当地的土地爷特在此镶块大镜子，好让仙女们理鬓补妆，心情愉悦地游山赏景。

我以为这是第三个答案：洁白一身、寂静无语的白岩山，最适合朱老夫子的秉性，他老人家无论骄阳下还是星月里，都喜欢与白石为伍。

白岩山还是一座鬼斧神工、形态丰富的大山。山上 108 景，景景都有名称，景景犹如一幅图画。如骆驼峰，肖似一只高耸驼峰、忍辱负重、默默前行的老骆驼。

“蟒蛇出洞捕青蛙”就如一组生动的连环画：第一幅是山中茂林深处，伸出一块大石，状如蟒蛇头，欲捕眼前的青蛙；第二幅是警觉的青蛙发现天敌，急忙逃生，一蹦就到十几里的山下；第三幅是垂涎欲滴的蟒蛇，闪着绿光的两眼仍紧盯着山下田间的青蛙，惊魂未定的青蛙正回首张望。

山腰有一岩洞，一条石鱼一丈八尺长，悬挂洞中，鱼头伸出洞口，游人用手摇晃，鱼尾似乎还在摆动。相传，古时山下乃有湖泊，一只鲤鱼精兴风作浪，涂炭百姓，土地爷将之捕捉，用岩石夹在洞中，欲坠不坠，半死不活，故名“悬鱼洞”。

著名的龙洞藏在骆驼峰的肚腹，探访龙洞实属不易，必须攀爬一条悬崖峭壁，龙洞门仅容一人侧身而进，但洞内另有天地，可登七层楼高的洞中之洞。

“白玉泉”为宋代诗人白玉蟾游山所得而名，洞中泉水潺潺，终年不息，清澈甘冽。“蛙嘴岩”似一只巨蛙，张开血盆大口，敢吞日月；“风动石”有如累卵之危；“石笋”数根，则亭亭玉立……让你见过后便萦系于心，难以忘怀。

我不知道朱老夫子见过山中几多景，是否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但对白岩山气象万千的自然风物，他一定收获满满。这也该是第四个答案了。

于是，集理学于大成的一代大儒，端起如椽大笔，一挥而就——“八闽岳祖”。

## 屠呦呦先祖的船政缘

陈悦

著名科学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出生于浙江宁波。近年，宁波的地方史学者对天一阁博物馆所藏《甬上屠氏宗谱》进行深入研究，在其中理清了屠呦呦的家族谱系传承，追溯出屠呦呦的父亲屠濂规、祖父屠用愈、曾祖父屠宗年等信息。屠呦呦的曾祖父屠宗年是一位宁波籍船政军官，由此实际为船政和宁波的深厚渊源增加了一个新的注脚。

船政和宁波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船政诞生前的1862年。当时担任宁波海关税务司的法国海军军官日意格，负责配合法国海军在宁波设立了一座造船厂，雇佣宁波等地的中国工匠，利用从遥远的克里米亚地区运来的舰船轮机装备，从1863年至1864年建成了4艘蒸汽动力炮舰，由法国海军军官德克碑指挥，担负宁波的巡防捕盗工作。也就在1864年，当时驻节在杭州的闽浙



屠呦呦

总督左宗棠注意到了宁波的这座法军造船厂，开始思考有关中国人自造轮船和图强的问题。多年后，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奏申请在福州马尾设厂造船，曾充满感情地称，自己的计划酝酿已久，“怀之三年”，点算起来，三年之前就是



“万年清”号

宁波造船厂成功造出军舰之日。宁波船厂在 1864 年结束其使命，而主持、参与这座船厂建设的日意格、德克碑和很多后来被称为“宁匠”的宁波籍工人，此后的身影出现在千里以外的马尾，成为船政事业的早期开拓者。

船政诞生时，被左宗棠、胡雪岩等主事者招至马尾的宁波人除了工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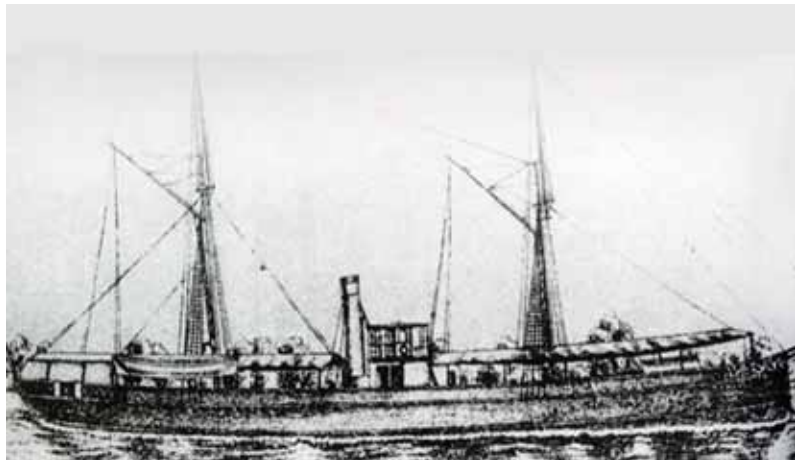
宁波是航运业发达的城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成为通商口岸，本地有大量的青年在西方商船上充当水手，谋求生路，也由此渐渐在宁波的一些县份、乡村，形成了以从事西式船只舵工、水手为职业的群体。1854 年，宁波船商集资购买了一艘蒸汽动力轮船“宝顺”，即大量由本地的青年充任船员。左宗棠坐镇浙江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现象，1866 年创建船政，考虑到未来驾船需要人，一批曾经有过轮船工作经验的宁波人被网罗到福州，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曾经担任“宝顺”

轮管驾的贝锦泉，而屠呦呦的曾祖父屠宗年也就在这群人之中。

随着船政自行建造的军舰日益问世，这些来自宁波的舰员又不断召唤亲朋投效船政，在船政后学堂尚未培养出海军军官的年份里，宁波籍舰员成为船政水师的人员骨干。

以船政建造的第一艘军舰“万年清”为例，在初建成时全舰编制 98 人，宁波籍舰员就多达 93 人（另外 5 人分别来自泉州、绍兴、上海、松江、宝山），籍贯主要分布于宁波府所辖的鄞县、镇海、慈溪三县，其中来自鄞县屠氏家族的就有三副屠友才、水手头目屠宗年等。

屠宗年，字鹤亭，号渔庄，1836 年 2 月 9 日出生于宁波鄞县，早年的身世情况较为模糊。因为某种机缘巧合，他学会了与近代轮船相关的作业，凭着这种特殊技术，1866 年后随同乡贝锦泉等来到船政，最初以军工身份在船政的“华福宝”等炮舰上任职，后调至船政自造军舰上担任



“湄云”号

高级军官。

1871年，船政奉旨以自造的军舰为主编练舰队，旋即开始实施军舰外拨各省的调拨驻防制度。船政舰队所属的军舰分防到全中国沿海所有的通商口岸，一时间随着船政军舰的进驻，中国海防初步迎来了近代化的曙光。所有驻外的船政军舰中，离“家”最远的是远赴盛京的“湄云”舰。

“湄云”号是船政历史上建造的第二艘军舰，舰名取崇敬天后妈祖之意。1872年当时的盛京将军奏请清廷批准，将“湄云”调往盛京的海上通商口岸牛庄（今辽宁营口）驻扎，担负当地的海上巡防、捕盗等任务。屠宗年可能就在此时随着“湄云”远赴牛庄，到了1873年时已经成为“湄云”的舰长，官职升迁为都司衔军官。

随后的时光里，和大部分驻外船政军舰一样，“湄云”在驻防城市长期戍守，保卫海疆安宁，也使得船政故事在这些远离福州马尾的地方

传播，形成了船政文化中十分独特的驻外军舰文化。在营口牛庄当地人的记忆中，“湄云”是一艘无畏的英勇军舰。作为整个辽东海岸线上重要的巡防舰，“湄云”虽然以牛庄为驻地，但航迹遍及鸭绿江口至旅顺大连湾乃至朝鲜半岛的广阔海域，因捕捉盗匪得力而著名。

在进驻黄渤海域的第二年，该舰便一举击破海上巨盗，抓获匪船。经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获准，屠宗年因功升迁补用守备，赏戴花翎。此后随着“湄云”在北洋不断立功，屠宗年在1880年升迁至副将衔补用游击。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西海岸牙山湾偷袭中国军舰和运兵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驻扎牛庄的“湄云”备战之际，任职该舰舰长20多年的屠宗年在8月18日因病去世。转年的3月，日本第一军击败守卫牛庄的清军，在牛庄船坞中避冻的“湄云”落入侵略军之手，船政军舰驻守营口牛庄的历史也在此时悄然落幕。

# 沈葆楨世家与江南造船厂

沈 园 / 沈 蕾 / 李 纾

孙中山于1912年元月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时任海军总长的福州人刘冠雄，即邀请并促成了他参观中国制造舰船的两大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和马尾船政局。

孙中山解职后即于4月5日与4月21日马不停蹄地造访国内制造舰船的两大军工企业，足以见得海军海防对我们国家之重要，乃国之重器。

马尾船政局是近代海军及航空事业的发源地。作为近代中国海军之父，船政大臣沈葆楨（文肃公）对建造军舰的贡献自不用多说。从始于沈葆楨（总理船政大臣）的第一代，至庆字辈的第二代（如沈瑜庆，江南水师学堂总办），至清字辈（如沈翊清，船政会办大臣、船政总稽查；沈颀清，福州船政局局长）的第三代，至颀字辈（如沈颀宸，海军中将，福州海军制造学

校、海军学校校长；沈颀冕，海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沈颀笏，海军总司令部公署候补员）的第四代，至祖字辈（如沈祖同，福州海军学校航海专业第一届毕业生；沈祖贤、沈祖熙，省立航空机械商船职业学校学生；李舒平，马尾造船厂副厂长，福建船舶工业公司经理）的第五代，沈氏船政子孙绵延数代，为中国的海军和海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百年前，当孙中山造访福州马尾时，负责接待孙中山的正是沈葆楨长子沈玮庆的第五子沈颀清（1876-1915）。沈颀清又名希南，字螭男。1897年，沈希南考入福建船政后学堂第十四届驾驶班，后奉派为船政第四届出洋生（出法学船机、出英学造舰）。1903年，沈希南再次奉派赴美国留学，获得制船桥梁工程师文凭。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局副局长、工务长；民国元年



马尾船政16号舰“元凯”号

(1912)兼摄局长。任船政局工务长期间，曾带领船厂工程技术人员攻坚克难，研制出马尾船政史上最先进的商船——“江船”号（船长87米，排水量2160吨，新式省煤立机，三缸功率5000马力，航速15节，全部钢肋钢壳）。这是清末船政制造的第40号船，也是最后一艘船。随后，又创造了一项中国第一：他带领员工，根据法国图纸制造出中国第一艘折叠式水上飞艇，以厚篷布为船底，船舷、船艏、船尾皆用薄木片，轻如一片，可坐一人；能折叠收展，改变形状，面积较少，重量轻，手提背负，开合自如。

4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乘“泰顺”（Tai Shun）号轮船南下，4月19日在马尾船政制造的“元凯”舰的护航下，于4月20日抵闽江口。福建都督孙道仁派代表陈恩焘到闽江口等候。11时，“泰顺”号停靠马尾码头后，船政局副局长兼

摄局长职务的沈希南率欢迎队伍在码头迎接。沈希南等官员以及船政局员工与群众先期云集在马江罗星塔等候。孙中山先生在船上接见了各级官员。

4月21日午后，孙中山至马尾参观福州船政局，船政局代局长沈希南等陪同孙中山一行及从省城来的官员，从铁水坪登岸，参观了船槽及轮机、锅炉、拉铁、铸铁、铁肋各厂，继至工程处小憩并接见了在局人员。

当晚沈希南在储才馆设宴招待孙中山一行。孙道仁、彭寿松等70多人出席。沈希南首先朗读颂词，接着孙中山发表答词：“船政足为海军根基。”其间，他还表达对马尾船政局领导沈希南的殷切期望。他说：“沈君在欧美习学制造有年，办理必能称职。且当时此局，系沈君令祖文肃所创设。从此沈君绳其祖武，勉力进行，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并驾齐驱，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则文所厚望于沈君也。”

船政大臣沈葆楨后裔不仅对马尾船政，也对省外的江南造船颇有贡献，这仍在情理之中。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于2022年6月17日上午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厂举行。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多吨。造出这艘舰的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所属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军工造船企业。它创建于清朝同治四年（1865），

历经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江南船坞、海军江南造船所、江南造船厂。1996年改制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这一日子里，当我们用心对沈氏族人或口述或笔述的历史做一回顾，即可发现沈葆楨后裔对江南造船厂乃至对建造航空母舰确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在省外为海军效力的沈葆楨第二代代表人物是沈瑜庆（1858-1918），初名志雨，字爱苍，号涛园，沈葆楨四子，出嗣尔康（廷元子、大铭孙），移居上海。邑庠生，清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举人，特用主事，刑部广西司行走、江南水师学堂总办。

在省外的江南造船效力的沈葆楨第三代代表人物应是沈覲赓。

据《武林沈氏迁闽本支家谱》记载：沈覲



海军江南造船所职员录，其中可见沈继（歌屏）即沈覲赓

赓，字歌屏，永清三子，颀清嗣子，福州海军飞潜学校毕业海军二等造械官，船政局见习，江南造船所材料课课员，配饶氏名婉贞。沈毓炳，字子輝，良迈长子。福州海军飞潜学校毕业生，供职上海海军江南造船所，西安空军供应处督察官。沈覲赓、沈毓炳、陈长钧（配沈覲宸次女沈燕）三人为福州海军飞潜学校第三届（丙班制机 1910-1925）同班同学。陈长钧毕业后留学英国，回国后任上海江南造船所少校工程师。抗日战争中在湖北宜昌中央航空委员会飞机修理厂任课长，专修美、苏飞机发动机。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澎湖马公造船所所长（上校）兼总工程师。

由此，这三人可称为第三届“丙班制机”为上海海军江南造船所服务的沈家“三剑客”。

其中，在沈葆楨→沈玮庆→沈颀清（玮庆五子）→沈覲赓（颀清子）→沈祖贤（覲赓二子）这一房中，正因为有了沈颀清（福州船政局局长）、沈覲赓（江南造船所材料课课员）、沈祖



螺洲陈氏的杰出人物：首任江南造船所所长陈兆鏞与林夫人



贤（省立航空机械商船职业学校学生）祖孙三代人的坚持，使之成为沈葆楨后裔参与船政事业唯一延续的一脉。而沈颢赓长子沈祖德则因就读北京俄语学院而中断了他这一脉的链接。沈祖德长女沈园在上海海事大学所学专业则是港口、造船起重机械设备设计与制造，不知这“回马枪”能否为其父重续上中断的一环？

沈家亲家陈兆锵，系海军江南造船所所长与福州船政局局长双肩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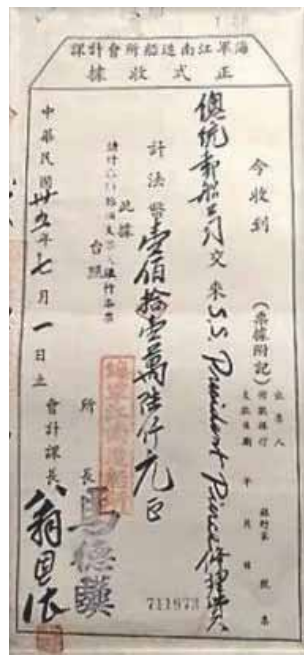
陈兆锵（1862-1952），字铿臣，闽侯县螺洲人。福州船政学堂管轮班毕业。民国元年（1912），以少将衔，首任江南造船所所长，仅3年，制造各类舰船89艘，总排水量达17074吨。民国四年，陈兆锵晋升为轮机中将，调任福州船政局局长。民国五年又督办福州制造学校和海军学校。民国六年创设海军飞潜学校，并兼校长。第二年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接着又制造出教练机、巡逻机等4架及军用飞船2艘。民国十四年，飞潜、制造、海军三校合并为“福州海军学校”，陈兆锵仍兼校长，并兼闽海关督办。是年陈兆锵奉令回江南造船所任所长。陈兆锵在马尾船政局11年任内制造飞机15架，培养飞潜学生56人。

为加强江南造船所自身的技术力量，陈兆锵从福建马尾调来飞潜学校毕业生王荣宾（后为著名舰艇专家、上海市劳动模范）、陈薰（后为上海沪东造船厂总工程师）等23人到造船所任职，为日后为美国承造万吨级轮船，造炮艇6艘，开

创蒸蒸日上的局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陈兆锵将自己的长女陈任君嫁给了沈葆楨的曾孙——沈颢宜。沈颢宜（1895-1969），字来秋，沈颢清三子。在颢字辈中，螺洲帝师陈宝琛家族与沈家联姻的还有：陈宝璐长女陈瑟如与沈翊清长子沈颢平（福建船政秘书，经营造船工程14年）；陈宝璐次女陈秀贞、三女陈锦贞与沈翊清四子沈颢冕（海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陈宝琦长女陈露西与沈永清二子沈颢康（欧亚航空公司西安站站长）。

与陈兆锵有着类似双肩挑履历的是江南造船所所长马德骥。从1937年底到1945年8月，江南造船所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马德骥在这8年里



海军江南造船所所长马德骥在为美国承造“官府”号系列万吨轮的收据单上签字

与江南造船所的命运紧密相连，人称：一个人的抗战。

马德骥毕业于南洋海军学堂，曾在英国学习造船，后来转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专攻舰船制造。回国后，他被调往福州船政局任职。1927年9月26日任海军福州马尾造船所所长，并兼代海军江南造船所所长。1930年4月21日任海军江南造船所所长。1935年5月17日复任江南造船所所长。

“福州马尾造船所”与“海军江南造船所”皆受一位所长的统领，这也说明中国这两大制造舰船的军工企业形同一家人，曾密不可分。

陈绍宽（1889-1969），字厚甫，福州人，中国现代海军创始人之一，国民政府海军部长、国民革命军海军一级上将，有“中国海军航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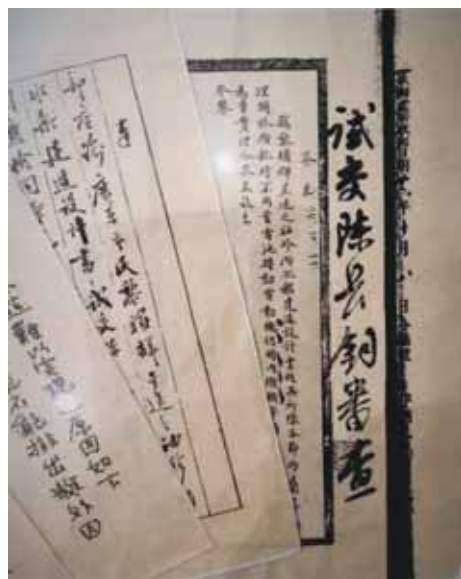
父”之称。

1917年5月，他随英国海军战列舰和潜艇部队参战，目睹了世界上第一艘航空母舰“暴怒”号的下水和作战。从航母起飞的英军飞机轰炸了德军的基地，显示出强大的作战能力。陈绍宽意识到航空母舰对现代海战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海军要发展，一定要赶上世界海军发展的潮流，也要建造航母。

他据自己在欧洲考察海军和在英国参战的所见所思，写了一份报告书，形成了他初期的海防思想——对中国海防与海军现状，深表忧虑。沿江、沿海炮台设施陈旧不堪一击，而军舰年龄太长，战力有限。中国需要建设基本的岸基炮台、战列舰、航空母舰这样的海陆空海防力量以遏制英、日等列强于海外。



右一陈绍宽（男宾相）；右二沈颢宜（新郎）；左二陈兆鏞长女陈任君（新娘）



陈绍宽1937年批转交沈燕（沈颢宸次女）夫婿陈长钧审查的海军部文件

1928年12月5日，刚刚晋升为海军署长的陈绍宽，就亲笔撰写了《条陈扩充海军呈文》，提出了建设发展海军的若干建议。

其中，有这么一条：“兹拟以最低限度，请添造驱逐舰四艘，约须1200万元；潜水艇二艘，约须600万元；巡洋舰三艘，约须3000万元；航空母舰一艘，约须2000万元。”

正是此条建议的最后一项，让陈绍宽成为中国提出建造航母的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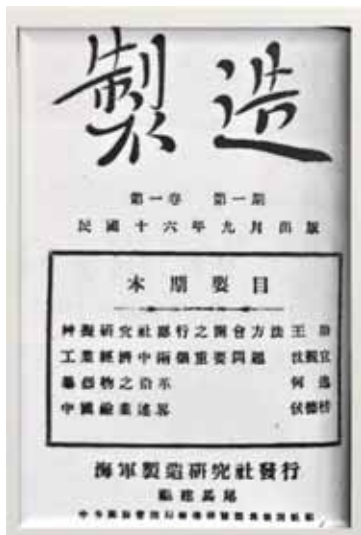
陈绍宽毕生都在追求他的“航母梦”，他执掌民国海军17年，是孙中山海权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执行者，并进一步加以发挥和运用。

沈颢宜（来秋）与陈任君（秀莹）结婚时，男宾相是当时任海军司令部副官的陈绍宽。

沈家与中国早期专门研究舰船、飞机制造的学术研究期刊也有关系。

沈颢宜（1895-1969），字来秋，黻清三子。青岛大学、同济大学毕业，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获博士学位。1924年沈颢宜回到船政局工作，任海军造舰少监、福州船政局制机主任、军需主任。民国十五年（1926）他和船政局巴玉藻（中国飞机制造的先驱者，时任船政局飞机制造处主任）、王助（波音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时任船政局飞机制造处副主任，配萨镇冰的孙女萨闰琛）等人，发起成立“海军制造研究社”。

这是中国最早的学术研究团体之一，是中国最早专门研究舰船、飞机制造和其他工业的学术研究团体，吸引了江南造船所等全国各大造船厂



海军制造研究社社刊《制造》（季刊）创刊号

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技界的专家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的影响极大。

1927年5月1日，海军制造研究社召开成立大会，沈颢宜和巴玉藻被推举负责主编社刊《制造》（季刊）。期刊第一卷第一期于同年9月出版发行后，巴玉藻赴欧洲考察各国的航空实业，直到1929年才回国，不久便逝世。所以从第二期开始，就由沈颢宜主编。期刊质量可与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媲美。

总之，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的下水，当是圆满地圆了福州人陈绍宽未竟的航母梦，也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对沈葆楨之孙沈颢清“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的厚望。

福州人民遥望这艘令国人无比自豪的福建舰出坞下水，也足以告慰近代中国海军之父沈葆楨的在天之灵：功不在我，功必有我。

## 跨越生死的爱约

胡映泉

2014年11月22日，一位福州93岁老人在位于台北的“国民革命忠烈祠”内，抚摩着自己第一任丈夫钟崇鑫的灵位，深藏心底多年的思念顿时涌上心头，禁不住潸然泪下。她对着灵位喃喃地说道：“崇鑫啊，我来看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从此我们再也不分离了！”这是一场苦苦等待了77年的爱情之约，也是一则极为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钟崇鑫1905年出生于重庆辖下的荣昌县，1929年从黄埔军校第六期工兵科毕业后，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军官。由于常年戎马征战，直到1935年，他已届而立之年还未成家。这一年，他所在的第71军第87师驻防福州。经人介绍，他与当地的一位妙龄女子相亲。这位女子名叫张淑英，1921年出生于福州台江，父母是生意人。14岁时，刚念完女子私塾，随父母搬到台江洋头口一带，父亲在茶亭做海鲜生意。在父母的安排



钟崇鑫与张淑英

下，她与这位军官相约见面。那一天，她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了西湖公园。那是个春光烂漫的时节，精心打扮的她却无心欣赏西湖美丽的风景，或许心里过于紧张，同时还掺杂着一种对于军人的疑惧。然而，当见到对方之后，她很快就由紧张和疑惧变成了惊喜和倾心。多年之后，她仍然清晰地记得对方给自己留下的初次印象：“他眉毛很粗，轮廓长得很好，五官端正，1米75左右的个子，长得高大却很温柔。”张淑英长得也很端庄

秀丽，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钟崇鑫对她也十分满意。两人一见钟情，交谈甚欢。于是，双方家庭为此订下了婚约。

订婚后仅一个月，即1935年5月19日，两人在福州举行了盛大婚礼，办了40桌酒席。婚礼现场张灯结彩，异常热闹。钟崇鑫还特意弄到了一套西式婚纱装扮新娘，并亲自开车前去迎接。多年之后张淑英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穿着军装站在车旁的样子，显得器宇轩昂又温文尔雅。婚礼上，新娘挽着英俊新郎，脸上洋溢着喜悦、幸福的笑容。她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我嫁他时，其他人都对我父母说，你们女儿呀，好好的福气，嫁了这么个如意郎君。”

结婚后两人非常恩爱，钟崇鑫按照福州习俗，叫张淑英“阿妹”，对她体贴入微，把自己的军饷都交给她打理，一有空闲都会陪她逛街，买她喜欢的东西。她回忆说：“他总是带着笑，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他不喜欢我浓妆艳抹，最喜欢我穿着淡淡的蓝色衣裙，在家门前等他回家。”为了提高张淑英的文化水平，他还时常陪着她读书、写字。

钟崇鑫时常给张淑英讲保家卫国英雄的故事，言语之间充满敬佩。他家乃是三代单传，父亲过早去世，母亲劝他守着家里的几亩田地过安稳的生活，但在他看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生不能只是这么点小小的格局。他经常对张淑英说起这句话：“当兵就要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他开导她说，如果有一天自己真的不在了，要她

不必过度悲伤。她当然不希望这样，但也理解了军人的使命和担当。

结婚后不久，钟崇鑫所在的第87师调到南京下关驻防，张淑英也随他来到南京。钟崇鑫平时军务繁忙，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每到星期六，张淑英就十分激动，一旦听到马靴踩在地上的声音，就赶紧过去开门。她笑道：“他穿个马靴，马靴的链子很粗。走路很重，很带劲。我听到那个声音就知道他回来了。”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无数热血男儿纷纷走上战场，英勇地抗击日军的侵略。钟崇鑫也为这场战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战争爆发时，他已升任国民党军队第71军第87师第259旅参谋主任（旅长是易安华），中校军衔。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始后，第87师被军委会秘密调往淞沪地区，准备执行国民党军队最高机密军事行动——一举歼灭驻上海日租界内的日军海军陆战队。

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钟崇鑫匆匆回到家中，告诉妻子自己的去向，并说这一次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让她不要担心。见面时间匆忙，他没有时间诉说更多。张淑英坚持要送他去车站。到车站后她就转过了身，不忍心看着丈夫上车的背影。钟崇鑫却从背后抱住她，安慰道：“阿妹，我会回来的。”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成了他们的最后一面。

1937年11月中旬，蒋介石命令上海的作战部队撤出战场，淞沪战役以中国军队的失败告终，但此战也有力地抗击了日本侵略军，使其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破灭了。随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命令日军追击西撤的国民党军队，挥师直指南京。蒋介石组建了南京卫戍军，总兵力约15万人，委任唐生智为司令，守卫南京。

12月7日，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在为期6天的南京保卫战中，战斗最为惨烈的当属光华门战役和雨花台战役。钟崇鑫随部撤到南京后，所在的第259旅和第260旅以及教导总队第一旅第2团谢承瑞部，共同防守光华门和通济门。

12月9日凌晨，日军出动大批轰炸机轰炸国民党军队阵地，随即第9师团第18旅团第36联队主攻光华门。第9师团炮兵联队轰击光华门，将光华门外瓮城拱门附近墙体炸出了数个豁口。之后，第36联队第一大队组织了一支决死队，沿着光华门前护城河上的夔角桥，向光华门作决死冲锋。战斗十分激烈，守军屡屡打退日军的进攻。

12月10日上午，日军第9师团重炮兵部队，在高门桥向光华门、通济门、中山门猛烈轰击，将光华门、中山门之间的城墙炸开了两个巨大豁口，将光华门外瓮城拱门上的墙体炸塌。第18旅团又派出第35联队一个大队，再次向光华门发起猛攻。

10日下午，部分日军突击到了光华门外瓮城的城门洞里。第71军军长王敬久命令第259

旅旅长易安华和第261旅旅长陈颐鼎迅速收复光华门。易安华与钟崇鑫组建了一个加强团，两人分任正副指挥长，与陈颐鼎相约黄昏打出信号同时行动。易安华与钟崇鑫率领加强团向东北方向的敌军阵地穿插，陈颐鼎率261旅两个加强营由北向南猛攻。战斗异常惨烈，易安华亲临前线指挥，头部和右臂中弹后仍带伤坚持指挥。日军第36联队第1大队也伤亡惨重，大队长伊藤善光少佐被击毙。战至深夜，守军终于全歼了光华门城门洞的敌人，收复了阵地。

12日，日军凭借炮火上的优势，压制住了守军的火力，重新占领了光华门城门洞。第259旅加强团伤亡过半，易安华的腰部被弹片击伤，伤势严重，被抬上了担架。此时他们已与第87师部失去了联系，钟崇鑫只好率领残部转移。因通济门、雨花门、中华门都被封死，他们无法入城，就只好向城墙外西边的莫愁湖方向转移。在突围过程中，他们又遭到了日军的围攻，钟崇鑫率部迎战，不幸中弹阵亡，时年32岁。易安华也遭到炮击，壮烈殉国。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遵照蒋介石指示，下达了撤退令，南京宣告沦陷。

钟崇鑫开赴上海后，因形势日益紧张，张淑英便和婆婆离开了南京，回到丈夫的家乡重庆荣昌。此后她一直在焦心地打听丈夫的消息。后来她谈起当时的心境，感慨地说道：“一日如三秋，那个日子不好过，真的不好过，你盼望一个人啊，天黑了问天亮，天亮了问天黑，一天盼一

天，越盼越久。”婆婆也是以泪洗面，忧心儿子的生死。时间在焦心的等待中变得十分漫长，张淑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没有消息，至少意味着丈夫还有可能活着。”

1944年的一天，张淑英在荣昌的街道上碰到了钟崇鑫的战友方维鑫。方维鑫告诉张淑英，钟崇鑫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在方维鑫的联络下，钟崇鑫生前所在部队给张淑英发来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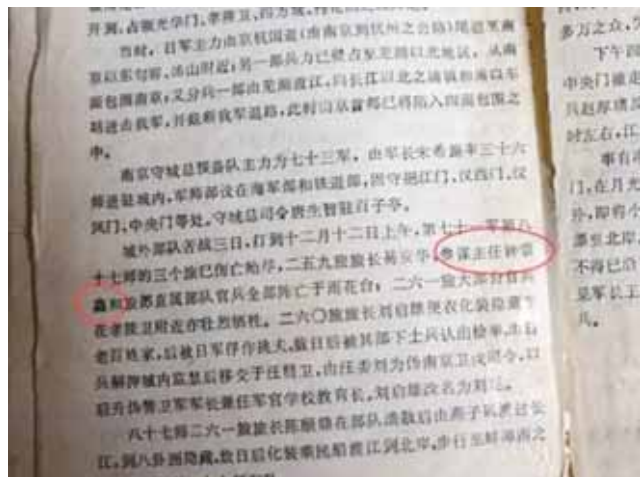
“兄阵亡，无法函告，军座经常想起钟兄英明才干，至今耿耿于怀。”她得到这一确切消息后悲痛欲绝，多年的焦心等待，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二年，婆婆因为悲伤过度，就离开了人世。这样，夫家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曾为钟崇鑫买过一块蓝色布料，要为他做一件衣服，如今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她就用这块布料给自己做了一件蓝色旗袍，并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当她穿上这件旗袍时，就会想起自己的丈夫。

婆婆死后，张淑英一度回到福州娘家。内战爆发后，她的父母和弟弟要去台湾，要她也一起走，但她心里放不下钟崇鑫，毅然选择留下，并又回到了重庆，要为他守着这个家。同时，她心中还存有一丝侥幸，说不定丈夫并未阵亡，只是暂时失踪了，她要留在大陆，等候他归来相聚。即使丈夫真的阵亡了，她也要弄清他的下落，到他阵亡的地方烧一炷香，祭奠他的英魂。就这样她一直留在了重庆，由一个说福州话的福建人变成了一个满口地道重庆话的重庆人。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丈夫始终杳无音信，张淑英也渐

渐绝望。

在重庆，张淑英孤苦一人，艰难度日。许多人同情她的处境，劝她再去找个男人有个依靠，但都被谢绝。直到1949年，她才嫁给了第二任丈夫李自清。李自清对她很好，两人一共生育了两儿一女。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她一直把对钟崇鑫的思念埋藏心底，不对家人吐露半字，只是在思念他的时候偷偷地流泪。

1988年，张淑英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她才将尘封的往事告诉孩子。她让大儿子去南京打听钟崇鑫牺牲的具体地点以及当时的战况，但一无所获。后来大儿子在一本《江苏文史资料选辑》中找到了一点线索。书中收有一篇题为《淞沪会战暨南京失守纪实》的文章，作者仇广汉，当年第87师的师部参谋，是钟崇鑫的下属。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城外部队苦战三日，打到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第七十一军地八十七师的三个旅已伤亡殆尽，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参谋主任钟崇鑫和旅部直属队官兵全部阵亡于雨花台；二六一旅大部官兵在孝陵卫附近壮烈牺牲。二六〇旅旅长刘自群便衣化装突围，后被日军俘获，数日后被其部下士兵认出枪杀，未及解押城内监狱后移交于汪精卫，由汪委刘为伪南京卫戍司令。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陈顺德在部队溃败后由燕子矶渡过长江，到八乡洲隐居，数日后化装逃往南京以北，步行至蚌埠南之



《淞沪会战暨南京失守纪实》中提到钟崇鑫阵亡的部分



张淑英在台湾忠烈祠内抚摩着丈夫钟崇鑫的灵位

崇鑫和旅部直属部队官兵全部阵亡于雨花台；二六一旅大部分官兵在孝陵卫附近亦壮烈牺牲。”仇广汉老人知道了张淑英的事迹后，还专门给她写了一封信，讲述当年钟崇鑫的牺牲过程。

转眼到了2014年9月，张淑英听说有一个民间慈善团体发起了一个“寻找你身边的抗战老兵”的活动，立即让小儿子电话咨询，看看能否打听到钟崇鑫当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的真实情况。志愿者听说这一感人的故事后，立即行动起来，找到了钟崇鑫仅存的一张照片——当年从黄埔军校毕业的照片，并得知位于台北的“国民革命忠烈祠”内供奉有钟崇鑫的灵位。张淑英得到这一消息后激动不已，不顾93岁的高龄，且左眼又刚做完手术，执意要亲自去一趟台湾，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再亲眼看一看自己心爱的人，哪怕只是他的灵位。

2014年11月22日，在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张淑英和她的子女以及志愿者，搭乘班机来到台北。23日上午，她手捧鲜花，走进

了“国民革命忠烈祠”，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这趟台北之行只有短短的六天，她每天都要去忠烈祠。但再怎么不舍，终究还是要离开的。回程的前一天，她又去忠烈祠作最后的告别。她对着钟崇鑫的灵位深情地说道：“上一次你和我永别了，现在我又和你永别了。我已经93了，恐怕不能再来看你了，咱们来世再见吧！”

2015年的清明节，经过有关方面的努力，钟崇鑫的灵位被请回了重庆南山福座的“长青堂”革命纪念馆，抗日英雄终于魂归故里。这让张淑英老人感到无比欣慰。有人问她，如果人生重来一回，还会不会再选择这个男人，她坚定地回答说：“我还是要选他，我喜欢他，我喜欢他的善良。我除了他哪个都不想选，就是要选他。我为了他到四川来，落那么多难，受那么多苦，我都没后悔！”

这个最大的心愿完成之后，老人对生死看得很淡然。她对子女说，反正都是要走的，如果我走了，后事从简。但她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回到自己和钟崇鑫新婚的福州，重新回味那份爱情的甜蜜。她和钟崇鑫在福州的西湖公园一见钟情，那里有他们在一起生活的痕迹。为了丈夫，她一直守在他的家乡重庆，如今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看看他们爱情发生的地方。

2021年10月26日，100岁的她真的走了，走得十分从容、安详，像是去赴一场与心爱之人的浪漫之约。



# 半山古厝记忆

吴安钦

在这座不大不小的古厝里，我整整生活了二十四年。

我懂事的时候起，这座古厝就已经很老，大厅的几根顶梁大柱，不仅褪成了灰白与赤褐斑驳的色彩，柱身还有了许许多多因风化而皴裂的缝隙，仿佛被岁月的利刃一刀一刀用心刻下的印记。还有青铜般的础石，雕塑有花鸟草木的纹理，早已经被时光消磨得印象模糊，光滑可鉴。从这些可知，古厝的历史已经十分久远。正如祖母说的，她祖父的祖父就在这幢祖厝里生活过。大厝像传家宝一样世代传递。

在我的心中，我们的大厝确实是一件宝藏。

从大门进来，有威武庄严的前彩屏门。这门只有到了办喜事的时候才打开，让新媳妇或女儿跨越高高的门槛或进或出。东西两旁是前厢房。入了前厅，映入眼帘的就是长方形的露厅，露厅比前厅低了一步三十厘米的台阶，地面由大条石铺设而成。不知它经历了多少风和雨，依然

排列齐整，神奇的是，无论下多大的雨，露天厅从来不会积水，却四处找不到下水沟。露厅左右两侧，各有两间书院。书院本来是读书之所，可是，我看到时却已成厨房。从这个露天井一样的石厅往前迈上三个台阶，便是正大厅。大厅的地面由灰、石子和土混合铺成，小石子嶙峋突兀，不知经历了多少人的踩踏，依然崎岖难平，光着脚板行走，脚底有如被刺的难受感。大厅的两边各是两间前后厢房。东西厢房是整个大厝中规格最高的屋子。在正厢房的两边又各有两间边厢房。同样，在后厢房的两边也各有着两间边后厢房。进这后厢房，隔着一扇高大肃穆而巍然屹立的后彩屏门。这个门不能随便开启，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打开这个门。因为只有大厝里的人“老了”才能开。开后彩屏门完全是治丧所需。后彩屏门的背后就是后厅，在我的感觉里，后厅是阴暗之地，后彩屏门打开时，后厅便放着一部黑黢黢的阴森的棺材。开后彩屏门还有个硬规矩，未

满五十岁的人“走”了，不能开这个门，只有上寿的人“老”了才行。这个彩屏门左右也各有一个通往后厅的小门。靠西的小门常年锁着，原因是，小门后可以放几部空着待用的棺材。这样，走后厅实际上只有一个东边门。跨出后厅门，还有一个小露厅。露厅后便是一堵贴着后山的石墙。后厅东西两边还有两间书院，称作后书院。后书院和前书院一样，都各有一扇通外门。只是前书院的通外门设在大厅的东西向走廊上。从这个房子的结构看，古人是很重视读书的，在一座不到三十间房的大厝里竟然设计出四间书院。可是，我所知道的四间书院，都没有藏书，更没有读书用的桌子。整幢大厝除了地上铺的石头和三合土，灰色砖块和瓦片外，其他的全是由木头木板榫接而成。在大厅的楠和弄连接处，还有前后书院、左右厢房的木窗上，都雕刻有各种各样的窗花。

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就是在这座充满传奇和神话色彩的古厝里度过的。

差不多是从五岁的那年起，我和我几乎同龄的玩伴开始在这里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七八个孩童从前厅到大厅，又从大厅到后厅，疯狂地奔呀跳呀，生怕被捉拿，鼠狼一样前冲后突。最惊险的是，爬上架在大厅走廊前的石板桌，纵身一跃，飞一般地往露厅下面跳。欢呼声、惊叫声，

总是一惊一乍地吓唬家里的大人，同时引来大人人们的劝退声或谩骂声。捉迷藏，常常玩到傍晚，在天将黑未黑之时。六七岁顽童也如初生牛犊，天不怕地不怕，怕被生擒活捉，竟然躲进后厅空着的棺材里！这是大人最为忌讳的。最受宠爱的阿松，在多次藏身棺材后，终于被他父母发现了。阿松被他娘狠狠地揍了一番后，我们终于明白棺材的用意。自此，大人为制止我们这拨人玩这个可怕的游戏，开始和我们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在我的印象里，与大厝有关的，最吸引人又让我们胆战心惊的却是关于鬼的故事。二表母说，棺材里有鬼的，谁躲进去谁倒霉。尤其是农历的七月，鬼无处不在。深更半夜不能随便叫人的名字。谁的名字被叫多了，被鬼记住了，会被鬼抓走。三表婶的故事更传奇。她说，每一座大厝里都住着火神和水神。水神强，火神则弱，这样，大木屋就不担心火烧厝。如果火神强，那么，火灾的危险性就大。古人对大厝所住的两神做过试验。端来一盆水，水盆中点燃一炷烛火，摆在大厅中央，然后静观其变。如果火神强，那么，当这盆水火摆上大厅的一刻钟内，便有一根细如竹丝的棉线，袅袅娜娜地从半空徐徐而至，飘飘然地落到盆上，仿佛一缕青烟，与烛火接引。此刻，火焰迅速飞腾而起，盆里的水，便如油一般，助力火势，熊熊燃烧。要是没有及时扑



灭，顷刻间，经过那缕青烟引导的火苗立即升腾到梁上及其屋脊，一场可吞噬古屋的火灾便发生了。听她这么一说，我常常替我的这座大厝担忧，生怕突然的一天，屋檐上飘然而来一根引火线，接上大厅上的火苗。因为我经常看见的情景是，逢年过节，大厅上的八仙桌总是摆满了祭祀先人的各种菜肴，桌上除了香喷喷的饭菜和酒之外，还有点着火的蜡烛，焚烧着或镶金或嵌银的黄色纸冥币，往往是，一烧便是半天。除此之外，我最怕的情景是，临做午饭或晚饭时，柴火灶里正烧着旺火，突然有人高声大喊：烟囱着火啦！第一次听闻这恐怖的喊声，不知其因，甚是好奇，随风风火火的大人跑到屋外。一看究竟，真吓人！烟囱里原本升起青烟紫云，此刻却冒出了滚滚黑烟！在一片紧张和慌忙之中，大人们搬来长梯，拿来长长的晒衣用的竹竿和食盐，飞快地往冒烟的烟囱爬上去。爬上屋顶的人，便用竹竿塞进烟囱，用力地自上往下捅，捅了一通后，又将带上屋顶的一碗或半桶食盐往烟囱里倒。这样，烟囱又冒青烟了。大厝里的大男人如行船出海不在家，摊上这事就十分可怕。女人和小孩看见烟囱出黑烟，干着急，喊着叫着，谁都无力爬上屋顶。虽然灶口里的火熄灭了，可烟囱上的黑烟依然滚滚而来，仿佛是，人的呼救声越大，黑烟冒得越浓厚，直至蹿出红彤彤的火苗，这下女

人们的呼唤声已成了哭泣声。所幸的是，在一片凄婉的哭喊声中，总有左邻右舍在家的男人们赶来施救。

祖母是缠脚女人，但却是个十分有主意的人。每每遇上这种场面，我都把目光投向她。可是，我看见，这时候的祖母，只是伫立在大厝西边空旷的场地上，对着天空，双唇翕动，默默诵念着什么。险情排除之后，我问祖母，烟囱为何要冒火呢？老人家告诉我，柴火烧久了，烟尘积厚，烟囱便被塞堵，几个月就要清一清扫一扫。我问：要是着起大火把大厝烧了怎么办？祖母说，大厝可是有天数的，它不会轻易被烧掉。这颇有点像归有光《项脊轩志》里说的“得不焚，殆有神护者”。接着，祖母便说起了大厝的来历。祖母说，我们的祖先并不是一来就住上这样的大厝的。很早很早以前，平民百姓都住在茅草屋里，常年受尽了风吹雨淋，甚至有屋毁人亡的危险。某一年，某朝代的一位皇帝从京城巡视而来。来的那一天，刚好我们这里正刮大台风，骤风暴雨几乎把所有的茅草屋吹得七零八落。老百姓一个个破衣烂裳，哀苦地蜷缩在草棚边。皇帝来了，看见没有一处可住人的地方，便好奇地问百姓：早知道草屋会被大风大雨吹倒刮走，你们为何不盖像皇宫一样的屋子呢？一位聪明的先人闻听此言，感动又激动，立刻当场对皇帝跪下，



双手作揖道：谢吾主隆恩，请赐我们百姓一处像样的屋子吧！皇帝自知失言，但既然自开皇口，就不能食言。后来，果然允许老百姓盖上像皇宫一样有翘首屋檐有三落透后有书院有厢房这样的大厝。

果真如此吗？几十年来，我一直将信将疑。

让我信服的是，几十年里，无论烟囱冒出何种色彩之烟，甚至吐出熊熊火焰，还有，大厅里举办的婚喜庆典，点了那么多的烛火，烧了那么多的纸钱，放了那么多的鞭炮，大厝始终安然无恙，顶多有惊而无险。

后来才懂得，原来，我家乡的大厝之所以能水火相容，平安无事，正是有祖母这样一拨老人，如爱惜自己生命一样，在默默而顽强地守护着。

当年，我所住大厝的东厢房里住着一位特殊的人。自我知道他的那天起，他就是鬓白鹤发老人，却十分矍铄，不苟言笑，始终保持威严之态，一副可敬不可亲样，令我辈之人不敢近身。祖母告诉我，他是个不平凡的人物。他是我祖母的堂兄，我应称呼他舅公。人生短短几十年，祖母说，舅公已经历了几生几死。我问，这怎么回事？祖母说：有人说他是革命的；有人却说他不是革命的。舅公这一生很苦啊，年轻时，有这么好的东厢房，没有住，却在茫茫的东海上打游击。中年时，曾长久躲藏在他乡的墓穴里，靠热心的人替他送饭。舅公有两个名字。他和陶铸、邓子恢、曾志、杨采衡等一批老革命家在一起战

斗过。他的枪法神妙，驳壳枪一举，坏人都逃不掉。他曾经化身渔民驾船到尚干地下枪厂买枪支弹药。他所率的独立团十三支队在闽东是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连罗县委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我们海岛上秘密举行，结果半途被敌人围堵在了郑家祠堂里。黑夜里，舅公第一个人站了出来，率领有志青年与围追堵截的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终于在黎明前，把敌人赶出海岛，保证了大部队的战略转移。一回，敌人抓不到他，便杀到我们这里来，扬言要放火烧毁这座住有革命者的古厝。哪想到，舅公的队伍杀个回马枪，让这帮无恶不作的家伙大惊失色，束手就擒。革命的队伍保护了大厝的平安。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回是，在上海，他竟然只身进入国民党的加油站，顺利运出两吨多的汽油，确保了我地下党飞机用油！

这么一说，这位舅公，成了我心中不能不探究的神秘人物。后来，我才知道，舅公因为无人证明他的革命者身份，一直蒙冤受屈，直到平反昭雪了，才终于安心地回到了我们的大厝。

我们的大厝，因为他的归来，多了两块“革命之家”和“红色之厝”的金牌，同时，也多出了一块受政府保护的沉甸甸牌子。

自此，不仅我们一大厝的人更加看重自己的古屋，全岛上的人，甚至是全县全市的人都在关注和保护我们的古厝。我的那座古厝，仿佛有了金色的光环，如火般灼然！

# 邂逅石厝教堂

邱泰斌

时光回溯到十年前。

随着市直机关搬到南江滨大道办公楼，我与烟台山成了近邻。

近水楼台，又恰值福州着力保护和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掀起热潮，并承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与几位友人，兴致勃勃地走访烟台山，邂逅了坐落其间的石厝教堂。

此后我一直心心念念，寻寻觅觅，千呼万唤，渐渐地，石厝教堂终于浮出水面。

那是一处海丝遗存，建筑、文物、人物三位一体，交融辉映。

## 1

烟台山，地处福州历史文化名城轴线最南端，北临滔滔闽江，水域丰沛，视野开阔，地

势扼要，因古时山上筑有烽火炮台而得名。曾经遍植梅花，香浮十里，素有“琼花玉岛”之誉，具有“苍山烟霞，高丘低江”美景。五口通商之后，这里曾是中西文明融合的最前沿，一座洋人区海丝城，创造了百年辉煌。新中国诞生后一段时间沉寂。2013年福州将其定性为历史文化风貌区，现遗存近现代优秀历史建筑物163处。

福州烟台山是美丽神秘、古老而新潮的，富有诗与远方。每个人眼中和心中都有一座自己的烟台山。

在世界大旅游家马可·波罗笔下，烟台山是聚集财富与梦想的地方。

我国大教育家、大作家叶圣陶1923年曾赞颂烟台山，“尤其可爱的是晚阳淡淡的时候，礼拜堂送出每一声钟响，绿荫下走过几个张着花纸伞的女郎”。



## 2

近十年，我无数次沿着旧使馆路，走近石厝教堂。

据载，1854年英国首先在烟台山上建造领事馆暨福州最早的洋人俱乐部“乐群楼”，随后出现“乐群路”，路因楼名。这是烟台山上始于原荷兰领事馆，至英华学堂后门的一条山路，也是一条使馆路。这一带为当时福州外侨聚居区，分布着英、法、美等国领事馆及石厝教堂等，囊括了希腊式、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等西方建筑史上各主要建筑风格，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

石厝教堂，仿哥特式建筑（一种受中世纪建筑启迪而出现的建筑风格）。哥特式建筑，12世纪兴起于法国，13-15世纪流行于欧洲，多见于天主教堂。尖顶高耸，尖形拱门，大窗户，彩色

玻璃，是其最显著的建筑特征。

前些年，我参观过意大利“国中国”梵蒂冈城国。它是罗马教廷的所在地，位于罗马西北角的梵蒂冈高地上。我不能不被那拥有12亿多天主教徒的恢宏金碧、精美绝伦的圣彼得大广场、圣彼得大教堂所震撼！

石厝教堂建成于清咸丰六年（1856），用蓝灰两色花岗石块搭配砌就，上方桁架屋顶，双层小青瓦通风屋面。教堂平面近似工字形，由教堂主厅、门厅和圣坛等组成。原名圣约翰堂，后因以色石砌成，又以福州“厝”字方言命名，俗称“石厝教堂”。教堂落成后，不但英国侨民到此礼拜堂做弥撒，后来也成为附近外国人开展宗教活动等场所，所以也称“国际教堂”，是福州最早、最独特的基督教堂之一。“墙内开花墙外香”。1994年它被列入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石厝教堂，过去人们常吃“闭门羹”。如今

修复后，可以透过围墙和铁门看到整座教堂，但至今尚未对外开放。

### 3

石厝教堂里的那株银杏，既是古树，又是名木，隶属濒危稀缺的古树名木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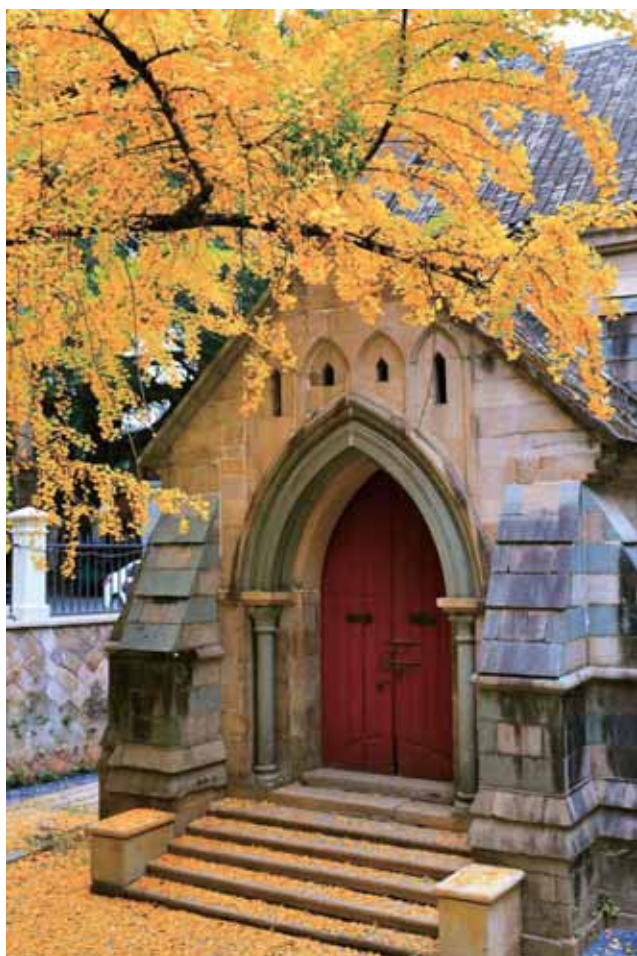
古树名木，是唯一以生命形态见证历史的“活的文物”，并且为不可复制的珍贵文化遗产，其本身就是历史，就是文化，就是乡愁！从某种

意义上说，古树名木的保护价值与珍贵性，与名人故居、历史名园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专家告知，银杏树是我国特产，曾出现在几亿年前，是第四世纪冰川运动后保留下来的世界最古老的孑遗植物，素有活化石之称，是“恐龙时代遗物”，堪与长城、金字塔媲美，位居世界奇迹之列。

银杏树，是一种靓丽的风景树。碧云天，黄花地，伴着石厝教堂。

暮秋薄冬，天气不热不冷，穿衣不厚不重，



赏秋不独也特：头顶蓝天白云，脚下一地黄叶，美丽迷人，十分惬意，并透逸着一种朦胧的神圣神秘感！

这里，近年已成为烟台山人气最旺的打卡点之一，情侣、摄影爱好者们的至爱。也有信徒躲开尘嚣，寻觅净土，来此洗礼灵魂，诠释生命。

我特地查阅了《福州市园林绿化志》《福州古树史话》等史志资料，发现福州市区千多株古树名木，银杏树仅列入3株。石厝教堂这株为一级，原登记胸径近1米，高15米以上，冠幅直径12米。据悉，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现拥有古树名木40多株，包括石厝教堂一株二级古樟树，而有些堪称舶来品西洋树王，成为福州之最。

#### 4

今年新春佳节，那晚更深夜阑，我忽见电视上正在介绍法国外交官、著名诗人、剧作家保罗·克洛岱尔及其名剧《正午的分界》与石厝教堂故事，终于揭开了名流浪漫史，正应着了辛弃疾名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后来我又查阅了福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撰的《烟台山史话》等资料，受益匪浅。

保罗·克洛岱尔（1868-1955），法国人，于1890年皈依天主教，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外交生涯，其中在中国15年，在福州7年，写下了一部讲述亲身经历的自传体诗剧《正午的分界》。

故事讲述的是：在流亡和战争背景下，在一

艘驶向远东的邮轮上，一位即将到中国赴任的法国外交官梅萨（Mesa），艳遇了一位有夫之妇、波兰美女漪瑟（Yse），开启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刻骨铭心的婚外恋。

在福州烟台山，克洛岱尔和情人之间，俗世之爱与天主之爱的矛盾不可调和。他们每每徘徊于使馆路，彷徨于银杏树下，忏悔于石厝教堂，激情荡漾于法国使馆。最终克洛岱尔于1906年匆匆与一位在福州的法国女人结婚，婚礼选在石厝教堂。

在《正午的分界》中，克洛岱尔把自己在中国游历期间观察到的社会风貌与文化元素贯穿于该剧的背景之中，为这段爱情故事增添了神秘的东方色彩。

《正午的分界》发表于1906年，1948年被搬上巴黎舞台，由此奠定了其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戏剧的后期代表人物的地位。

我去过法国巴黎，拜读过小仲马的《茶花女》。在我的印象里，法兰西是浪漫的国度；《正午的分界》，情韵犹如小仲马的《茶花女》。

近年，法国大文豪克洛岱尔的倾心力作《正午的分界》，时隔70年之后，随着海丝号角的吹响，又在中国多个城市（如2019年天津大剧院歌舞厅）巡回演出。

独立仓山，闽江东去，涛声依旧，石厝教堂、百年银杏、《正午的分界》中西合璧，千秋不朽！



# 华林寺石狮

瑜伽

有朋友在省人社厅工作，有天他问我，鼓东路人社厅和民政厅大院门前的两头石狮是否与传说中“三狮镇五虎”的狮子有关？请教了有关学者并查阅了一些资料，基本上可以认定，目前学界和民间大体上有个共识，三头石狮中的一头应该就是现在静静地摆放在屏山华林寺大殿侧后方的那尊。至于人社厅、民政厅门口的那两尊，就要做些分析了。

先说说“三狮镇五虎”传说，来源很多，大约有以下几种。

流传最广的一种，关乎历史上的五代闽国宫廷政变。

对于古代中国历史，公认的史书名录中《史记》与《资治通鉴》是两部重要的巨著。汉代之前的闽地历史，在史书上记载不多，比如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的早期闽越国，在《史记》中涉及

就不多，这也是闽越国史料目前稀少的原因之一。历史还有一个参考来源，就是民间传说，但跟中原地方相比，早期福州民间历史传说相对也少。汉代之后，特别是对唐末的闽国，《资治通鉴》就有篇幅较多的记载，为后人提供了教科书般的历史结论。“三狮镇五虎”这个民间传说的来源，应当与《资治通鉴》的记录密切相关。



鼓东路人社厅、民政厅大院门前的两头石狮

唐末，中原战火纷飞，有实力的各路诸侯，目标盯紧的是都城（比如西安、洛阳、开封、邯郸等）和中原中心地带，只有抢占这些地方，才能代表自己取得了正统地位。而四周散落的外围“国”（主要在中原以南）则更注重偏安“一亩三分地”，保证自身有个地盘就行。做到这点难度也不是很大，最重要的是拥护“中原主国”的正统地位，尊重的实际行动就是有时纳些贡品。闽国的开国者王审知就很放下身段，在年号上使用中原后梁的年号，自己做个“节度使”就行，正因为如此，闽在他的统治下，避免了外来征伐，也免招生灵涂炭的灾祸，使他赢得了“闽王”的口碑。这些外围“国”如有动荡，大多是王室家族成员为夺取王位而出现的内斗。闽国也是如此，在王审知时期王氏家族还比较安定。王审知之后的闽王，趁着中原有点乱，管不了那么多，就自己称“帝”了，所有百官都按天子制式配备。其子王延翰王位还没坐热，就被王审知养子王延禀诛杀。弟弟王延均继位，但王延均荒淫无道，热衷于吃喝玩乐，很快王位不保，被自己的儿子王继鹏杀死而篡位。王继鹏取得王位后做贼心虚，总觉得王室成员包括叔叔王延武图谋政变推翻自己。有一年的元宵晚上在“双门楼”（一说在王宫）楼上观灯赏月，突然看到南边案山（即五虎山，也叫方山）有数个亮光跳跃闪动，立刻疑神疑鬼，觉得有人要搞政变，“吓得昏厥过去”。被身旁大臣们唤醒后，他问所谓的道人（实际上是装神弄鬼的巫师），南方的亮光是

怎么回事？道人回答说：亮光是城南郊的案山五虎放出的煞气，对国王不利，应当雕刻三头石狮子，对着五虎放在王城门楼前才能破解。王继鹏立即下令雕好三头石狮子，放在门楼前，形成了传说中的“三狮镇五虎”。其实，这些本来就是王继鹏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时间段，正好有个权巫林兴跟王延武是死对头，应该是猜中了王继鹏的心思，立即借题发挥，密告王延武已有动作，所以出现了这个煞气。这个诬告正好与王继鹏想除掉王延武的想法不谋而合，王继鹏就派林兴率武士进宫，杀掉王延武全家。

当然，王继鹏也落个同样的下场，不久后就被自己的小叔叔、也就是王审知的小儿子王延羲诛杀，同时，王延羲顺便也把那个诬告的权巫林兴就地正法，这些都是后话。

还有一种传说就是纯粹的“八仙”神话故事了。

某日，游山玩水的吕洞宾在方山顶上休息，随手把两根大鸟羽插在一块大石头上。没承想，这块大石头是石头虎，插上羽毛无异于“如虎添翼”，长翅膀的老虎因而到处飞腾作恶，给老百姓带来惊慌和恐惧。解铃还须系铃人，到处寻求破解难题的地方官找到吕洞宾，仙人给了一支魔法箭，口授玄机。效仿“后羿射日”的优美姿势，地方官拉满弓向石虎发出致命一箭，射中虎嘴，中箭后的石虎忍着剧痛逃回老根据地方山。为防止死灰复燃，按照大仙策划的方案，地方官下令雕了三尊石头狮子，放在鼓楼门楼前，正对着五

虎山，以此永镇妖虎。

另一种传说比较小众，故事中的主角换成了闽江出海口的“五虎礁”，三只石头狮子的摆放地点可以放在鼓楼门前，也可以放在福州城的南城门前，其要旨仍然是以“三狮”镇“五虎”。

各种传说，围绕风水堪舆，寻求破解地理上天然构造的“不良”要素，构筑着福州民众镇邪避灾的心理需求防线。

那么，摆放着石头狮子的地点在哪儿？

按照如今比较认可的说法，是“双门楼”前。这个楼最早的建造年代是五代期间的闽国，叫“镇闽台”，位于南城门到闽国王宫（今鼓屏路上）的中轴线上，坐落在如今的东街口聚春园后门西侧、虎节路与妙巷的交接处前面（如今已辟成道路）。如同城门通道，镇闽台门洞就是人们通行的过道。古代的门楼，中间通道通常只留一个楼门（当然，等级规格高的门楼除外，但一般

为奇数），但这个“镇闽台”有两个门，所以老百姓给了它一个更形象的民间称呼“双门楼”。到北宋中期，福州地方主官严辟疆认为“镇闽台”名称格调有点高，起了个文雅的名字叫“还珠门”。为什么叫“还珠”呢？说的是汉代南海有个地方海里盛产珍珠，但官员腐败，大肆滥采，结果珍珠都到别的地方去生存了，后面来了个清廉的地方官，整顿先前的弊政，珍珠又回归了（“去珠复还”）。当然，严辟疆改这个名字多少有些自我歌功颂德的含义，但民间老百姓习惯了，改不了口，还是叫“双门楼”。

在宋代的《榕城考古略》中，也记载了一个双门楼，此楼叫“威武军门”，是唐代建的，就是大多中国古城都会建造的报时敲鼓用的“鼓楼”。那为什么叫“威武军门”呢？这跟福建在唐代的行政区域有关，就像今天的福建行政区是“省”，当年的福建行政区是“军”。行政区大院就在如今的鼓楼一带，建了这个楼，起名“威武军门”。“鼓楼”，久而久之，楼不在了，就演变成了地名。到了宋代，这个楼开了两个门，明代更名为“第一楼”。因为有双门，所以也叫“双门楼”。

实际上，在中轴线上从东街口到省卫健委这条线，历代在鼓屏路上存在多个门楼，至少在清乾隆年间，从南往北依次就有还珠门、虎节门、威武军门、都督府门（乾隆《福州府志》），一直到民国时期这四个门还是不变（民国《闽侯县志》）。其中，威武军门楼（鼓楼）位于现在的



“狮子楼”也就是“双门楼”

鼓楼遗址公园一带，还珠门（镇闽台）在东街口聚春园一带。而且，两个楼历史上都曾有过“双门”的记录。石头狮子是放在其中某个门楼前。

我对狮子如何放置有点好奇。按照中国传统的门前狮子摆放，一般是一个门有左右两头狮子，这两个门应是四头狮子，来个奇数“三”，是不是两个门之间有一头、另两头放在两侧？这就带来了两种说法。一是王继鹏同批雕刻了三只狮子，一只摆在两个门之间，另外两只分别放两门的左右外侧。二是“镇闽台”前原来并没有石狮，王继鹏装神弄鬼搞清杀之后，借石狮镇虎的说法，只雕了一头狮子放在整座楼的楼前。

如同大多数中国古建筑的命运，“镇闽台”这个门楼在明代中期也遭遇到最大的敌人——火。焚毁之后重建，恢复了原来名称“镇闽台”。祸不单行，清前期，再次遭遇了大火成为废墟。总督姚启圣再度重建，也许是狮子的传说影响，定名“狮子楼”（实际上就是还珠门原址）。清乾隆期间，在鼓楼的都督署（如今的鼓一小一带，鼓楼原址北面）也遇到了大火，烧得只剩下门前一对石狮，有地方官员就将这一对石狮子搬到“狮子楼”门楼前。这样，连同原来的一只石狮，狮子楼一共有三只狮子。民国期间，或许因为狮子楼的两个门洞做通道不能满足通行需要，也为了修通大路，狮子楼被拆了，三只狮子被移到鼓楼门楼（今鼓东路和鼓西路交接点）安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同样是为了扩大路面宽度，千年的鼓楼也被拆了，三只狮子就此再次

搬家。据老福州人记忆，这三只狮子搬到了南门兜大榕树街心公园内，因为年代相隔不远，这个回忆应当不会有误差，但无论怎么搬，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朝南方向镇住“五虎”的基本理念不会改变。

此后三只狮子的命运如何？地方志没有记载，只能从民众口中和地方传说中去寻求答案。20世纪的“文革”前期，为了备战需要，五一广场前的古田路被准备用来充当“战时机场”，南门兜的大榕树和街心公园因而让位于战备需要，三只狮子再次被搬移，安放在南门一带。“文革”期间，被当作“四旧”砸了，残余石块任凭需用者自取或乱扔，至今不知所踪。而现在被大家认可的“三狮中的唯一遗存”、华林寺的那尊石头狮子（尚存被砸痕迹），是作为体量大且重的石雕文物，从南公园被搬到华林寺寄放的。但是，如何证明此尊从南门兜到南公园的中间这段经历，至今仍然没有权威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还有一种说法，民国时期拆鼓楼的目的是修



华林寺大殿侧后方的石头狮，正面可看到头部一部分和两前脚已缺失

建道路，三头石狮随意搬到附近的某个地方“就地安置”了。在没有确切依据的情况下，现在默默蹲守在华林寺大殿旁空地上的一头成为大家的“共识”。还有两头呢？鼓一小门前和人社厅、民政厅门前的两头石狮也进入了人们的猜测中。这里，可以排除鼓一小的两头石狮，因为这两只体量有些小。

鼓东路人社厅、民政厅门前的两只呢？

如果确如民间所说，三只狮子都是王继鹏同批所制，那么大小形态应该差不多。但把人社厅、民政厅大门前的两只狮子跟华林寺此尊摆在一起，可以看出有很多风格上的差异，特别后腿、头部和尾部明显不同。这种情况下，这两只应当不是三狮中的另两只。

如果王继鹏当时只是在双门楼中间雕一头狮子，三只狮子是后来拼起来的，造型、风格当然就有差异，理论上就存在鼓东路人社厅、民政厅前的两只属于三狮另两只的可能性。但是，这种说法与三只狮子搬移到南门兜后在“文革”中被砸毁、残块不知所踪的民间说法有矛盾。

回过头来考究一下鼓东路人社厅、民政厅的“原址建筑”。

从老地图得到的信息，这个位置原为国民党“高等法院”旧址，在这个旧址里，还有一个风景旅游遗址点，就是“戚继光墓”。当然，这个不是真实的戚继光原墓，是民间为了纪念戚继光而修建的一个祭祀场所。人社厅、民政厅前这两尊石头狮子，很有可能是这个“胜迹”的遗物。

中国人在重要建筑物门前摆放石头狮或其他的大型瑞兽，是借用狮子的威严以辟邪镇妖。也许，在中轴线鼓屏路上的古代建筑物门楼前，都摆放着石头狮，有一个门就摆放两只，有两个门就摆放三只。由于摆放三只狮子与通常惯例不太合拍，再加上五虎山正对着福州城，长此以往，就演变出“三狮镇五虎”的各种传说，也反映了人们的朴素心理。无论如何，在福州，摆放三只狮子的时代确实存在，探究它们的去向也是一种历史回顾。从这点出发，倒是可以考虑如何将华林寺石狮加以重新修复并定位，再现“三狮镇五虎”场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愿望。



## 探访仁和庄

黄锦萍

探访永泰仁和庄那天，天空灰蒙蒙的，下着大雨，仁和庄以巨大的建筑形态出现在我面前：湿漉漉的庄，青灰色的寨，又高又厚又长的围墙，微微上翘的屋檐层层叠叠的，很有层次感，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排场。大宅里挂着好多红灯笼，灯笼上交替写着“仁和庄”和“青石寨”。

这座大宅到底是“庄”还是“寨”？当地人给了一个这样的说法：寨是大家都习惯这么叫的，因为外墙用青石砌成；而庄则叫得有文化含金量，尤其以“仁和”命名。在人们的印象中，庄多为旧时皇室、贵族、地主等大户人家建筑在山林田野间的住宅。主人以“仁和庄”命名是有



讲究的。《礼记》说“上下相亲谓之仁”。孔子说，仁者爱人，要遵循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和则为和谐、平稳，“仁”与“和”都是儒家崇尚的道德标准与精神品格。命名“仁和庄”，表达了主人对儒家文化的尊崇与传承，也传递了家族的家风家训。

穿过厚厚的青石寨墙，我们走进180多年前的厅堂。如果可以穿越时空，一定会看见长相差不多的张家三兄弟，坐在厅堂长长的条凳上，边喝茶边议事。张家三兄弟名叫张序捷、张序仪、张序光，是南宋爱国词人张元幹的后裔。三兄弟是随王审知入闽的梁国公张睦的三十代孙，张睦携四个儿子举族从河南光州来到福建，是入闽开基祖，第九代就是爱国词人张元幹，千古名句“天意自古高难问”便是出自张元幹的笔下。

仁和庄张氏家族是有故事的。祖父张季良原居永泰同安村，18岁分家时家徒四壁，家当仅有一台石磨和两只老母鸭，张季良挑着一副破担子，靠磨豆腐养鸭子为生。就凭着勤劳本分，日积月累下来，竟置下田产数百亩，还捐钱为乡里修路铺桥，赢得好名声。父亲张行丰也是上行下效，生时创造无尽的财富，死后200年，依然被子孙奉为楷模，每逢中秋佳节，1000多位子孙争相祭扫坟墓，寄托崇敬与哀思。张行丰教子有方，培养的三个儿子个个出类拔萃。长子张序捷勤勉忠厚，负责经营田地山场，管理佃户；次子张序仪豪爽仗义，广于交往，擅长协调事务；三子张序光精明能干，专事营销。张家三兄弟建造仁和庄时，家族已坐拥千顷良田、百座青山。三兄弟不仅建起仁和庄，还继承祖辈传统美德，募



捐建起三捷石拱桥，造福乡里。张氏一族遵循着“仁和”的为人准则，留下好口碑，这正是这座百年老宅坚不可摧的精神内核。

“庄”和“寨”的概念，在这座大宅里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寨”的本义最初是指有篱笆或栅栏的羊圈，继而引申为军营，也指四周有栅栏和围墙的村庄，大凡称为“寨”的地方，一般曾有军营驻扎。深入进去，我发现它是一座极其讲究的庄寨。常见古厝内的厅柱，柱身大多上小下大，这是因为树木本身的生长形状，但青石寨内的厅柱粗且直，上下端直径基本相同。可见当年建寨人挑选厅柱木材时，选用的树木都要大于普通柱材，才能将其刨得头尾均匀。青石寨最讲究的地方，还在于它的石材选用得特别。寨里建筑不仅寨墙是辉绿石，进寨所见的台阶、天井和地面，也都是切割规整的辉绿石。专家介绍，由于康乾年间文字狱盛行，“青石”又与“清室”谐音，因此清前期建筑中，对青石的使用相当慎重，少有人敢将青石铺在台阶和地面，唯恐被认为“踩清室于脚下”。青石寨成为例外，是由于它修建于道光十年（1830），那时文字狱冤案渐少，社会风气日渐宽松。即便如此，青石寨也是永泰同时期庄寨中，建筑主体大量采用青石的唯一。

如果能够还原 180 年前的生存状态，你会发现青石寨有很强的防卫功能。进入庄寨内部，犹如进入迷宫，若有贼子闯入，必成瓮中之鳖，插翅难逃。围合式的家族住宅，占地超过 6000 平方

米，并列的三大院落铺展得很夸张。青石寨以中轴线祭祖厅堂为核心，6 个厅堂，378 个房间，最多时住过 200 多人。大宅呈三进五落结构，每一落的中央是厅堂，厅堂的左右两边都建有船屋，屋与屋之间有天井。寨里的最后一排有三层楼高，曾在这里办过私塾，如今还保留着教室和上课用的课桌椅，甚至还有一个供孩子们跳远的长方形沙坑，当然还有堆放家具的仓库、储存粮食的房屋，真可谓一应俱全。

站在青石寨天井里举头仰望，可望见一片被翘屋檐映衬的蓝天。天井是方形的，四周的屋顶围成一个圈，就如同仰望天际的一个窗，这就是“天圆地方”。从这个窗望蓝天天际辽阔；从这个窗接受从天而降的水就接住了财富，雨水落在自家的院落里，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我看见青石条铺成的地面上，左右各立着一个小石槽，以为是小水井，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灯柱石，在没有电灯的年代，仁和庄已经用上燃气照明了。想着每当夜幕降临，高高的灯柱将整座仁和庄照亮，那是何等的气派。

守宅老人告诉我，厚厚的寨门是木制的，经过防火处理难以点燃。门是庄寨联络外部的通道，大门打开，庄寨与原野融为一体；大门紧闭，一处庄寨就是一个独立的社区，一旦兵匪来袭，可以御敌于寨门之外。楼的顶部是一条很长的贯通走廊，当地人称为“跑马道”，我看见每隔一段就有一扇小小的斗形窗，窗子两侧是斜开的，既可以洞察外面的情况阻击兵匪，又可以防





御外面的枪弹。在寨墙对角线的两端，还有两座碉楼，站在碉楼眺望，庄寨四周尽在视线之内，凸显瞭望守卫功能。更不可思议的是，寨子里还有一个暗藏在深沟隐秘处的逃生通道，一旦寨子被土匪攻破，主人可从暗道逃生，也可设下埋伏，抵御外敌侵入。在屋与屋之间的天井下方，是前后相通、又宽又深的排水沟。这样宽大的排水沟，即使遭遇暴雨也能迅速排水，又可防止遇到不测、无力与兵匪制衡时，通过排水通道迅速撤离逃生。框制斗窗、防御性墙体、战略性的跑马道、碉式角楼、竹制枪孔、注水孔等，组成了庄寨结构缜密的防御功能。防御是为了安全，安全为了更好地居住。

永泰庄寨是我国防御性乡土建筑的典型代表，诞生于明清时期土匪犯乱的特殊历史情境，融合了当地特殊的地理经济环境，形成了集防御、居住、美学为一体的独特建筑形式。传统民

居保护专家朱良文教授评价：永泰庄寨不仅是南方民居防御建筑的奇葩，是农耕社会家族聚落生存的记忆，也是传统乡绅文化的载体。民居建筑大师黄汉民教授认为，永泰庄寨是福建寨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独特内在的特点，完全可以独立申报世遗。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戴志坚教授说，四梁抬井是永泰工匠独创，十字形受力减柱的方法绝无仅有，中国北方都没有这样巧妙的梁柱建筑；青石寨中鱼鳞片的风火墙，是他见过的最好、最高级、最壮观、最漂亮的设计，木头做的护墙板也是绝无仅有，这些都是永泰工匠独特的创造。福州大学建筑学院李建军教授在充分研究土楼、土堡、庄寨三者后，做出如下定位：土楼以居住为主防御为辅，土堡以防御为主居住为辅，庄寨则是防御和居住并重。因此，永泰人在建造庄寨时，不仅考虑到军事防御功能，也将庄寨作为精神家园去营造，完整的功能布局、精湛的雕花刻镂、大气的挑高穿斗，这在我国防御性民居建筑中独一无二。

庄寨，永泰的文化符号，农耕文化、防御文化、建筑文化的有机结合。庄寨之庄是看得见的文物。走进庄寨，不仅欣赏到精湛的建筑艺术，也吮吸到这里崇儒尚学之风，触摸到绵延千年的乡村文明根脉。

庄寨之庄，散落在永泰的青山绿水间，在乡村振兴的重大机遇中。行走在仁和庄偌大的院落里，抚摩着坚固无比的青石墙，真想穿越时空，与180多年前的张家三兄弟聊聊天。

# 一纸抒怀念流年

## ——桂枝里的人和事

叶 润

福州鼓楼区中心，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内河——安泰河。五代时期，安泰河为闽王王审知所建罗城的护城河。宋代，城市外扩，城墙南移，护城河便变为内河。当时，安泰河河道宽阔，一路漫延，曾是城区内运河交通的总枢纽。沿河秀冶里、朱紫坊、桂枝里一带，遍植榕树，根须发达，枝叶繁茂。榕荫下，河面上船来舶往，一派繁荣。如今，福州城几经旧城改造，安泰河道已然狭窄许多，周围诸多古桥、街巷等亦消失于历史烟尘里。

安泰河畔桂枝里，是难得留存下来的古巷之一。

唐元和年间，里人陈去疾登进士第，观察使裴义为之建桂枝坊（今桂枝里），奖振儒风。“桂枝里”又称“副使巷”，因陈去疾曾官副使也。今其过街墙，尚镌刻有“桂枝里”“唐副使巷”石刻。后来，乾隆《福州府志》称其为“牛育巷”，

因声相近之讹，俗呼“牛肉巷”，又呼为“牛肉巷河沿”。

陈去疾（约789-？），字文医，侯官县（今福州市）人。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中进士，曾任江州司马、户曹参军、蔡州刺史、邕管经略副使等职。工诗能文，有名当时，《全唐诗》存诗13首。

### 踏 歌 行

陈去疾

鸳鸯楼下万花新，翡翠宫前百戏陈。  
夭矫翔龙衔火树，飞来瑞凤散芳春。  
仙跸初传紫禁香，瑞云开处夜花芳。  
繁弦促管升平调，绮缀丹莲借月光。

陈去疾博览群书，文风清丽，运笔多彩，情感细腻且充满闲情滋味。他虽未如大家李白、杜甫般流芳百世，世人皆知，却留存于“桂枝里”，被福州人所铭记。而让桂枝里更添神秘色彩的，



桂枝里流传着关于《荔枝换绛桃》的故事

还有一则缠绵凄婉的爱情故事：荔枝换绛桃。

古时，桂枝里河沿有很多吊脚楼，层层叠叠掩映在翠枝花叶里，别有一番风情。据说，安泰桥下利涉坊内（今吉庇巷）有个书生艾敬郎，读书之余以鬻画为生，其画室便设在河沿的吊脚楼上。隔河对面楼有一名为冷霜婵的女子，见书生风度翩翩，便暗生情愫，于是随手扔过一物。书生捡起一看，竟然是荔枝。他仰面而望，见一美丽女子正对他桃花含笑。书生情动，随即出门买了几个绛桃，用朱笔写上“身无彩凤双飞翼”，回抛过去。女子倩笑而拾后，又抛一物过去。书生捡起，乃是纸包，纸包上写着“心有灵犀一点通”，拆开仍是荔枝。

两人因缘相恋，海誓山盟。正当两家人为儿女婚事喜庆忙碌之时，祸从天降。闽王王延翰广

征宫女，冷霜婵名列其中。王延翰贪恋冷霜婵美色，冷霜婵却异常刚烈，宁死不屈。最终，冷霜婵和艾敬郎这对苦命鸳鸯，共赴烈火而亡。

这则民间传说，在清代由里人何求改写成“冷女掷果为父申冤，艾生设诈代妻报仇”的故事，收入《闽都别记》。此后，该故事还被改编成经典闽剧，至今仍活跃在闽剧舞台，颇受欢迎。

“门前老树不知岁，河上长流无尽时。”这曾是桂枝里陈氏儿科医室外的一副楹联。桂枝里已有千年历史，居住其间的人蔓延几代，来来往往，书写出很多值得回味的记忆。

陈氏原籍河南省固始县，清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世祖陈少邱从河南迁至福建漳州，后定居福州。长子陈仕渤、次子陈仕牲，均善行医，分别悬壶于福州宿月埕和桂枝里。陈



仕姓之子陈丽水从业儿科，声名鹊起，再传陈刚济，医名远扬。陈刚济精通方脉，望闻问切，药多奇效。当时，福州知府周莲之子患重病，陈刚济妙手化沉疴，终见起色。周莲颇为感激，赠联以谢，曰：“青囊三世泽，红杏万家春。”

陈刚济之子陈燮藩，亦专攻幼科，尤擅治疗痘疹，不拘泥古法，灵活变通，求诊者络绎不绝。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福州中医师公会成立，陈燮藩被推荐为副会长。其医术传子陈笃初；其弟陈纪西，亦精妇儿科，曾著《活幼刍言》，可惜已散佚无存。

陈笃初（1877-1938），字拙庐，号还爽。桂枝里陈氏儿科第五代传人，专治麻痘和儿科疑难杂症，且通六艺，曾师从陈如璋学诗画，其朱竹、花鸟之作构图别致，神形并茂，别有清韵；擅折枝吟唱，曾与林苍等人组织诗社，亲撰医寓

楹联“门前老树不知岁，河上长流无尽时”，著有《还爽斋诗集》，在福州医界有医诗画三绝之誉。悬壶济世之术，活人无数。有一名3岁患儿，舌头红赤，肿胀满口，不能进食，危在旦夕，陈笃初用银针蘸酸醋刺破患儿口舌及两旁，出少许紫色血，并予服导赤散加大黄，而后患儿痊愈。陈笃初的高明医技传长子陈逸园和四子陈桐雨。

陈逸园（1897-1978），早年随父习医，尽得真传。1945年曾任福建省中医师公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省人民医院儿科中医师，口碑绝佳。

陈桐雨（1909-1982），幼承家学，15岁中学毕业即随其父诊侧，亲聆教诲。父亲病逝后，时年24岁的陈桐雨开始独立应诊。他尽得世传精华又勤奋专研，以中医为主，中西参用，行医50年，成为福州妇孺皆知的儿科专家。1964年，陈

桐雨等四人被授予福建省名医称号，俗称医术界的“四大金刚”。陈桐雨尤善治疗小儿麻痹，群众把他视为儿童保护神，赠其“儿仙”的美称。

陈桐雨有一项独门技艺——循肤摸诊。天寒时节，患儿无须解开衣物，他仅用手循肤抚摩，即可判断麻疹位置及轻重。某次，陈桐雨用此法诊断患儿麻疹在腹部密集，大腿至膝盖稀疏，膝下无疹。患儿母亲听后哑然失笑，怀疑手触怎能如此精确。当众脱下孩子衣服察看，果然如陈桐雨所言。陈桐雨解释道，麻疹是阳热之症，非热不出，疹子出在何处，该处皮肤即呈温热，他便可利用热感加以判断，此乃陈氏儿科200多年的经验。

儿科因患儿口不能言、言不能信、手不能指的特点，被称为“哑科”，儿科医生要有极大的耐心和亲和力。陈桐雨对患儿和颜悦色，举止温柔，有时哄以玩具，安抚其情绪，以便顺利诊断、治疗。他处处为患儿和家属着想，对排队求诊者，常备茶水招待，夏置凉棚庇荫，冬设火炉取暖，夜间供驱蚊香。对穷苦人家常免费义诊，甚至赠送药剂。陈桐雨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在群众中广为传颂。历任福建中医学会常务理事、省儿科学会常务委员、省卫生厅学术委员会委员、红十字会福州分会副会长等职，为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儿科学术奠基人。1982年陈桐雨与世长辞，其遗作《陈桐雨儿科医案医话选》收录“循肤摸麻麻路可知”“芋叶止痒解人倒悬”“恣啖荔枝果虎剿积”等通俗趣味医话，为

我国中医增添了一份宝贵财富。

陈桐雨的四子陈辉光，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曾为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中医院医师，现定居加拿大多伦多，开设回春诊所，继续延续家族医脉。五子陈辉清为福州市鼓楼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陈氏中医儿科代表性传承人。他对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杂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儿科感冒、哮喘、传染病等。陈辉清经常告诫弟子肖诏玮等人，为医当向犬学习，一来学其忠诚，二来学其会吠（福州话谐音“背”，意为多背诵医经典籍），三要学其会咬，知识能咀嚼消化为己所用。

肖诏玮在60多年工作积累中，以陈氏儿科学术为根基，总结了高热治疗12法、厌食治疗16法、腹泻治疗12法和咳嗽治疗12法，并收集散落民间的中医文献，包括医案、验方、单方等，编著出《百病简易中医疗法》《榕桥医谭》《壶天墨痕·第一集》等书籍，斩获多个奖项。肖诏玮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专家”。他与师父陈辉清收教众多弟子，举办多场中医传承学习班，培养教诲年轻传承人。2019年3月，省卫健委批准陈氏儿科在福州市中医院成立中医流派传承工作室。陈氏儿科第八代传人不断挖掘整理陈氏儿科历史资料，完善学术思想和特色病种诊疗方案，与时俱进，弘扬陈氏医风医德，广受好评。

知名画家陈子奋，晚年也生活在桂枝里。他居住在桂枝里8号，自题寓所曰“寄枝书屋”。



据说，桂枝里8号便是陈去疾的故宅，但未见考证。

陈子奋（1898-1976），长乐人，字意芑，号无寐，晚年别署水叟。陈子奋父亲以塾师为业，雅擅篆印。受家风所染，陈子奋幼时即习绘画篆刻，少有声名。16岁即执教小学图画，后又担任中学及职校教席。20多岁便以鬻印售画自给。他对国画篆刻，静研不懈，深得陈洪绶和任伯年用笔之妙，所作白描挺劲精妙，花卉写生栩然生动。

1928年，徐悲鸿受邀参加福建省美术展览会。名家画作陈列其间，徐悲鸿却对陈子奋的作品情有独钟，决定亲自拜访。两位画家一见如故，促膝谈艺，相处愈欢。临别之际依依不舍，徐悲鸿即席为陈子奋造像，陈子奋亦为徐悲鸿篆刻3枚印章，互为纪念。徐悲鸿离榕时，又绘赠陈子奋一幅《伯乐相马图》，画作题跋道：“戊辰

夏尽，薄游福州，乃识陈先生意芑，年未三十已以篆刊名其家，为予治‘游于艺’‘长颀颌亦何伤’‘天下为公’诸章，雄奇遒劲，腕力横绝，盱衡此世，罕得其匹也。画宗老莲、伯年，渐欲入宋人之室，旷怀远志，品洁学醇，实平生畏友，吾国果文艺复兴，诎不如意芑者期之哉！兹将远别，怅然不释，聊奉此图，愿勿相忘。”

1929年，陈子奋代表福建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全国美展。徐悲鸿得讯，热情邀请他顺便来南京做客，并欲聘请其在中央大学教授国画。陈子奋因老母在堂，不愿远离，只能婉拒。此后，徐悲鸿为陈子奋的颐萱楼题诗曰：“闽中自古多才士，吾行福州识陈子奋。金石刊刻妙入神，秉性孝弟追古人。自维廿载风尘老，损却当年颜色好。安得避地从君游，歌咏登临乐此楼。”对于陈子奋因慈母谢绝好意，不仅毫无芥蒂，且感其秉性孝

心，两人友谊越加醇厚。

20世纪30年代之后，陈子奋创作旺盛，频出佳品。先后参加巴黎、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举办的中国绘画展览。抗日战争时期，陈子奋常参加省内外的筹赈画展，为抗战出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选为福建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委、省美协副主席、省文史馆馆员等职，有关部门还在福州西湖为他设立陈子奋画室。1956年，他的画作《万寿无疆图》制成雕漆屏风，陈列于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其实，陈子奋的篆刻之功，并不亚于国画。他生平治印数千计，早年刻有水游人物、百将、百美和剑侠诸印谱，晚年复成百花、爱国诗人、画中九友、地支圆等谱，均获时贤推许。曾自言：“余学篆治印，垂六十年，求其一点一画圆融藏锋，而迫近于甲骨、钟鼎、玺印者，接前贤之步趋，冀发扬而光大。”诗人陈衍评其印曰：“融洽皖浙二派于一炉，而追摹秦汉，瘁心力以赴之，故其笔力苍劲深厚，驳驳乎奄有完白、冬心之长焉。”

“文革”时，陈子奋被污蔑为“黑画家”，晚年生活于桂枝里8号。他与续弦夫人董珊同在桂枝里石刻加工厂做工，艰难度日。但是，他对艺术的热情并未就此熄灭，房间案头之处，到处摆放着番茄、青椒、白菜、梭子蟹等写生之物。陈子奋旧友曾回忆拜访他的情景：推门进去，屋子最里边贴墙放着一张床，桌子在床边，陈先生画画时坐在床上，面对着窗子。屋子里放着柜

子、杂物……虽然局促，当时却高朋满座，龚礼逸、沈颢寿、吴味雪、谢义耕等文坛艺苑名流常光临谭艺，晚辈林健、方宗珪、陈初良等亦时来请益聆教。

陈子奋家与老诗人胡孟玺相邻，两人交往密切，情意笃实。陈子奋亦工诗，文采斐然，不落俗套。他曾把《颐谖楼诗草》稿本拿给胡孟玺等诗人过目，得到颇多褒赞。有诗友请陈子奋为其刻印一方图章，他便要求对方写一首诗给他，作为交换。其诗曰：“利禄功名不屑求，布衣自足傲王侯。壁间悬幅人争赏，域外蜚声孰和俦？还比郑虔多一绝，未容王冕擅千秋。铅刀质钝难成割，叨赐弥增贱子羞。”陈子奋受宠若惊，连声说道：“谬赞了，谬赞了。”

1974年，陈子奋因长期精神压抑，患病卧床。友人前去探望，他执其手深深感叹。没过几日，他便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如今，桂枝里翻修一新，古老的排排榕树依然枝繁叶茂，须根垂坠于河面之上，一片清凉。咖啡馆、会所、美甲店、扁肉小吃、画室、花铺等各式店面朝气蓬勃，弥漫人间烟火。桂枝里8号已成为一家雅致的竹茶馆。几处隔间小茶室，茶香飘韵，客人窃声私语，品味悠闲时光。走廊、拐角和大厅，一步一景，布置雅洁，赏心悦目。这里再难寻到陈子奋的踪影。我好奇地询问服务员：“你们这里有陈子奋的画吗？”服务员浅笑摇头：“没有，他的画作太昂贵了。”

## 铁蹄下的负笈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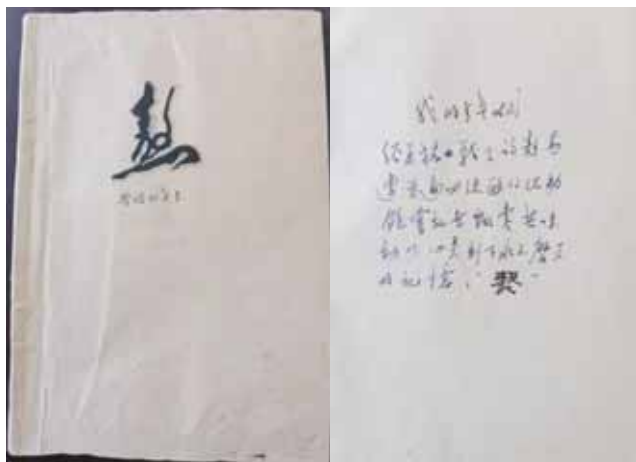
蔡 林

在泛船浦菖蒲墩拆迁安置区一栋楼房的“塔楼”上，秀先生翻出了他的父亲林增荀遗留的文稿。五六本 32 开封面牛皮纸装帧的册子，林增荀在封面上用行草有章有法地写着“熬”“游”“解放”之类的标题，那本“熬”字边缘用钢笔勾出一道印迹，收笔带出一行蝇头小字“苦难的年月”，引人关注。轻轻翻开“熬”册，醒目的卷首语：

### 我的青年时代

经历抗日战火的煎熬  
遭受遍地流匪的洗劫  
饱尝乱世飘零苦味  
幼小心灵刻下永不磨灭  
的记忆：“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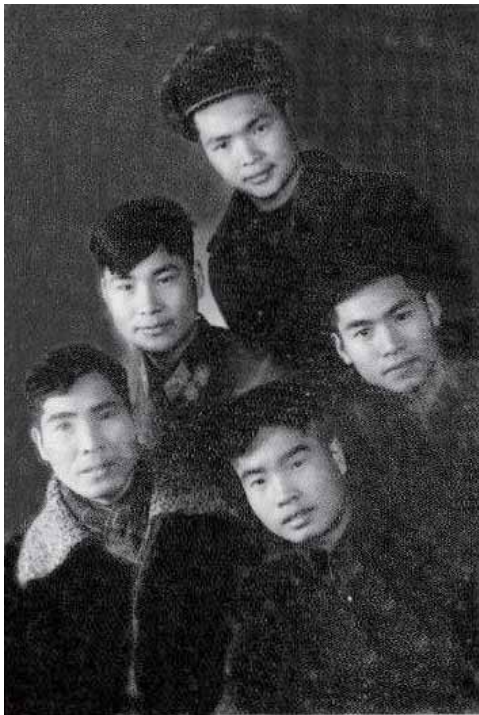
手稿的主人林增荀，字林洛（1925—2010），家住仓山泛船浦新民街东明里“九间排”。20 世



林增荀先生手稿

纪 30 年代，在泛船浦，哥特式大教堂拔地而起，挨着大教堂花园西边风火墙，围出东西长约 40 米、南北宽约 30 米的矩形的院子，一溜九间联排二层砖木结构坐北朝南，东西两头各有一道门，东门连着泛船浦教堂南面花园；西头是正门，穿过高大拱形门通往新街道；正南小门外有条宽仅





林增荀（前排左一）五兄弟合影

1米多、长约20米的石板小路，踏上石板可听着脚下的潺潺流水声传到新民街。当年，九牧林尤溪祖福州支族第四代林亨泰，购入九间联排中部的三套房，分别安置利杜、利远、利闻三个儿子。林亨泰次子利远即是林增荀的爷爷，这一房承祖业从事航运，河风海浪里讨生活。家族靠驾“锚缆”船跑海运，往返在福州—台湾、福州—上海航路上，倒腾蔗糖、稻米、杉木等货品。利远的孙女增荀的大妹妹兰卿曾回忆：小时候，年前船回来，孩子们相约去码头看上海货：有皮鞋、裙子、镜子，女孩子们对新衣的印象总是深刻。可见当年这一大家子曾顺风顺水地靠海吃海。

## 1. 扬光商校，国光职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年，林家洵14岁，就读于扬光中学。扬光中学是天主教多明我会在福建兴办的一所老牌学校，位于鼓楼区津门路与秀冶里河墘交界处东南侧。“1908年两等小学，1919年增中学部”。民国二十三年（1934）扬光中学改为扬光初级商业职业学校。

1938年2月24日，福州第一次遭日机空袭，王庄机场一片火海，接着福州屡遭炮击、轰炸。日军5月占领连江川石岛。福建省会——福州，被迫迁往山区永安。

全市动员疏散，机关、工厂、学校转移内地山区。“教会拒绝学校（扬光学校）内迁，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办，但当时的师生是爱国的，自动相继内迁，改名国光中学，脱离教会控制。”

“熬”册中留下林增荀这段亲历：“抗战一开始，学校当局宣告停办，后来由该校校长及几位得力教师重新筹建，继续办下去，改名为国光商职中学。当时校方决定迁往永安贡川，即通知学生愿意者可随同前往。”少年林增荀求学心切，说服家人，备上足够抵御山区寒冷气候的行囊，随同国光中学的师长逆流闽江负笈大山。

这一天，自愿转入国光中学的全校师生，集中闽江龙潭角码头。学生和送行的亲人夹杂在熙熙攘攘向内地、山区逃难的人群中，难分难舍。林家少年与母亲“洒泪而别，走进船舱坐定，

从窗口望着岸边亲人”。船只徐徐转头，快速离岸，泪目中岸边亲友远离了视线。小火轮加大马力一路前行。“急速震荡的轮机声”仿佛“锤打着”少年离散的心，直至夜幕降临，轮船停泊在福州沿闽江上行的“合水口”。

“合水口”是福州民间对古田县水口镇古田溪汇入闽江的交汇口的俗称，也称“水口”。它位于闽江干流福州到闽北南平段中部，是闽江航道上下游的分界线。当年，水口下游江面开阔、水流平缓，是为朱熹“烟波一棹知何许？鸂鶒两山相对鸣”的烟雾迷蒙、空谷鹃啼之意境；水口上溯则多急流险滩，航道崎岖，跌宕起伏，更有蔡襄“峡深风力豪，石峭湍声泻”的峡风豪胜、流水急湍之气势。

如今，气势伟宏的水口水电站大坝就建于此。

## 2. 负笈他乡，途中见闻

“水口上溯”是“熬”册最轻松流畅的一段文字，林家少年笔下铺开了闽江中游我之前不曾见过，以后也或不得以见的画卷。满怀离愁负笈他乡的孩子们一夜无眠，次日拂晓结伴来到船头，轮船在四周迷蒙中离开锚地。出了江口，曙光渐渐撕开了灰蒙蒙的天幕。“只见，江口怪石星罗棋布，嵯峨万状，如铁汉屹立、如猛兽奔突，追逐戏弄。江窄滩险溪流湍急，近看似将触礁，远望却疑无路可通，但是老舵手从容不迫，泰然处之，顺着航道，避开礁石逆流而上，终于闯过了道道险滩，如‘双姐妹’‘蛇头滩’‘十二姐妹’等”。少年观江流景致如痴如醉，又从老船工那里听得南平的奇闻轶事，一路兴致盎然忘了



水口水电站大坝

离愁，不觉轻舟已过万重山，日暮抵达南平延福门码头。

再次令闽江下游的少年惊叹的是延福门“那广阔非常的石阶，高大的码头建筑”以及码头上人来人往的繁忙。大码头外的水域是深不见底的九峰山峡谷。上游建溪、富屯溪、沙溪汇成西溪，三溪水在此合为闽江干流，东奔入海。相传“干将”“莫邪”双剑在这峡谷深潭中“化龙”。如今，那江中立起不锈钢双剑化龙雕塑，它是闽江干流起点的标志，也是南平市的市标。

这夜，国光中学师生中转暂住南平中学。林增荀想起船上老水手说过延福门是座“日受千人拜，夜坐万盏灯”的福楼，说是到了牌楼上，白天远眺，夜里近观，可解其意。原来闽江上溯的鼠船（产于闽清，头尖尾尖的小型平底木船）成群结队逆水行舟，临近南平更是滩险流急。“每船左右侧，船夫手抱船桨，一脚踩定船面，一脚使劲前踏发出‘嘭！嘭！’声，合着‘咳嗬！咳嗬！’的号子声，同俯共仰拼命划桨力争上游”。这种众船众人齐齐整整的俯仰，目标直指



20世纪50年代延福门码头旧影

延福门码头，形成“千人拜”延福门楼的奇观；当夜晚来临，小船挤挤挨挨地围泊在延福门楼下，亮起点点渔火，不就是向门楼供奉的“万盏灯”？时至今日，留下的延福门码头影像和这形象逼真的民间演化尤显珍贵。

### 3. 日寇轰炸，学友丧身

宿南平的孩子们一夜好睡。次日，被长鸣的警报和南平中学女教师的惊呼声“拉”起，慌乱中林增荀随同学跑向防空洞，“刚转过操场，又听一声震天的轰响，同学均身不由己地被震得踉跄跌倒，一阵沙土飞扬覆盖过来……”几个躲过炸弹的孩子惊魂未定，顾不得一切地进了防空洞。



2022年夏南平夜景中的双剑化龙雕塑

未几，警报解除。“我拍打了身上的土粉，忽前边传来‘有人炸伤’的话声……几位同学抬着一个尘土满面、血肉模糊的受伤同学去医院抢救……听说这位受伤的同学，敌机来时还在蒙头大睡，被炸昏迷急救无效失去了生命”。据记载，“1938年9月8日日机轰炸闽江，死10余人，伤30余人”。查资料发现当年日军多次轰炸福州，这条“炸闽江”记载显示是这年的最后一次轰炸，之前被炸地点均不靠近闽江。由此追索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国光中学师生9月6日离开福州，9月7日到达南平暂歇南平中学，次日晨，南平中学被炸，一名国光中学学生遇难。

南平不能久待，学校急派教师联系贡川，校舍不妥，转道南溪又不妥，改移到樟湖坂。学校租下一座有围墙且宽敞的大院落，把校舍确定下来，经过一段紧张的修整排列后才正式开学。

#### 4. 樟湖校区，遇杨老师

几经周折，困难重重，师生珍惜内迁时光，老师们谆谆教导，学生们孜孜不倦自然不在话下。留给林增荀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武术的杨老师，“熬”册中说这杨老师曾任马尾海军武术教官，“虽年逾花甲，但体强力壮，神采奕奕，走路来矫健雄豪，舞起拳术何等灵活”。第一课杨老师声如洪钟地问：“现在是什么时候？”一下子吸引了全场。他接着说道：“现在是国难当头的时候……要打倒日本鬼子，保卫祖国，就必须锻炼

身体，念好书，学好武艺，为国出力……”激昂的语气和情绪，瞬间感染了学生。“自此以后，学生精神振奋，操场上使出武术招数的喝叫声……体现了学校‘尚武精神’。”

这位杨老师不但武功了得，且对古文书本精通烂熟。当他教语文课时“总是掩卷背诵，漫步吟哦，句句清晰，抑扬顿挫，朗声悦耳”，诵毕全文后逐句解释，学生听得入神，兴趣非常。文武双全的杨老师，大受学生欢迎。少年们常于晚间、闲时围集于空场上，听其讲解古文故事或探求武术之道，深夜忘倦……

有感于富有血性的杨老师，我试图探求这位在马尾海军学校大事记中的小人物的资讯。根据“马尾海军武术教官”“年逾花甲”“精通国文”等信息，在万能的群友帮助下，铺开船政海军学校制造、飞潜、艺术，勤工、商船、高航等分部，遍扫数位杨姓教师。一位“年逾花甲”适龄的语文老师杨永清进入视野。有资料表明，杨永清在民国二年（1913）38岁，“闽侯县人，前清生员……船政归部接收奉艺术学校国语正教员……”1938年已“年逾花甲”。是否尚武至今虽难明了，但区区一篇拙文、一个民国教师，得到多位专家、老师相助，这是船政文化的影响力，也是福州文化人付出的真诚！

#### 5. 虐病缠身，家亲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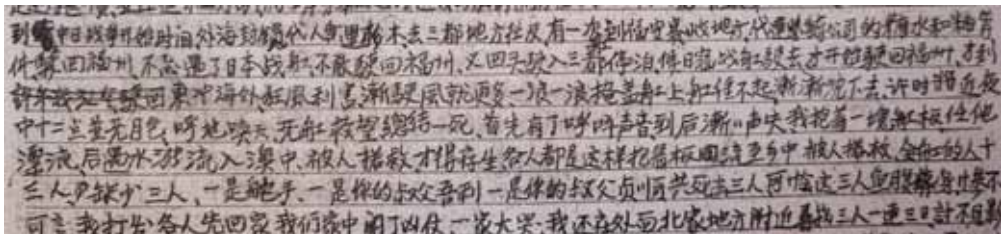
樟湖坂校区卫生条件极差，蚊虫肆虐，师

生常犯痼疾。林家少年，在虐魔骚扰侵袭中度过两个春秋，发冷发热时常思念母亲。家中自抗战爆发，多灾多难变故不断。原本走海的家族，因“淞沪大战”后，日寇封锁了东海海面，船运生意惨淡。为了生活每趟出海皆是冒险，日寇、海盗、抓丁苛政猛于海上的惊涛骇浪。船行不得，怕被“抓丁”不敢上岸，只能漂在河海间。可是，防不胜防，一天深夜父亲潜回家取换洗衣服，“刚迈出门，呼啸一声”，被日夜布哨的抓捕了。“缚送新兵接收站剃光头后押赴前线……”家人只好东挪西借，倾家荡产赎回带病的父亲。一家人要生活，父辈们只得再去冒险航船。家族祖辈在这条航路上讨生活，熟悉闽江出海水道，长风破浪直挂云帆。然而，国破家亡，“行船走马三分命”。日寇占领沿线诸岛，战舰横行，拉船杀人越货。父亲兄弟几个和船工们躲避着海盗、日舰铤而走险，灾祸终于来临了。

“熬”册中林增荀写道：“今天接到的家书……即凶信，信中云：‘航船经北郊遭台风袭击，全船人等慌乱中被狂涛冲散吞没，如今生死不明……’”“只觉如轰雷炸顶，眼前一阵昏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老天啊……”焦虑中的

少年三天后又接到家信，“船上人各自逃生，父亲抓住一块木板，随浪漂流一天一夜，幸被海浪推涌岛岸遇救得能生还。最可怜二叔，担惊受怕精神散乱，灾难来临呆坐船尾痴然不动，兄弟拼命叫唤，他死心与船俱沉，悲哉，六叔几次救上舢板，均被海浪推翻落海……”全船13人死了3人，两位叔叔和一位舵手，哀哉！林增荀不明白，父辈们几代风浪里讨生活，识水流、辨风向、预测台风都很有经验，他们经历过如此破船惨事，为什么这次不避港而风中起航？

笔者查阅了林增荀父亲林贞发鲜为人知的“家史信”，密密麻麻几千言。其中再现了这段经历：“（林贞发）这次到福安赛岐代运酱鲑、总公司的糖水和糖等。驶回福州时发现了日本战船，急忙又回头到三都停泊，直到天黑日寇战船驶去。当时台风将至，只想着赶快离开，开始驶回福州。才到东冲海外，渐驶风就更大，一浪一浪掩盖船上，船经不起，渐渐沉了下去，许时将近夜中十二点，并无月色，呼地唤天，无船救望。呼叫声音到后渐失”。正是日寇封锁东海，航船人惧怕被日军拉船，尤其二叔担惊受怕已近精神错乱，终酿成大灾。



林增荀父亲林贞发回忆手稿局部

走海自古道“船赚船吃，船破做乞食”。家庭经济从此一落千丈，林家少年升学更不敢奢望，只等毕业后能帮助家庭渡难关。

## 6. 校遭匪掠，寇踏城陷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即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尤溪土匪‘吓猴’进乡洗劫”。“‘土匪进乡啦，快逃啊！’几位同学空手奔出校园后门，园外是一条小沟涧……同学们伏在里面。”听得机枪声、呼啸声、跑步声混乱而至寂静，才回到学校。一位来不及逃出的男同学，惨遭枪杀。林增荀“心惊肉跳，来到自己宿舍，只见室内箱翻，柜倒，衣物书纸散弃满地……藤箱被撬开，最好的御寒羊毛裤及一些现款亦被抢去”。

时局愈发动荡了，“学校当局……加快教课日程”，毕业提前了。内忧外患下极度紧张地考试，同学们在心力交瘁中结束学业。没有毕业的喜悦，更谈不上庆典。当他们着手返乡时，“晴天霹雳，日寇占领福州，榕城沦陷”。1941年4月21日日军入侵，福州沦陷，不祥的信息纷至沓来，“日兵在仓前桥头设岗哨，任意污辱过往行人”，杀人取乐，欺凌霸占……逃难、躲避、流离失所打破了闽江上下游城市、乡村的安定，打破了一切本该有的美好。师生无法联系城中亲人，学校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女生们更是六神无主，痛哭流涕”。校方动员“找出路，不可坐以待毙”。林增荀相约同乡同学离了校，乘船直奔南平。

## 7. 少年惶惑，他乡失落

这天，林增荀又来到码头，在岸边待到日落，“傍晚，残阳夕照江水映得通红，我失魂落魄地坐在江边的石阶上”。码头上人群如潮，其间有蓬头垢面、鹑衣百结的挑夫沙哑地呼叫着：“有挑东西吗”“担行李呀！”孩子脆生生地喊：“买香烟、花生糖呀！糕饼要吗？”阵阵嘈杂不绝于耳。渐渐天黑人散，江风迎面吹来阵阵凉意。少年清醒了：这些叫卖者，“能够不顾一切地接生活……求生存，而我能做些什么呢？”“我肩能挑吗？能叫卖吗？念书人有什么用呢？能换得一饭、半文吗？”他惶惑了。自幼听过读书的好处，那些“一字值千金”“文盲者的悲哀”的故事都哪儿去了？“我的学业名列前茅……可我现在茫然如置身于巅绝崖之上……唉！活着有什么意思？”少年第一次面临人生中一个最严峻的生存问题，“没有生活出路，就意味着死亡。”回想三年前兴致勃勃，怀抱理想，慷慨激昂地说服家人负笈内迁求学，弟妹们投来羡慕眼光的情景。如今流落他乡，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去叫卖、摆摊、乞讨……做得到吗？少年自责、悔恨，湿润的目光扫过延福门楼下点点渔火，那渔火没了“夜拜万盏灯”的宁静，正漫射着融入江水中，合着跳动的天光涌向黝黑的山。当泪目爬上山顶的亮时，他心底一热，站了起来：“熬”下去，先活下来……

## 一条溪流的等待

唐 冈

汽车从万山丛沓中盘旋而下，前面不远就是霍口了。这里属鹞峰山的东南麓。这座雄踞于闽东北的大山，千峰林立，连绵起伏，如同汹涌的海浪，一波推着一波，峰峦直逼海隅。霍口，恰是大山间的一处叶状小盆地。其名字的由来，应

该和这里的山形有关。霍同豁，是缺口的意思。山间有了缺口，自是水的通道。于是，在群山中千回百折的霍口溪，通过这道大山的缺口，直下福州北峰，再一路南奔，汇进敖江而后由连江入海。



畚山湖

我之所以关注霍口溪，是因为这条满贮森林气息的碧绿盈盈的溪流，是福州的第二水源。世界上的城市常傍水而居。清洁水源，对于一座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口溪之于福州，不啻一道生命之泉。未到霍口前，我在地图上，曾多次注视过这条状若叶脉的溪流，陶醉于想象中的那一股丰盈的深碧和激情的奔溅。今天，看到车窗外扑面而来的茸茸绿色，心中不由得荡起阵阵喜悦之情。

霍口是著名的畲乡。据说，畲族的先民是从广东潮州的凤凰山一路迁徙来到群山之中的霍口的。他们相中了这里山环水抱的地势，更相中了这里远离尘嚣的宁谧。霍口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出奇的安静。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不多，街上也看不到匆匆的行人，慢生活的节奏在这里延续了

千年。大凡山区的村镇，都有一种隘迫之感。霍口却不同，村庄坐落在两条支流汇合处的扇形滩地上，显得雍容而舒展。溪边的茂林修竹，溪上秀丽的拱桥，把个青瓦白墙的村庄映衬得如同在童话的世界里一般。不时可以看到成行的白鹭轻盈地掠过溪面，空气中传来阵阵清脆的鸟鸣，让人感叹霍口的生态之美。多少年来，霍口溪就这样静静地流着，如同一条绿色的藤蔓，把一个个畲族村寨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大山的怀抱中，霍口枕着绿色的涛声，度过如许宁谧的岁月。

此刻，我们正是顺着霍口溪的一条支流走。我们要探访的是这里一处新建的“畲山水”景区。山路迤邐，渐行渐深，溪边环簇着一座畲家小村寨，有个好听而亲切的名字，叫作山朋。与山为朋，可知畲族人对山的热爱和对山的依赖。



畲山水景区



他们自称“山哈”，意思是住在山里的客人。他们在山陬崖畔建设家园，但始终视大山为主人，因此爱山敬山，从而很好地保护了山林。这里果然是山的世界。一座座倚天拔地的大山，肩并着肩，手挽着手，如同一个个巨人，正深情地俯视着身下的一条小溪。这道从无数绿叶中流淌出来的溪水，在陡峭逼仄的峡谷中正小心翼翼地行走，不时推开掩苒的众草，避开挡道的巨石，轻溅的水花，带来树林的浓荫，也悄悄传递着大山腹地神秘幽深的气息。

于是，我们一路上穿峡过滩。不过，那峡谷自身就是一道让人神迷的风景，常常一个转身，便会带出一串意想不到的生动画面。山石也罢，树木也罢，溪水也罢，都将一种野性的美勾勒得那样随意、那样生动又那样丰富，那是大自然不假雕饰的手笔。风从重重壁立的石崖后旋出，而后贴着的急湍流水一波一波地拂面而来，带着野草清香的森林气息顿时注满每个人的胸间。

险峻的峭崖、蓊郁的森林、葳蕤的花草和流淌的溪流，如同一幅幅水汽氤氲的画轴正渐次展开。我们就行进在这长长的画轴间。

这里也是树和花草的世界。午后的阳光像水似的漫布开来，驱散了林子里的雾气，于是万千草木尽情地展示自己的身姿。红豆杉、刺桫欏、花榈木、建楠，一棵棵、一簇簇珍稀植物，在我们的眼前逐一亮相。还有那片福建省最大的百年红枫林，虽然时令不是秋天，但挤挤挨挨站满一面山坡的树林，让人可以想见秋来枫红似火的热

烈景象。

简易的栈道紧贴着悬崖，它们自身也是峡谷的一道风景。因了这条栈道，原先咫尺天涯的峭壁间无端地有了一条路。千年沉默无语的山岩，自此有了交往，有了亲情。随着栈道的延伸，悬崖峭壁不断变换身姿，时而孤峰入云，时而飞水陡降，愉悦着游人的耳目。

不经意间，一道瀑布飞泻而下，顷刻演绎出一幕惊心动魄的巨岩和激水相搏的故事。这里是一处断崖，溪水进退无路，只能发一声喊，舍命跃下。谁也想不到，那柔弱纤细的溪流，在生命的紧要关头，会有这样的勇气，同时激发出这样的声威。一时群山为之战栗。

整整两个小时，我们就这样伴着一条小溪行走，溪声盈耳，山色娱目，清风入怀。溪两岸连峰叠嶂，略无阙处，溪水便在这窄窄的峡谷间艰难穿行，时而平缓时而湍急。一路上巨崖挡道，顽石塞途，而征途漫漫。溪流不停地喧哗着，似乎在为自己鼓劲，又像是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当我们随着溪流走出山口，进入一座村庄，不禁想起杨万里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桂源铺》诗：“众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心情豁然开朗。

这是一条溪流的跋涉，从高山峡谷间，风雨兼程，不辞辛劳。这也是一条溪流的等待，千年的守望，不曾动摇。青山绿水，终被世人认识。走进霍口，每个人都会忍不住为之称叹：好一片绿色，好一处畚山水！

## 隐元和尚与京都宇治万福寺

陈震

明万历二十年（1593），隐元隆琦（俗名林曾炳）出生于福州府福清县，29岁时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落发为僧。现在日本人称此地为古黄檗。

在明末清初的动乱中，古黄檗日见颓废，隐元遂离开故乡游学于浙江嘉兴的广慧寺，师从临济义玄法师，后又师从明末佛教界极负盛名的密

云圆悟和尚学习禅宗，受到了极其严格的训练。

当时福清古黄檗的主持是密云的传人费隐通容和尚。崇祯六年（1633）隐元作为费隐的传人被召回古黄檗继任主持。清顺治十一年（1654）隐元与密云、费隐等大师齐名，在江南一带已颇具影响。



福清渔溪黄檗山万福寺，始建于唐贞元五年（789）



重修后的福清渔溪黄檗山万福寺

清初，中土汉人深感亡国之痛，纷纷亡命海外，明朝的大量遗老遗少迁居日本。如被梁启超列为明末清初五大师之一的畸儒朱舜水，东渡日本后膏泽异域，光大了中华儒学，标名日本文化史册。德川光国修建的林苑“后乐园”（日本三大园林之一），便拜其赐名。

当时日本奉行锁国政策，日本僧人想要出国学习新的禅风是不可能的。日本的禅宗已渐渐失去了本来面目，佛教界处在低落时期。而当时旅居长崎的中国僧人中，也缺少能影响日本禅林的高僧。因此日本上下都希望有如隐元这样的中国高僧能前来讲学，再开佛教界的新气象。

江户时代以来，从中国来的侨民以福建福清为众，且多居住在长崎。福清华侨在长崎建造了崇福寺。寺院落成后，先后有长崎兴福寺的主持逸然性融、隐元的弟子因缘和尚等人数次前往福清古黄檗万福寺邀请隐元和尚前来崇福寺主持寺务。

盛情难却，清顺治十一年（1654），隐元抵达长崎，住刹于兴福和崇福两寺，开坛讲经。各地僧人闻讯，纷纷前来受戒，日本佛教界盛况空前。在此期间隐元扩建了长崎兴福寺。不觉间过了三年，隐元准备回国。此时有大阪府属下富田的普门寺坚请隐元留下，京都府妙心寺主持竜溪性潜也力荐隐元继任妙心寺的主持。

妙心寺是日本享有盛名的大寺庙，内部派系繁杂，竜溪性潜的提议终难实现。

普门寺的地理位置与长崎大不相同，靠近京



宇治市隐元禅师登岸地石碑

都，僧侣众多，中国传统文化对京都有着很深的影响。日本在奈良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受唐朝文化的影响，建有许多中国式寺院，但桃山时代以后，中国的影响逐渐减弱，京都的寺庙建筑已不再具有中国特色了。因此隐元移住普门寺后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广泛关注。

隐元的老师费隐本来就反对隐元东渡日本，频频来信催他回国，隐元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万治一年（1658），隐元拜会了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说明归意，德川家纲坚请隐元留下，并将京都近郊的一万坪地赐给隐元建寺庙。当时的中国明朝已经灭亡，黄道周被杀，郑成功失败后去了台湾，在政治上与隐元有关联的人均已失落，隐元西归之念遂断。1655年隐元移住普门寺。

在隐元之前到日本的著名僧人有鉴真和尚（687-763），建有奈良的唐招提寺；镰仓时代到日本的兰溪道隆和尚（1213-1278，后宇天皇赐谥“大觉禅师”，为日本禅师谥号之始），建有建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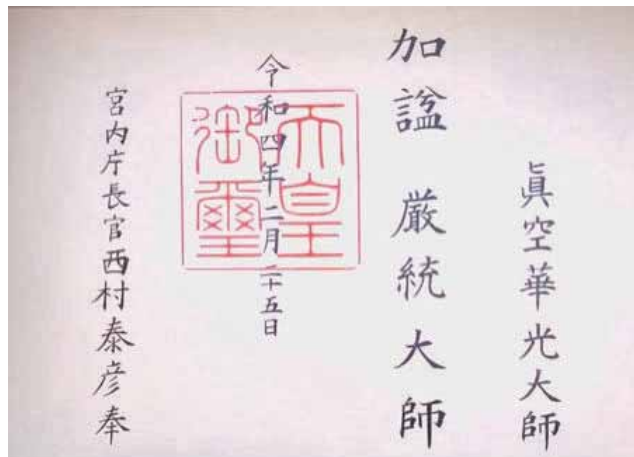


宇治万福寺山门

寺；无学祖元（1226-1286，宋临济宗高僧），建有圆觉寺。这些中国僧人的到来，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但在民间，连作为日本上层的武士也纷纷皈依禅宗，在京都、镰仓等地大修寺庙。隐元除了精通佛学外，还对儒学、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为深刻的理解，成为继鉴真之后最有影响的中国僧人。

宽文一年（1661），隐元在京都东南郊的宇治市创建了日本黄檗宗的大本山万福寺。宇治风景秀美，琵琶湖水经宇治流入京都盆地。当时许多日本贵族都在宇治建有私人别墅，其中以平等院（日本十元硬币图案）最为著名，在其附近的法界寺、醍醐寺均在日本的佛教界享有盛名。

黄檗山万福寺的原址是后水尾天皇生母的别墅。隐元任第一任住持，时年70岁，距隐元在承应三年（1654）赴日，这是第7个年头。万福寺的建造得到幕府的大力支持。宽文二年（1662）起寺庙每年从幕府领四百石，宽文七年（1667）



隐元禅师加谥为“严统大师”

德川家纲寄赠白银两万两用以建造大雄宝殿。幕府的高官们也纷纷解囊相助。酒井忠胜和黑川与兵卫捐资建了法堂和钟楼。后水尾天皇、诸大名也多有捐赠。当然，权贵们除了宗教上的皈依外，也通过隐元等中国僧人与郑成功建立了海上贸易，从海上运送木材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在幕府和皇家的支持下，万福寺的规模和建造速度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隐元当住持时只盖好山门和西方丈室，法堂、禅堂和东方丈室是第二年才盖好的。宽文四年（1664）隐元退隐到松隐堂居住，由隐元的法嗣木庵性瑠继任第二任住持。宽文十三年（1673）隐元圆寂，赐号“大光普照国师”。隐元禅师圆寂350周年（2022）之际，日本令和天皇加谥隐元禅师为“严统大师”。隐元不但给日本带去了黄檗禅宗（与日本的临济宗、曹洞宗并立日本禅宗三大派），还带去了中国的建筑、雕塑、音乐、绘画、书法、烹饪、茶道等中国文



总门的横额“第一义”和对联均为五代住持高泉性焮之手笔



横额“万福寺”三字为隐元手书

化。隐元带到日本的扁豆至今仍被关西人称为“隐元豆”。

万福寺经过八年的营造，到宽文九年（1669）大体完工，初具现在的规模。

宇治万福寺的总体设计依照福清的古黄檗万福寺，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依次是：总门、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为明末清初中国寺庙的建筑风格，左右堂宇均齐整然，展示了独特的风格。而在此之前日本的寺庙院建筑多受唐风影响。日本寺院的布局是山门、佛堂、法堂一条线，无天王殿。天王殿原来自喇嘛教，是蒙古人在中国建立元朝后留下的，在万福寺之前，日本未受到来自喇嘛教的影响。因此万福寺所建的天王殿在日本独一无二。

日本寺院的山门通常是没有横额与对联的。万福寺总门的横额“第一义”和对联均为五代住持高泉性焮之手笔。山门“万福寺”三字为隐元手书。大雄宝殿的门窗花饰也一改唐风的花



大雄宝殿石阶前月台的正中间放着一块“梵坛石”

头，为圆窗。

宇治万福寺大雄宝殿前的月台也别具风格，引人注目。所谓月台即是在大雄宝殿石阶前铺以白沙，晚上映照月光而得名。在月台的正中间放着一块“梵坛石”。这是给犯了戒的僧人跪省而设置的。这块梵坛石也是日本其他寺院所没有的。每逢水陆盛会，信众就在月台前的台阶上参拜。



隐元禅师像，范道生作



弥勒佛像，范道生作

宇治万福寺的一绝是寺庙内精湛的雕刻艺术。

宇治万福寺的殿堂落成后，隐元派人前往长崎延请范道生入黄檗山雕造佛像。范道生是泉州人，顺治十七年（1660）到长崎，先后为长崎的福济寺（俗称泉州寺）、兴福寺（俗称南京寺）雕造佛像。他创作的雕塑、干漆像、铁像等作品对近代的日本雕刻艺术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具有明代风格的艺术作品，如布袋和尚形象丰满，

刀法鹰扬老辣，极富禅韵。其他作品如十八罗汉、未驮、四大天王，至今仍让日本人赞不绝口。

宽文十年（1670），范道生歿于长崎崇福寺，时年 36 岁。葬于崇福寺后山，其墓至今仍在。范道生不仅精于雕塑，且能诗善画。范道生题黄檗山诗云：

遥瞻紫气入山来，选佛名场喜乍开。  
龙象遍围狮子座，雨花争坠法王台。  
万松鼓翠暄天籁，千嶂排空起浪堆。  
露出重重真境界，不思维处孰能猜。

宇治万福寺中仍保存有许多元代以来的名人字画。其中最为有名的有：元王振鹏的《五百罗汉图》、明陆治的《松图》、陈贤的《观音帖》、张瑞图的对联和题额。万福寺东方丈室的壁画《西湖图》《罗汉图》是日本画家池大雅应大鵬和尚之请，在宝历七年（1757）为开堂百年纪念而作。

宇治万福寺中的建筑、雕刻、书画以其独特的风格异彩纷呈，日本史学界称之为黄檗文化。宇治万福寺到第十三代为止均由中国僧人任住持，采用明音诵经，至今仍保留有许多中国寺院的传统习惯。

“二战”后，日本华侨买下了万福寺后山的山地，开辟为华侨公墓。墓碑多朝西偏南，遥望故土。每年的 10 月 20 日，以福清华侨为主体的福建籍华侨会从日本各地会聚到宇治万福寺来参加每年一度的普度盛会，祭扫祖莹，联谊友情，一解乡愁。

# 隐没在历史深处的福州花朝节

青色

壬寅年的六月，雨下个不停。漫步福州三坊七巷，在光禄吟台旁的大众茶铺，喝茶、读书，等雨歇。

雨滴落在吟台旁的漾月池上，滴落在茶铺茅顶上，也滴落在手握的清郭柏苍《乌石山志》上。独坐藤椅，心绪飘逸。

那也是这样一个下雨的夜。闽山泌泉山馆（已圯，今光禄吟台前），郭柏苍挥毫泼墨，在花朝节之夜写下《沁园花朝》之诗：“朝朝看柳上吟台，池馆佳晨得屡开。花底歌残泉已沸，雨中灯尽月初来。”而他的一双外孙女——陈闰瑜姐妹，正剪彩纸、做灯球，连夕悬于树阴间，雨过月上之时，灯依然熠熠不灭。

这是清光绪年间的花朝节。

## 被遗忘的花朝节

何谓花朝节？它是汉族的传统节日，简称花朝，俗称“花神节”“百花生日”“花神生日”。

在唐代，它与正月初一春节、正月十五上元

节、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重阳节等，并称民间岁时八节。更多时候，花朝与八月十五的月夕相对，合称花朝月夕。简言之，是一个祭祀花神的节日，是一个春日踏青赏花的佳日良辰。

近年来，福州兴起一股花朝节潮。每至二月，汉服爱好者便在公园里举办花朝节。虽不尽如人意，但总算让这个古老的节日重现于榕城街市中。2020年，福州更是将花朝节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之福州花朝节节期，有农历二月初二的，有二月十二，也有二月十五的，有些混乱。曾经与中秋齐名的花朝节，已式微，乃至被遗忘。对于花朝节，福州人是陌生的、模糊的。人们把北宋名臣蔡襄在福州为郡守时的“开花园”，当成花朝节在福州的节俗。实际上，这是寒食节俗。《八闽通志》“寒食·开花园”一节载：“州园在牙门之西，谓之春台馆。岁二月启钥，纵民游赏，常阅一月，盖与民同乐之意也。”

想来，举办者之所以如此随意地定花朝节节

期，除了缺乏史料的梳理，还与花朝节异地不同期有关。宋时，洛阳风俗以二月二为花朝节；东京及苏州以二月十二日为花朝；成都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漫漫历史中，花朝节融合了二月二挑菜节、二月十二花神节的习俗，还与各地的花信交融在一起，形成今日内容丰富的花朝节。到了清代，北方一般是二月十五，南方一般是二月十二。

福州古时有没有花朝节？宋淳熙《三山志》、明弘治《八闽通志》、清乾隆《福州府志》、民国《福建通志》等重要地方志书，几无相关记载。而在《乌石山志》里，除了《沁园花朝》提及花朝节的两个节俗，其他的“花朝”也多作为时间记事，如叶矫然《花朝夕宿净慈寺》、蔡征藩《红雨山房花朝》等。

尽管史志中未明确载录这一民间习俗，但它却频频出现在文人墨客的作品中，让今日的我们得以有幸窥寻它的一角。

## 花朝节与节俗

在爱花惜花的国度里，花朝节曾悄然升起，又悄然隐没。

它总戴着神秘面纱。有人认为，它由来已久，起源于远古时代。在《诗经·郑风·溱洧》中，郑国溱水、洧水交汇处，男女相会是花朝节的雏形。有人认为，它源于唐朝，“武则天花朝日游园，令宫女采百花，和米捣碎，蒸糕以赐从

臣。”又有一说法，它起源于宋。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二月望》记载，“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渐闻风俗，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望之时，最堪游赏。”

不论如何，它曾真实地存在于历史的某个抽屉，且带给人们诸多美好。人们在花朝日赏花、簪花、赏红、燃灯、扑蝶、祭花神，将花的美好演绎得淋漓尽致。

赏花、簪花是花朝节的主要形式。赏花自不必赘述。心存美好，眼中自然见花。在宋代，男子簪花是一项制度。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多次描写簪花场景，如“（宣德楼）两边皆禁卫排立，锦袍幞头，簪赐花，执骨朵子”“围子亲从官，皆顶球头大帽，簪花、红锦团答戏狮子衫”等。最让人动容的是一次宋徽宗御驾回宫，“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前后从驾臣寮，白司仪卫，悉赐花”，上至帝王，下至臣僚随从皆簪花。与天子共簪花，与有荣焉。整支队伍都焕发着荣光。那景况，何等雄伟，何等浩荡。这便是一千多年前，以风雅著称的宋代。

郭伯苍外孙女剪彩纸、做灯球悬于树间，是花朝另两个节俗——赏红和燃灯。

花朝节，将五色纸或彩帛悬于花枝上，谓之“赏红”。看似彩“幡”飘飘的背后，是古人的一种“护花”行为。至于燃灯习俗，宋人易士达有诗《花朝燃灯》可窥一二：“莺花世界春方半，灯火楼台月正圆。”燃灯以祈福，是当时的风气。清代郝浴的《唐城二月二日河灯竹枝词》描述了





放河灯的情景：“花朝龙气，晓来升龙跃。花开好放灯，点点琉璃推入水，下看星斗绿波澄。”它为燃灯的另一形式。此情此景，如今仍可在一年一度的福州西湖花朝节中得见。

关于扑蝶，我们更多的印象是《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宝钗扑蝶”的桥段，它是花朝节俗在明清小说中的投影。福州地区的扑蝶，不甚流行，几无史料可考。但闽北地区的邵武曾流行扑蝶会。明代何乔远《闽书》引万历《漳州志》：“二月十五日为花朝，泉中林下诸老，有以日饮酒赋诗者。邵武笄女子，以是日为扑蝶游。”

不知现今的邵武，尚有饮酒赋诗扑蝶之雅事否？

这几年，福州公园多有举办花朝节。以2021年西湖公园花朝节为例，除了传统的游园、簪花、祭花神、放河灯外，又增设了汉服雅集、投壶游戏，并融入了福州特有的“诗钟”文化。举办方颇具匠心，但总觉得少了文人雅意。这已然

是福州众多公园中策划得最好的花朝节了。我们不得不慨叹，花朝节已失去魂灵。

犹记得那年花朝夜，我和女友们穿着传统服饰，簪着花，趁“花神”去放河灯的那一会儿，在西湖畔，蒙着脸，跳起了花神舞，着实让自己开心了一把，总算过了一个难忘的花朝节。

## 花神与花神庙

明代人撰写的《月令广义》载：“女夷，主春夏长养之神，即花神也。”这是最早传为伺花之神的花神。之后，又有了一位叫“花姑”的花神，传说她善种花，被点化成仙，人们追崇她为花神。再后来，人们不满足于只有两位花神，便将花神和月令文化结合起来，每个月有一位司花之神，这便是后来的“十二花神”。

每个月令花开不同，便有不同的花神，如正月梅花花神梅妃，二月杏花道甄，三月花神虢国



夫人，四月牡丹杨贵妃……十二花神有不同的版本，并不纯然是女花神。在一些版本中，有花容月貌的女子，也有爱花成癖的男子。男花神中，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花痴”，如二月梅花神林逋、七月荷花神周敦颐、十一月菊花神陶潜等。

“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神。”清人蔡云的这首《咏花朝》，便是旧时江南民间庆百花生日、贺花神盛况的真实写照。

神是用来供奉，用来祭祀的。有花神，必有花神庙。至今，北京、南京、杭州、苏州等地仍遗存有花神庙。清雍正年间，兼辖福建的江浙总督李卫，为官清廉，不畏权贵，却极自恋。他在杭州修葺花神庙，塑自像为花神，并把自己12位妻妾塑成花神，分立左右。这便是闻名杭州的湖山神社。让我疑惑的是，他为何未在福州建一座花神庙？在福州，只有闽山巷旁的东林里有一座树神庙，供我们痴想。

## 明代的花朝节

这几年，因执着于花草世界，我遍访福州城中的古园林，包括龚易图的花蓉园、双骏园、三山旧馆，梁章钜的小黄楼，吴继箴的半野轩，陈衍的匹园、闻雨楼等，痴迷于其中的园林花木及背后的文化，为岁月中起落的古典园林以及它们的主人而叹息，也为它们历史上曾经的繁华而自豪。但我是孤独的独行人。

在这一点上，古人令我艳羡。他们“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有不少同道中人。他们时择佳日，或相伴而行，纵情山水；或结社酬唱，文酒吟咏，留下不少诗篇和佳话。在他们的诗集上，可寻及其人在这世上的雪泥鸿爪。

在明代闽中诗派盟主曹学佺的诗作中，多有花朝宴集游玩的记录，如《花朝游夹山漾同用花朝春晴四字》《花朝郑汝交南园宴集》《花朝期钱世恒御史不至》《闽月花朝集淼轩同郑孟麟陈叔度》等。这位写诗如写日记的闽中才子，在参

加芝社社集时，感怀地写下“二月春欲半，百花朝旧名。此中开已落，不复较阴晴”之诗句。这首《花朝》隐晦地点明了花朝节期。

1610年的花朝节，这位风雅之士，独访了当时还是青羊肆的四川著名道观青羊宫，在青羊宫与诗友们诗酒社集，觥筹交盏后写下《二月十五日青羊宫宴集》，为我们提供了花朝节期的依据。

明代博物学家谢肇淛，曾为花朝节打抱不平。在他的《五杂俎·卷二》中，写到这有趣的一幕：邨侯李泌想在二月自创一节，谢不服，偷偷在书中发牢骚，“二月十五，自有花朝节，足敌中秋”，为何邨侯不引此，却另作其他节名呢？

在明代，花朝节已成为官方节假日，写入大明律例。每值花朝节，放假一日。《明神宗显帝实录》《大明会典》中亦有类似记载：“每年假日照旧例……花朝一日。”

可惜，此等美事今已成灰，只容吾辈空想了。

### 清末的花朝节雅集

百年前，有一群人，和现在的我们一样，为花痴，为花狂。在那个时代里，诗人们为一朵梅花盛开而招饮，为一片桃花落幕而宴集。花滋润着诗人们的心田，是觞咏雅集的集结号，是文人雅客的精神食粮。接受来自花木的慰藉，是接续生命力量的源泉，也是对抗尘俗凡虑的诗心雅意。

花朝节社集，成了不可或缺的活动。在清闽

派同光体领军人物陈衍《石遗室诗话》中，有关花朝节的记录有十多处，比起曹学佺的《石仓诗稿》，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多为诗友诗记，包括福州三狂生之一林述菴（崧祁）的《花朝东陈绩斋》，同乡刘筱云（崧英）的《花朝移柳》《闰花朝集旧涛园》，说诗社中人陈梅的《花朝集半野轩》，同邑陈桐卿（梧庆）的《花朝》，龚易图的侄儿惕庵（乾义）的《花朝孝泉招饮村店和石遗师韵》等。

陈桐卿花朝诗中的“留将春一半，扶起柳三眠”及惕庵写的“春半南中未见春，高楼归雁正愁人”中的“春半”，为我们阐明了那个时代花朝节的确切节期。福州花朝节似乎从明代到清末从未更改过。

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28年的花朝节。诗人们聚于陈衍的寓所“匹园”，“公以瓶盎遍供群花，而苦闽中无牡丹，乃以吴昌硕牡丹画帧中悬，使集者赋诗。”过节无花王，便以名家画卷替之，就为了过一个诗情画意的花朝节。这样的文坛佳话也只能出现在“匹园”里。

诗人们也因此留下不少可传世的诗作。如林枫丹之诗《匹园师花朝召饮，以园花分插十瓶中，悬吴仓石所绘牡丹，寓花王意，命即事赋诗》：“今年花朝花如何？城中匹园春较多。春风用意写锦窠，千朵万朵供婆娑。”建瓯王德斋《匹园花朝宴集》：“诗人爱花本成癖，今朝况值花生日。匹园为花张寿筵，恨无花王美不全。花王写真吴缶庐，悬之不觉为画图。”其时，民间盛传，



闽越水镇花朝节活动

“匹园”为闽都首屈一指的诗楼。如今看来，不为过。

尽管陈衍等编纂的《福建通志》习俗里未有关于花朝节的只言片语，但他却用文人独有的雅心诠释着花朝节，用笔墨记下了闽中花朝之盛事。虽时隔百年，依然令人心生向往。

之后，闽中花朝盛事似乎就此式微。

但另一群体却在薪火相传。那便是因仰慕陈衍的诗品而买下大光里匹园对面的房子，成为陈衍邻居，后来也成了一代大儒的何振岱的寿香社女弟子们。尽管到了此时，已没有光绪年间的花朝节仪式，她们却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来延续这一传统节日。

彼时，国家动荡，战事纷飞。但她们处乱世而波澜不惊，“风雨虽狂不改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到1983年，前后雅集20多次，跨40年，仅花朝节集会就占了近1/3。

动荡与流离带来的苦痛与烦闷，只能用一种

看似美好平静的雅聚来抵御，来安抚。

在花朝诗中，她们感春惜花，喟叹岁月不易，“我言春色年年好，相逢莫惜金樽倒”（叶可羲《甲申花朝即事》）。她们惺惺相惜，“别裁伪体先吾辈，嗣乡唐音有几人”（叶可羲《蕙愔以花朝小集诗索和即步原韵》），“但期永驻春光好，常聚筠轩展绮筵”（王德愔《丁巳年花朝竹韵轩小集》）。她们联句写诗，互相勉励，“酒醅春长在（真），云消月更圆。诗心如沉澹（畴），好语喜珠联（德）”（薛念娟《甲辰花朝竹韵轩小集同德愔、竹韵、禾庵、守真、惇畴联句》）。

最后一次花朝节雅集在1982年。至此，王真、薛念娟、王德愔已相继离世，参与人数只近半。花朝节，感受更多的是人世无常，岁月冷冽。

花朝节，是一部文化史，也是文人雅事的一个小缩影。比起古人的雅致，今日的我们，只能坐在简陋的茶铺里，以一杯薄茶敬过往的花朝节，敬曾经活跃在闽都大地上的那些有趣的灵魂。

# 渔夫与鱼鹰

江梦笔

14世纪20年代，一位与马可·波罗齐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从海路游历到中国，接着辗转至福州。他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是“该城雄伟壮丽，滨海”，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同时不忘捎上一句“这里看得见世上最大的公鸡和白如雪的母鸡”，似乎心有所颤。除此之外，他的心还跟随着一群水鸟在河中扑腾，花大把精力伫立在桥边看人捕鱼，并认真记录：

我居住在一个叫作白沙 (Belsa) 的城中，它有一座横跨该河的桥。桥头是一家我寄宿的旅舍。而我的主人，想让我高兴，说：“如你要看美妙的捕鱼，随我来。”于是他领我上桥，我看见他在那里有几艘船，船的栖木上系着些水鸟。这些水禽，他现在用绳子圈住喉咙，让它们不能吞食捕到的鱼。接着他把三只大篮子放到一艘船里，两头各一只，中间一只，再把水禽放出去。它们马上潜入水中，捕捉大量的鱼，一旦捉住鱼时，就自行把鱼投入篮内，因此不多会儿工夫，三只篮子都满了。主人这时松开它们脖子上的绳，让它们再入水捕鱼供自己吞食。

水禽吃饱后，返回栖所，如前一样给系起来。我把其中几条鱼当作我的一顿饱餐。

鄂多立克惊奇的情绪在丰盈笔墨里旁溢四处，和渔夫捕上来的鱼一样丰富。而在这条河中上演的逃与抓、飞鸟与鱼的情节，也是中国古老的捕鱼技艺——鸬鹚捕鱼法。捕鱼法还有筑鱼梁捕鱼、水獭捕鱼法、醉鱼草捕鱼法、鸬鹚与鸬鹚搭档捕鱼法……不知道鄂多立克是否要吃惊得为中国的渔夫献上捕鱼界的王冠。

鸬鹚亦称“水老鸦”“乌鬼”“鱼鹰”，修颈硕肚，长喙蹼趾，羽黑而有黛光，鸟纲，逐水而栖，善于潜水捉鱼，人类驯化后可用其捕鱼。另一种也被称为鱼鹰的游禽叫“鄂”，易与鸬鹚混淆。“鄂”字充满张力，一种誓要把力气用在极处的饱满，再读读这些词语：鄂表、鄂荐、鄂视……可见这种叫“鄂”的水禽捕鱼多么凶猛。

渔夫驯养的“鱼鹰”则是性情温顺些的鸬鹚。他们会用麻环套在鸬鹚颈间，因受“颈圈”所阻，鸬鹚不能私吞大鱼，只能将啄获之鱼全都吐入渔夫的鱼篓中，从而完成捕鱼的使命。在秦代的《尔雅》及东汉的《异物志》等书中，就有

关于鸬鹚捕鱼的记载。唐代多位诗人也曾描摹过鸬鹚捕鱼情景。杜甫诗句“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即描写了鸬鹚给水乡人民带来的盛景。王维有诗“乍向红莲没，复出青蒲颺。独立何褰裊，衔鱼古楂上”，诗中四处蓄满动意，你会发现鸬鹚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节奏以及矫健、迅猛的质感。

自鄂多立克记录下用乌捕鱼的方法后，西方人感到十分震惊，明清时期，可看到他们在中国南方各处观看鸬鹚捕鱼，乐此不疲，同时留下许多文字。多年后，当许多文化学者在考证鄂多立克所看到的鸬鹚捕鱼的情景到底是在闽江流域还是钱塘江流域的时候，距今170多年前的施美夫站在福州南台郊外，也看到这一幕景象：

南台的一些居民谋生之道极具天才，他们训练鸬鹚潜水，从江底把鱼捉上来。通常在水位低的时候，可以看见船民把船停泊在

桥拱附近，船边栖息着四五只鸬鹚。主人发出信号，一只鸬鹚就会从船上跃入溪流，四处寻找一番，然后潜到水底，有时一两分钟不见踪影，通常在四五十米远处浮出水面换气。过了一分钟，那只鸬鹚又潜入溪流，重复这个过程，直到逮到一条鱼，浮上水面，鱼在它的嘴里拼命挣扎。船民看到这个信号，就把小船划过去，撒下网，把鸬鹚与鱼一起捞上来。那只鸬鹚知道会得到奖赏，拍着翅膀，做出各种古怪的动作，寻求得到一片鱼或是其他食物，作为成功的通常奖励。有时，两只鸬鹚会同时捉鱼，常常有好几分钟不见踪影。不过，渔民会紧跟着它们，他的小船是用五六根毛竹扎起来的，就像一只轻便的竹筏，足以承载他本人和鸬鹚们，用一只桨就可以轻松地划动。在我观看期间，这些鸬鹚捉了三四条鱼，有条鱼太大，鸬鹚把它拖向竹筏的时候，它的嘴都抬不出水面。



面对鸬鹚捕鱼的热闹景象，一个哲学家会感叹渔夫“善假于物也”的智慧，一个诗人会深刻体会啥是“深水有鱼衔得出”的诗意，而当时热衷于机器革命的西方人也许正盘算着鸬鹚捕鱼的效率。如果渔夫们能够面授机宜，也许他还能将操作步骤记录得更详细，因为这是来自东方国度的智慧，十分伟大的发明。需要一艘小船、若干只训练有素的鸬鹚、一根能钩住鸬鹚脚绳的圆竹，以及两条健硕如吉卜赛人的腿，这两条腿能感受暗流，拥有摆脱失衡的脚力。最后还要学会与鸬鹚沟通，用语言或用动作来控制捕鱼的节奏。例如发出类似“啰啰啰”积极上进的催促声，便是让鸬鹚加大马力捕鱼，发出“呵呵呵”的声音兴许是让鸬鹚回船收工。这些驯鹰的技艺都藏在秘制的地方口语中。掌握这些技巧，大抵是可以如闽江上的渔夫，实现捕鱼自由。

在晚清约翰·汤姆逊的摄影作品中，摄有一张闽江上的渔民，夕照下，江水如练，三两渔夫泛着小舟，好一幅渔舟唱晚图，而傲立在各个竹排上的还有鸬鹚的身影，它们全是一副虚极静笃的态势。渔夫与鸬鹚，这似乎成了捕鱼的最佳配置。平静的江水下，一个渔网下去，不确定到底能捞上来多少鱼。但是有了鸬鹚，无论是雾晓沉还是夕日已颓，深潭或浅滩，只要有鱼都逃不过它锐利的眼睛。鱼篙一扬，一声令下，山鸣谷应，渔夫便成了这山水的主人，一群待命的鸬鹚横江而去，其翅如轮，时隐时现，有时迎风悬停在水面上，像雷达一样搜寻目标。渔夫可以用竹

排晃动水面，让鸬鹚更为快速地捕捉猎物。当鸬鹚喉囊满满当当之时，渔夫会用竹钩钩住鸬鹚脚绳，入船，照着竹篓掐出它们囊中的鱼虾，最后再将它们赶入河中继续捕鱼。于是，你将看到鸬鹚时而在江中凫水前进，时而扑起潜下，时而飞鸟相与还，若以江水为谱，便会听到一首节奏有力、紧张动人的农家小曲。这首曲子被西方人反复倾听，为之着迷。

福州用鸬鹚捕鱼的技术并不稀奇，曾为捕鱼业做出重要贡献。清《闽县乡土志·物产琐记》在“鸬鹚”一条中展开说明：“畜者绳击其颈，载以箬，使捕鱼。年征其税。”《侯官县乡土志·物产琐记》亦载：“乡人多畜之，以绳系颈，使之捕鱼。”《闽江金山志》曾记述：“厚（后）山乡制扇骨且饲鸬鹚以捕鱼者，以上所业虽微，亦是各谋生计。”书中记载的正是闽侯县上街镇后山村黄厝里“驾鸬鹚”的谋生行当。有民谣唱道：“黄厝里驾鸬鹚，远乡近邻最行时。一只鸬鹚一亩田，你说稀奇不稀奇。”一只鸬鹚所带来的收益比得上一亩田，根据当时的状态，100多只鸬鹚，每天捕鱼量多达1000多斤，可见其捕鱼能力。鸬鹚依靠丰富的鱼类资源、良好的气候与水域环境，在上街镇后山村生存繁殖下来。据考证，后山村黄厝里“驾鸬鹚”始于清雍正末年，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鼎盛时期是民国初年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旧时每到端午前后闽江鲤鱼的繁殖季节，在福州洪山桥、万寿桥上都有浩大的人群，如粥沸腾般地观看“驾鸬鹚”的景象，那正是“一湖



渔色鸟飞天”。

《闽杂记》中也曾记录福州鸬鹚筑巢的情景，书中载：“鸬鹚巢树则惟洪迈《夷坚志》言之，奉新东林行院松树上，群鸟栖止，鸬鹚尤多，每岁字育，至秋乃去，与鹭正同。余常见侯官县属叶村榕树上，亦有鸬鹚巢之，询诸居人，则春来秋去，每岁常然也。”

清代《闽杂记》的作者施鸿保曾细致入微地观察到鸬鹚在福州榕树上筑巢的情景，春来秋去，年年如此。如今，一到冬季鸟类迁徙季节时，许多观鸟爱好者、摄影爱好者会在闽江口、连江县苔菴镇东洛岛拍下一张张拥有黑色毛羽的水鸟的照片，碧海长天之下，它们掠水而过，像在深海中牧渔，或晾翅在岛礁上，场面蔚为壮观。它们就是来越冬的鸬鹚。当看到鸟飞鱼游的画面时，不知是否有人会想象在文字的烛照之下，它竟现身于暗影重重的历史角落中，而且浑

身散发光芒？

随着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严格的管理与保护，鸬鹚捕鱼法被明令禁止。与更为科学的捕鱼方式进行对比，传统捕鱼法相形见绌。鸬鹚捕鱼面临着劳动强度大、饲养和驯鹰程序烦琐等问题，加之鸬鹚对水域环境的要求也颇高，都让鸬鹚捕鱼的成本不断提升，而逐渐遭到淘汰。曾经有“鸟中渔夫”“渔夫猎手”之称的鸬鹚也曾因为生存环境的因素，数量骤降，被列为“三有”保护动物。

也许就在鄂多立克的文字中与鸬鹚劈面相逢的那一刻，你已唤醒了熟悉的记忆，也许你对鸬鹚还陌生着，也许曾经你也与它有过惊鸿一瞥——就在第五套人民币20元的背面图案中，夹岸青山的漓江上，云烟缥缈，剪水行舟而来的正是渔夫和他的鸬鹚。